

yt25410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第26辑

湖南文史
資料

周谷城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南文史资料

第26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责任编辑 高原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政协文史书刊发行组发行

(长沙市迎宾路15号)

湖南省轻工业专科学校印刷厂印刷

湖南省期刊登记证第125号

*

1987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开本860×1168 1/32 字数170千字 印张6.84

印数 1—5,000 定价：1.50元

编 辑 说 明

一、今年是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50周年，本会与湖南黄埔军校同学会联合选编此辑，以资纪念。

二、本辑史料既有反映湖南抗日正面战场的内容，也有人民群众在抗战时期的经历和进行救亡活动的情况，还有湘籍将士在外地参加抗战的回忆。

三、鉴于中国文史出版社将出版我会编辑的《湖南四大会战》一书，因此，本辑并没有较多地选入这方面的稿件。

四、本辑还刊登了《湖南抗战大事记》，比较详细地记述了湖南在八年抗战中的基本史实，旨在向读者提供湖南八年抗战的概况。

五、编者对本辑所选稿件的史实尽量予以核实，在文字上也作了较多的删改，但由于参考资料有限，发稿时间仓促，可能还存在一些差错，欢迎读者指正。

六、湖南黄埔军校同学会为本辑提供了近30万字的“三亲”史料，为编辑工作奠定了好的基础，在此特致谢忱。

湖南文史资料

目录

第26辑

第37军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亲历记	陈燕茂	(1)
第二次长沙会战的经过	宋瑞珂	(4)
记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的两次战斗	肖子英	(17)
我参加第二次长沙会战的点滴回忆	徐志超	(19)
第10军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纪实	黄 钟	(22)
我在抗日空战中两次负伤的回忆	刘先儒	(27)
第四次长沙会战的片断回忆	张国泰	(30)
我参加长沙会战和被俘逃出的经过	黄小兵	(35)
第10军增援常德会战经过	李就夫	(42)
我所知道的常德会战	张九思	(47)
湖滨喋血	李晋忻	(52)
在洞庭湖歼击日军汽艇	郭坤森	(59)
衡阳保卫战追忆	朱懋禄	(61)
我从衡阳三次逃离虎口	毛啸风	(64)
湘西会战纪实	杨伯涛	(68)
回忆抗战初期的湖南救亡运动	曾国智	(77)
徐特立支持我们北上抗日	何 进	(87)
抗战初期中央军校在长沙招生点滴	周建烈	(90)
怀念伤兵医院的护士杨双梅	李 勇	(93)

武汉撤退与长沙大火	刘访滨	(96)
我的母亲率我从军抗日	黄天	(98)
回忆衡山青年战时工作队	谭安猷	(102)
在南岳游干班的日子里	刘东安	(109)
回忆在南岳游干班听叶剑英将军讲课	杨定一	(115)
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几段经历	雷政	(118)
我在南京失陷后的经历	徐述酒	(137)
王亚南教授同我们一道上前线	李恺宾	(140)
西安行营被炸目击记	程杰	(142)
湖广大捷的片断回忆	陈扬汉	(148)
我所知道的抗战初期河内刺汪行动	王方南	(153)
攻克密支那	黄福安	(159)
我在印缅参加对日作战的回忆	胡英杰	(166)
回忆反攻滇缅的龙陵之战	王卓超	(169)
湖南抗战大事记	钟启河	(173)

第37军参加 第一次长沙会战亲历记

陈燕茂*

国民党军第60师在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中，暂归第4军指挥，初守备罗店、扬泾河一线；是年11月担任总撤退的掩护，转战于江苏的常熟、无锡，安徽的东流、马当、宁国，挺进敌后的宜兴、溧阳，参加南浔路、瑞武路的战斗；至长沙大火后，开驻湘北。1939年夏，该师编入第37军，师长陈沛（第49军副军长），升任第37军军长，原军长关麟征升任第15集团军总司令。我则由60师的中校作战参谋升任37军参谋处上校处长，参加了第一、二、三、四次长沙会战。

会战前敌我兵力的部署

1939年9月，日本侵略军为了打破军事僵局，首图击溃我第九战区。其主攻方向为湘北，以赣北作为助攻。

日军第11军团长冈村宁次，由鄂中、鄂北分别抽调第3、第13两个师团主力和炮兵、工兵、战车、汽艇等部队集中临湘、岳阳两地，会同原在岳阳、退城的第6、第33两个师团，秘密向湘北进犯，估计其兵力约在10万人左右。长江敌舰，亦向岳阳方面集中。

第九战区兵力部署，除赣西支战场由罗卓英之第19集团军负责守备，洞庭湖西岸有第20集团军驻扎外，在湘北方面尚有11个军，连同5个挺进纵队和战区直属炮兵、工兵部队，总人

*陈燕茂原名陈祖荣，当时担任第37军参谋处长。

数约25万，超过敌人一倍半。此时，关麟征的第15集团军担任湘北正面的防御，所属52军张耀明部扼守新墙河第一道防线，右起杨林街，左抵洞庭湖东岸之九马咀。

我37军（军长陈沛）辖梁仲江的第60师、罗奇的第95师，担任汨罗江南岸右起浯口，左抵湘阴营田一线的防卫，为第二道防线。

会战经过

9月18日拂晓，集结在岳阳方面的敌第6、第13两师团各一部，在飞机配合下，分向我新墙河前沿阵地金龙山、草鞋岭猛烈进攻。我守军52军两个营屹立不动，坚守阵地5昼夜，为会战争取了时间。战至22日黄昏，两营长胡春华、史思华以下官兵全部阵亡，阵地始陷入敌手。

23日晨，敌在海、空军协力配合下，分三路南犯：一路由通城南下，向麦市、长寿街突进，企图绕攻我军右侧背。右翼守军杨森的第27集团军的第20军略事抵抗，便退避右侧山地，旋向平江山区撤去。一路于22日由正面新墙、筻口强渡新墙河成功，向平江、新市线大举进犯。我37军为掩护第一线友军撤出阵地，在新墙河至汨罗江中间阵地节节抵抗后，于24日始向长沙方向转移，而以60师的一部设伏于福临铺附近山地，从事敌后游击；敌另一路是在洞庭湖东岸之营田附近登陆，企图绕攻我军左侧背。时守备营田江防阵地的为我军37军95师的一个营。该营鉴于营田以北之尖沙咀，有湘江封锁线，布有水雷，而湘江西岸通洞庭湖汉的新发沟和突沟平时干涸，以为水路万无一失。不料当时连日大雨，水位徒涨，敌竟于22日晚以橡皮汽艇数百艘，通过新发沟、夹沟向我营田守军突然袭击。我守军利用既设工事奋起迎战，顽强阻击，营长以下全营官兵壮烈牺牲。敌于23日晨，在飞机掩护下攻占了营田，其主力亦迅速南

进。我军95师一部奋起反攻，顽强抵抗，支持至下午3时，退至东塘冲。此时，前来接替37军河防的70军先头部队一个团（55团）正赶到该地。该团接替防务不久，即与敌展开争夺战，一昼夜之间，两易其手，仍不能阻挡敌之南进。70军主力于24日向株洲方面撤退。

自23日以后，我军与各路敌军皆展开激烈战斗。我战区按预定计划逐渐由正面撤退，同时部署反攻，置重兵于两翼。25日敌由浯口、长乐街、新市、汨罗渡江分路向长沙进犯。26日和27日在福临铺、金井等地，受到37军梁仲江师、52军覃异之师各一部伏兵的袭击，因面南进的速度有所减慢。其先头部队29日进至长沙北面永安市、上杉市一带后，即行停止前进。敌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携带粮弹均已用尽，而前方补给全靠空投。同时，平江以东，汨罗以南，尚有未曾撤退的我军小部队。因此，敌酋第11军团长冈村宁次不得不于10月1日下令开始北撤。我军乘机反攻，跟踪追击。敌军于4日越过汨罗江，死伤甚众。迄6日，我军完全恢复原有阵地。我37军仍旧守备汨罗江南岸一线。军部设在清慢桥。这次会战只能算是一个平局，当时国民党宣传为“长沙大捷”，是为了鼓舞士气，未免有些夸张。当时有个《长沙大捷》的电影，是来我军慰劳的香港大地画报社李能光与我军合拍的，由我编剧，以95师283团詹抑强营为主，利用所俘获的日军大洋马、太阳旗、服装、大炮、橡皮艇等，演习当时敌我战斗情况，从而拍成了这部电影。

第二次长沙会战的经过

宋瑞珂*

上高会战后，我军战斗力日渐增强，加之苏德战争爆发，英美的制日行动亦较积极。美国宣布派军事代表团东来，同时禁止飞机、汽油输日，并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资金。日军深恐我军乘机反攻，便孤注一掷，纠集南北战场之精锐部队，大举进犯湘北，企图占领长沙。

其具体部署如下：

第34师团守备南昌、谢埠、沙埠潭、万舍街跨赣江亘厚田街、八尺铺、石鼻街、安义、仁首街、滩溪及吴城、永修、甘木关一带地区。

第14独立旅团守备德安、星子、九江、瑞昌一带地区。

第40师团守备阳新、大冶、金牛镇、通山、南林桥、咸宁、白霓桥一带地区。

第6师团守备大沙坪、崇阳、蒲圻、临湘、岳阳一带地区。

第3、第4师团、第13师团之第116联队，第18独立旅团之三个大队，由鄂中方面逐渐向岳阳集中。

集33师团之第214及第215联队，由武汉方面逐渐向岳阳集中。

第14独立旅团之三个大队，由赣北方面逐渐向临湘、岳阳集中。

第40师团，由鄂南方面逐渐向临湘、岳阳集中。

* 宋瑞珂当时系第九战区长官部高参。

第6师团，逐渐向忠防、桃林、西塘移动。

独立炮兵两个联队和独立工兵两个联队，由武汉向临湘、岳阳集中。

海军陆战队乘军舰30余艘，汽艇200余只，由长江向洞庭湖集中。

在武汉另有飞机100余架，支援步兵作战。

以上陆海空军，合计约12万余人。敌还强征民伕15万人担任粮弹运输和修筑向长沙进犯之简易公路。

我方参加第二次长沙会战的计有第74军、新3军、第3挺进纵队、江西保安纵队、第72军、第78军、第4军、第7挺进纵队、第58军、第26挺进纵队、第37军，第99军，第26军、第10军等部队。

具体部署如下：

在赣北方面：预备第5师警备梁家渡、市汊街之线，江西保安纵队警备市汊街（不含）沿锦河南岸迄车前渡口之线及港口、南港周家、七里岗各前进据点。新3军警备祥符观、峦岗岭、奉新、靖安之线及西山万寿宫、赤田张、宋埠、干州各前进据点。第2挺进纵队警备望湖岗、上东坑之线及茅山、横峰山各前进据点。第74军集结新喻、分宜、彬江大桥一带积极整训。第78军警备坳头坪、老塔下、火烧白、观音阁之线及潭坊、津口大桥河各前进据点。第72军集结三都南北地区，积极整训，并以一部警备留咀桥、周牌、东坑岭之线。

在鄂南方面：第20军警备杨芳林、湾口及斗米山、雪壘岭、通城之线及堰市、铁柱湾各前进据点，其134师集结桃树港积极整训。第58军警备九岭、琉璃坳、保定关、黄岸市之线及赛公桥、北港各前进据点，其新10师集结上塔市积极整训。

在湘北方面：第4军警备新墙河南岸公田、杨林街、鹿角、

磊石山之线及桃林、西塘各以东油港河东岸筻口、草鞋岭、大小桥岭各前进据点，其第59师集结关王桥积极整训。第99军第99师警备归义、营田、湘阴之线，其第92师集结上杉市、安沙积极整训。第37军集结瓮江、蒲塘、长乐街、白沙桥、石门源一带地区积极整训。

在湘西方面：第99军第197师警备芦林潭、螃蟹市、廖潭口、沅江、汉寿一带湖防。

军委会直辖归本战区督训部队的部署：第26军集结浏阳、普迹市及金井一带地区积极整训。第10军集结衡山附近积极整训。

根据本战区预定的“敌如以主力从杨林街、长乐街、福临铺道及粤汉铁路两侧地区向长沙进犯时，则诱敌于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两岸地区反击而歼灭之”的反击作战计划，我军在关王桥、大荆街及金井、福临铺、栗桥、三姐桥一带，构成纵深坚固阵地，步步为营，抗击敌人。然后转用赣北、鄂南兵力，于杨林街、关王庙、长乐街、平江、沙市街、永安市方面，自东向西侧击，并以有力兵团紧衔敌尾，打击敌人。同时加强外翼，对敌形成包围，断其后路，从而战胜来犯之敌。

这次会战，从1941年9月初开始，到10月初结束，中经大云山战斗、捞刀河战斗、洞庭湖战斗，终于获得了第二次长沙会战的胜利。下面将各次战斗经过分述如下。

大云山战斗

大云山横亘湘鄂边境，地势险要，为我军袭击敌人之隘，敌深感威胁，意欲攻占。

早在8月间，敌第6师团于武昌、岳阳之间来往频繁，扬言他去，以掩人耳目。9月3日，其师团长神田忽进驻西塘，翌日复至托坝视察。忠防、桃林等地敌军，亦各增至七、八千

人。6日中午，日军袭击我南山、雁岭、鸡婆岭阵地。7日清晨，敌第13联队及第45联队，突然分两路来犯：一路自忠防经南山詹家桥直逼南冲；一路由西塘经尖山刘家冲向八百市急进。同时，10架敌机狂炸八百市和杨林街。

我军第4军第102师，以“死守活打”方式与敌周旋，搏斗到中午，敌未得逞。午后，敌集中轻快部队，用大炮掩护，猛攻鸡婆岭、草鞋岭之线，激战久许，宋家坳阵地被突破。黄昏，百羊田、八百市、甘田一带均为敌军所占据，于是大云山阵地遂陷于敌军包围。8日晨，敌复自南冲来攻，企图合围，我军竭力苦战，不利，大云山制高点沦于敌手。

9日午夜，我军以第4军、第58军之新10师、新11师，第20军第133师从各方面合力截击、侧击敌军，敌北溃，我乘胜追击，逼使敌军退据五龙桥、百羊田附近。

10日清晨，我军新10师再次进攻，战至下午，克复大云山，并收复石塘冲、石壁桥，敌军退据石庙一线顽抗。茅冲、和尚庄、邓家桥一线敌人，经第59师、第102师各一部猛力袭击，伤亡甚重。当晚，我第20军、第58军攻击队与第6挺进队第8、9、10支队，分途向大沙坪、羊楼洞、赵李桥、石城湾各地之敌进行夜袭，以牵制敌人，断其联络。

11日拂晓，新10师、第59师、第102师、第60师等4个师合力会攻残敌。天亮后，新10师在八仙桥、五龙桥、石塘坳一线猛攻敌人，致使困守石塘坳之敌，不得不向甘田撤退。旋与我第59师、第102师各一部遭遇于甘田附近。中午，敌大部溃退至西塘，一部被我包围于港口东南地区。随后，敌增援部队赶到，进行反扑，双方搏斗至晚，遂成对峙。

12日，第58军军长孙渡指挥新10师力攻甘田西南之敌，第4军军长欧震亲率所部扫荡困据在港口附近的敌人。敌人一再增援，且陆空协同猛烈反扑，双方搏斗十分激烈，伤亡甚重。

13日以后，港口、甘田、白羊田一带地区，敌我两军进行了数日拉锯战。

此时，临湘、岳阳地区已结集了数万敌军，并开始南运。17日晚，筻口之敌开始大举进犯，一场更大的战斗即将爆发。

新墙河战斗

当敌我激战于甘田、八百市之际，敌军第33师团第214、215联队，独立第14、18旅团各3个大队，陆续分由鄂中、鄂南、赣北秘密集中临湘、岳阳。17日晚，筻口附近之敌，突然以大炮轰击潼溪街，旋复施放毒气弹，掩护步兵渡河。我第4军、第102师一部奋勇抗击。

18日凌晨，敌军万余人，藉大炮掩护，分途向小塘、四六方、潼溪街、杉木桥等处强渡，我第4军奋力抵抗。上午，敌机数十架在我阵地上空大肆轰炸，第一线阵地全被摧毁，我军伤亡惨重。数万敌军以骑兵数千、战车数十辆为先导，蜂拥渡河。中午，窜达长湖一带。

18日晚，敌主力窜至关王庙、大荆街，我第4军进行抗击，在消耗敌力后，按预定计划放开正面，主力转移至步仙桥、双石洞、洪源洞、向家洞一线，协同第20军、第58军对敌进行侧击、尾击。敌以为我军溃败，大军遂贸然深入。

汨罗江战斗

19日晨，敌主力部队陆续分经杨林街、关王桥及长湖大荆街公路直趋汨罗江岸。

我第37军正在南岸严阵以待，北岸亦有我先头部队向前搜索。当天上午，敌前锋与我军于长乐街北遭遇，激战时许，敌被击毙甚众。接着敌骑兵、炮兵配合数千步兵三面来犯，我守军一连浴血阻击，因寡不敌众，伤亡殆尽，长乐街为敌所占。

晚7时许，磨刀滩敌人开始强渡，守备在南岸的我军奋力阻击，激战通宵，敌未得逞。

20日凌晨，敌藉飞机、大炮掩护，再行强渡。上午7时许，敌我双方在伍公市、归义、河夹塘一线展开激烈战斗。

当日上午9时许，蒋介石电令说：“我军决确保长沙，并乘机打击，消耗敌人，第九战区其努力固守湘江西岸及汨罗江南，保持主力于外翼，求敌侧背，反包围而消灭之。第三、第五、第六战区自23日起，乘虚对敌发动全面游击，予敌严重打击，并积极攻袭荆宜及襄花、京钟、汉宜、荆当各路之敌，相机收复宜昌。”

我军于20日击毙大量敌军，克复兴隆山、马头岭、鸭婆尖、狮形山、西山庙及五公市、新市等据点，敌锐势大挫。21日晚，敌增援反扑，我又猛烈阻击，敌仍不得逞。这时汨罗江上游的敌骑兵四处窜扰，于21日上午7时许到达张家陂，并与从浯口渡河的敌人会合，继续南犯。

22日，汨水正面之敌第3师团，因我军连日阻击，未敢大肆蠢动。然自张家陂、浯口南渡之敌，不断增加，并以第6师团向东、一部向南分途突进。黄昏时，向东之敌直沿公路已到达三各塘。

向南急进之敌主力，于22日中午陷我筻江西之南阳庙、班君庙诸阵地。我军第140师则于栗山巷、大兴岭迎击敌军，激战两昼夜。

23日拂晓，敌第6师团继续以主力攻击我喻家关、风源洞阵地。另以一股向我右翼大迂回，我第26军奋力将侧翼向右延伸至横洞，并对正面之敌予以迎头痛击，然敌后续部队仍不断经三各塘、更鼓台向南流窜。黄昏，石湾、南阳之敌大量增加，向大头岭进犯。我第140师决死拒战，双方死伤甚重。晚9时许，敌骑兵扰袭金井东北及凤形山，我第10军预10师猛烈

阻击，敌佯退，接着敌骑兵蜂拥而来，我军增援反攻，在金井市街与敌搏斗，歼敌甚众。然栗山巷、麻峰咀却陷于敌手。

24日午夜，第27军各师及第99军第92师一部，按预定计划转移至官懋石、双江口、神鼎山之线，故始得大举南渡机会。上午9时许，敌以全力向我猛扑，进犯双江口及其以西地区。中午，敌我阵地犬牙交错，接着阴功桥阵地被敌突破，我军转守大桥、石门源以北地区，奋力阻击。黄昏，麻峰咀敌军窜到李家塅东侧。密岩山之敌亦窜至新开市。我军复转移至福临铺新阵地。同时，我右翼之胶甲桥、象鼻桥阵地及金井阵地，亦先后为敌占领。

25日晨，敌军主力猛烈进犯荷塘桥、学士桥、福临铺一线，其另一股步兵混合队，在铜盆寺南猛攻栗桥，我军奋力阻击，敌未得逞。中午，第20军第134师一举攻占长乐街以北1公里处的赤马江、三里牌，击毁敌军汽车20余辆，并击溃敌军坦克车队；第58军亦于大荆街附近重创敌军，击毁汽车10余辆。

26日中午，敌军以轻装部队2,000余人，由明月山向我迂回，我军转移至麻林桥、唐田铺、上杉市以南地区，对敌侧击。

捞刀河战斗

在日军逼近长沙时，薛岳决心聚重兵于主战场与敌决战，遂命第74军与第72军迅速西移，准备决战。第79军与暂2军亦经军委会命令集中长沙、株洲担任守备。

当我军开始移动时，敌机即追踪扰袭，但我军不顾空袭及疲劳，以一路纵队急行军，日夜奔驰。至24日，第79军一部已到达捞刀河南北岸及长沙东北部，进入既设阵地。25日中午，第74军第57师前锋，亦赶到黄花市附近，准备占领春华山至赤石河一线阵地，迎击敌军。

与此同时，我第37军、第10军正在金井、福临铺、栗桥一

线与敌主力激战，而敌之另一纵队，已乘虚进至沙市街、路口舖一带，其前锋已抢先占据春华山，我第57师仍奋勇攻击，敌拚死顽抗，战斗十分惨烈。

26日晨，第57师全部进入阵地，第58师一个团亦赶来参战，两部合力猛攻，上午9时许，收复春华山。

当天上午7时许，第74军、第57师在大坝桥以南至赤石河间地区向麻林桥南犯之敌展开攻击；第58师在永安市至春华山间地区，向路口舖南犯之敌展开攻击。

这时，我第37军、第10军自金井、福临铺之线逐渐转移，敌第40师团第33联队一部、第6师团分途蜂拥南下，与我发生遭遇战，敌乘我第74军尚未集中之际突然突击，我军奋勇还击，苦战至晚7时许，敌锋稍挫。第74军利用夜袭，夺取要点，至27日拂晓前，我军进至捞刀河以南地区。正继续进击时，敌主力部队以骑兵为先导，藉20余架飞机为掩护，自长(沙)平(江)公路向我猛扑，并以另一纵队攻击我大桥寨一线阵地。敌便衣队及汉奸四处活动，破坏电线，鸣枪扰乱。我军沉着应战，与敌进行拉锯战。中午，我第57师步兵指挥官李汉卿亲率军预备队及一个团，自春华山北向东出击。当时，敌后续部队参战者甚众，敌机轰炸亦甚猛烈，两军搏斗更是十分激烈，李汉卿及其部队1,000余人均以身殉国。第58师在永安市附近的阵地亦被敌突破，敌军乘隙南犯。

28日清晨，敌第13师团一骑兵支队，突进至东山附近，企图南下株洲。薛岳命令新3军新12师一部于马鞍山、白田舖之线严阵以待，敌骑刚到，即遭痛击。接着，敌步兵、骑兵4,000余人在32架敌机掩护下，自黄花市前来增援，并企图包围我军。我新12师前仆后继，愈战愈勇，团长刘世炎身先士卒，率众冲锋，杀声震四野，顽敌为之丧胆。下午5时左右，敌势稍挫。

29日子夜，第78军赵季平师从常德赶到岳麓山，清晨5时许，即渡湘江进入长沙城。这时，敌第4师团及第13师团一部，围攻长沙城郊。中午，敌势稍挫。薛岳令第74军、第99军分途向永安市、㮾梨市及石子铺猛攻。第37军、第10军由浏阳河南岸攻敌侧背，合围聚歼顽敌；并命第26军、第72军、第4速军、新3军等，向豺狗塢、路口舖、上杉市、麻林市、万家铺、新安铺之线急进，以防敌突围回窜。

当敌第4师团攻击我长沙城郊时，其第3、第6、第33、第40师团藉大量飞机掩护，企图渡过浏阳河。我第74军、第37军、第10军早已转移于洞阳市、子埠港，沿浏阳河南岸渡头市、枫树河之线，攻击敌人。29日中午，敌大部被我包围于梅花、田心附近，恶战至晚7时许，双方伤亡惨重。30日晨，我军再次猛攻，敌渐溃。中午，敌飞机10余架，轮番轰炸我阵地，掩护其主力北退。

这时，长沙城郊之敌，经我第78军两个师在捞刀河及城东郊内外夹击，逐渐支持不住，加以后援断绝，便于10月1日午后，在我军再次攻击下，无力抵抗，狼狈北遁。

追歼逃敌

10月1日午后，长沙附近敌军既全部溃散，薛岳命令第78军向新市、长乐街跟踪追击，命令第72军经平江西北山地向杨林街截击；命令第58军迅速超越浯口由长乐街、关王桥截击；命令第4军、第20军及第99军两个师，分别在金井、麻峰咀、青山市、马鞍铺，自东向西截击；命令第26军、第74军等清扫浏阳河、捞刀河两岸战场；命令鄂南指挥官王劲修亲率第4、第5、第8挺进纵队，于咸宁、蒲圻间截击；命令第6、第7挺进纵队于新墙、杨林街及忠防、杨林街间截击。

敌军自10月1日遭我围追堵截后，伤亡惨重，欲夺取湘阴

为抢运伤兵港口。3日拂晓，敌海军500余人，藉飞机3架作掩护，在湘阴城北箭毛嘴、马头山一带强行登陆，我军奋力阻击，敌伤亡甚众。上午9时许，敌机12架再次飞来轰炸我阵地及湘阴城区，并放毒气，敌稍获进展。晚上7时许，我援军赶到，立即进行反攻，敌又放毒气，战斗十分惨烈。接着，我锡江口炮兵对敌猛轰，午夜遂形成对峙局面。及4日中午，敌增援部队赶到后，再次发动进攻。自长沙北溃的敌第4师团主力万余人，窜至湘阴东南周家桥一带后，亦向湘阴城猛烈攻击。

这时，湘阴虽受敌围攻，且遭敌机狂炸，军民伤亡惨重，房屋大半被炸毁，但我守城官兵誓与县城共存亡，拚死力拒，搏斗至中午，敌未得逞。下午4时许，敌以飞机载伞兵数十人降落于北城及八甲，扰我后方，北溃之敌亦分途向我猛攻。此时，我守城官兵虽伤亡甚众，但仍奋力与敌人进行巷战，搏斗至7时许，守城官兵均以身殉国，湘阴遂为敌侵占。

4日晚9时许，薛岳申令：第4军应速由长乐街北渡，协同第58军自东向西截击；第20军由伍公市、新市渡河追击敌军；第99军及第78军速分途向新市、归义、营田、湘阴之敌追进。令下，各军积极行动。5日晚，各军均到达目的地，超越敌前第72军，也已赶到杨林街、黄岸市；第58军则早已在洪源洞及其以西地区严阵以待。于是狼狈北渡之敌主力，又遭我军截击。

6日子夜，第58军、新10军将主力部队分编为若干袭击队，并先编官兵多组，潜伏敌退路两侧，准备截击。凌晨3时，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击北溃之敌前卫，敌猝不及防，乱成一团，我军乘势冲杀。各潜伏小组亦四起阻击，遂使敌军人马互相践踏，死伤甚众。天亮以后，敌一再增援反扑，并用飞机、大炮不断向我狂轰滥炸，以掩护其主力北逃。我官兵亦前仆后继，奋勇冲杀，毙敌甚多，截获敌军用品、辎重无数。

此时，敌主力经我军一再截击，势如拉朽。而我第72军又

猛攻新墙、筻口，第4军亦赶至关王桥，协同第58军继续向潼溪街追击。第20军、第26军、第58军、第99军源源北渡汨水向北急进；各挺进纵队则四处破坏敌军交通，焚毁敌粮弹仓库，声势十分浩大。岳阳之敌惊恐万状，宣布特别戒严，纷纷转移重要物品，抢运粮食。

7日中午，薛岳指令各军追歼逃敌，并作了新的部署。8日，各军积极行动，分途向指定目标前进。9日，我第72军越新墙河向忠防、临湘一线急进。第58军、第4军猛攻桃林、西塘之敌，敌负隅顽抗，我军攻击甚烈。

此时，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率第2、第8两军逼近宜昌城。华中敌军便纷纷调动，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我军各部位置亦重新调整，不再穷追溃败之敌。于是第二次长沙会战，在1941年双十节前夕结束。

洞庭湖战斗

当敌军强渡新墙河之初，其舰艇亦同时在洞庭湖面蠢动，妄图乘隙窜入湘江，配合其陆军主力作战。

早在8月初，即有敌舰出没湖面，向我青山、华丰垸、增福垸、灵官嘴等地搜索。9月16日，敌海军集中军舰28艘、汽艇200余只，加配飞机24架，准备对我军攻击。

18日子夜，敌军舰5艘，汽艇50余只，浮游战车5辆，窜入石湖包，突然袭击我青山阵地，我守军一营奋力抵抗，敌未得逞。乃以一部绕至东湖及沈家湖，从侧面攻击我军，我军猛烈迎击，敌稍却。接着又由下青山正面强行登陆。上午7时许，敌机数十架，轮番轰炸，投弹700余枚，我军伤亡惨重。9时许，电话线被炸断，湖面满布敌舰艇，我军无法增援。

其时，新墙河南岸陆战正酣，敌水陆并进，企图南犯长沙。薛岳命197师务必确保芦林潭、锡江口各要点，以固江防。

19日中午，敌舰数十艘，经横岭湖进犯锡江口，我守军以战车防御炮猛轰，击沉敌舰2艘，毙敌数百人。接着又有敌舰数艘，窜入杨林寨湖，炮击锡江口左侧。另有敌舰10余艘，驶入团林港，围攻我畎口阵地，均被我军击退。当晚，第197师星夜将通往湘江的各湖汊要口，以木筏、树木、乱石、沙土等物严密封锁。

20日黎明，敌机开始轰炸锡江口、芦林潭。上午9时许，敌舰10余艘再袭畎口，并炮击老龙潭、团竹寺。我军集中战车防御炮及轻重火器于各湖汊要口，予以反击。下午3时，我军击伤敌舰一艘。

21日上午7时，敌舰7艘，汽艇10余只，自青山来犯团竹寺，并企图援救受伤军舰，我集中迫击炮及战防炮猛攻敌舰，鏖战时许，击毁敌艇3只，毙敌百余人，受伤敌舰亦着火下沉，敌兵纷纷投水潜逃。我以轻重机枪扫射，毙其海军少佐以下人员二、三百名。并缴获大炮2门及枪弹军用品无数，敌锋顿挫。中午，横岭湖面敌舰5艘，集中火力轰炸我芦林潭，掩护其陆军分乘汽艇10余只及帆船8只登陆，我军一排浴血抵抗，激战一小时之久，敌未得逞。乃另以汽艇10余只绕至斗米嘴附近，同时猛攻锡江口，至此芦林潭四面受敌。下午5时许，我守军牺牲殆尽。

为了确保江防之要点芦林潭，晚9时许，第197师李佐才团长亲率步兵两连和一个机枪排，乘夜反攻，敌军拚死顽抗，两军短兵相接，反复搏斗，激战达旦。至22日凌晨，终于歼灭残敌，收复芦林潭。不久，敌机6架飞临我军阵地上空，与三、四十艘敌舰配合再次猛攻我军阵地，我军勇猛阻击，敌几次强行登陆，均被击退。但我阵地工事几乎全被摧毁。下午3时许，敌再次增援猛扑，我守军一连，奋战整日，终因弹尽失守。

当日晚7时许，敌又集中步兵、炮兵700多人，分乘20余

只汽艇，猛攻斗米嘴，并以一部分兵力进犯我锡江口、团竹寺。是时，恰逢我援军赶到，进行反击，遂将敌压至斗米嘴东北隅。23日凌晨，横岭湖、东湖敌舰7艘，以大炮射击，阻我前进。敌机6架也再次飞临我阵地上空轰炸，我军伤亡甚众。中午，我空军大队飞临湖面上空，轰炸敌舰艇，敌焰稍敛。

24日凌晨3时许，我军再度增援反攻芦林潭、斗米嘴，我野炮击毁敌炮1门，毙敌5,000余人。我步兵乘胜挺进，再将斗米嘴敌军压至东北一隅，芦林潭敌军亦动摇。接着20余艘敌艇赶到，敌机复来轰炸，我军无法前进，乃以一部据守斗米嘴，主力返回锡江口。25日子夜，我军乘夜奇袭，毙敌甚众。中午，敌以4门大炮掩护其步兵进攻我锡江口阵地，我军奋起迎击。下午5时许，6架敌机凌空投弹，我军虽有伤亡，但阵地安然无恙。同时进犯灵官嘴、缺口之敌舰艇，亦为我炮兵击退。晚7时，10余只敌艇再次来犯，我军顽强抵抗，激战通宵。26日晨，敌乘晨雾弥漫，猛攻老鼠夹我军阵地，企图占据斗米嘴。经我军全力反击，敌又未得逞。

27日中午，敌大小舰艇10余艘，突然驶至虞公庙江面，对我阵地猛攻。28日晨，敌舰再来侵犯，并施放毒气，企图进入湘江。

29日下午5时，我军集中大炮开始反攻斗米嘴，芦林潭，全体官兵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向敌军勇猛冲杀，敌伤亡惨重。晚9时许，克复斗米嘴和芦林潭，残敌大放毒气，掩护其舰艇逃走。这次战役击沉敌汽艇2只，毙敌100余人，缴获军用品及文件甚多。

30早晨，敌艇4艘复由虞公庙江面南犯，经我炮兵还击，敌败北而逃。

10月1日，长沙近郊之敌开始全面崩溃，洞庭湖之敌亦因之动摇，但仍然不时以飞机及汽艇四处骚扰，防我进击。5日，敌军大部经湘阴、营田北逃，湖上敌舰亦远遁。7日正午，我军遂全部收复失地。第二次长沙会战告捷。

记第二次长沙会战中 的两次战斗

肖子其*

1941年秋，第二次长沙会战刚刚开始时，我接到军令部调我到桂林陆军西南参谋班学习的通知。但因战事已发生，我没马上去。当时我在第37军第60师第179团第1营第1连当排长。部队在第二天奉命增援新墙河，但途中又接到命令，要部队立即返回汨罗原防。我们知道新墙河防线已不可能坚守。

这次会战，上面的作战意图是：新墙河和汨罗两线部队，应利用有利地形，打击消耗敌人，使后方兵团有充分的时间调整部署。捞刀河防线的部队则应坚守阵地，待机反攻。新墙河部队不准退过汨罗河，汨罗河部队不准退过捞刀河。两线部队最后应向北转进，截击敌人补给线和阻击敌人退路，压迫敌人于湘江东岸，再将其歼灭。

敌人突破新墙河防线后，即南犯汨罗。我军凭藉汨罗江天险，给了敌人一个迎头痛击。然后部队边阻击边转移，最后到达水口桥之线再向北转移插入敌后。在转移中，我排是后卫，留下掩护部队撤离。当部队撤退时，敌人的火力都集中对准我排，我排伤亡较大。等到部队转移完毕，我排仍没接到上级新的命令，只好坚守待命。过了很久，等到我想主动撤下时，情况已不许可。这时敌军主力已开始直犯长沙，我们面对的敌人是一个中队，显然是敌人留下的侧卫部队。敌人可能看准了我

*肖子其当时任第37军第60师第179团排长。

们是一个孤立无援的排，企图在黄昏前吃掉我们。因此他们来势凶猛，直逼我阵地，随着膏药旗的摇曳，敌人一涌而上。此时，我勇敢的七、八两班长，从战壕中一跃而起，端起轻机枪，向敌群扫射，同时把密集的手榴弹投了过去。顿时，阵地硝烟弥漫，轰鸣之声震耳，敌人纷纷倒下，没死的趴在地上不敢弹动。但我七班长中弹牺牲，机枪也被打坏。全排只剩下一挺机枪了。在这一瞬间，我即率全排迅速转移到后面一个山头，逐步摆脱了敌人。我们沿小河沟向东走了一段时间，已到平江边境，遇到杨森的四川部队。这时天色已黑。由于几天几夜的急行军，我们已疲惫不堪，就在杨森部队营地一角，和衣而睡。醒来时天已大亮，吃过早饭，便启程追赶部队。走了两天没赶上。第三天下午，才赶上部队。连长告诉我，他们转移后已派了传令兵到我排传达撤退命令，大约这个传令兵是在中途阵亡了。这时敌人已由长沙溃败，我军准备截击敌人。可没想到，敌人逃得很快，我们的截击变成了追击。当部队接近李家塅附近时，经侦察发现一部敌兵正在前面山麓抢修便桥，因有一批车辆骡马要通过。我们得到情报后，马上跑步急进，接近时被敌人警戒部队发现。我方即命重机枪和迫击炮进行远距离射击，步兵则迅速向敌逼近。这一仗虽将敌人车辆骡马全部缴获，但敌人除少数伤亡外，其余都逃脱了。会战结束后，部队开到金井整补，我也离开部队，赶赴桂林陆军大学西南参谋班学习去了。

我参加第二次长沙会战 的点滴回忆

徐志超*

1941年春，我由中央军校毕业分配到第79军（军长夏楚中）第98师（副军长兼师长王甲本）第293团（团长李逸泰）第2机炮连（连长李新佐）任排长。驻在湖北渔洋关，为六、九两战区预备队，机动性极大。

是年9月下旬，日酋阿南惟畿指挥10万多人向我长沙进攻。强渡新墙河后，我军奉命驰赴长沙增援，途经常德、澧县、临澧、益阳等县。由于公路已被彻底破坏，天雨路滑，极难行走。加以日本飞机跟踪轰炸扫射，为避免无谓牺牲，经常停下隐蔽。但为了迅速赶到指定的宿营地，晚上也不得不行军，4天多后到达溁湾镇。下午7时多，几个师的人都坐在江边，等船过江，进入市区。那时我们每天只吃两顿饭，天未亮时吃了一餐后，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吃下一顿，此时，我们肚子饿极了，就躺在江边睡觉。等了两个多小时后，我们才过了江。但我军又被指定到白若铺（离长沙城约10公里）宿营，晚上12时才到宿营地。饭刚煮好，准备吃时，突然发现敌情，我们又开始行动，拂晓转移到了捞刀河，经过几天几夜急行军，全军将士疲惫已极。

次日上午9时多，在我们阵地约1,000米远的地方，发现敌人在几条田埂上成几路纵队向北前进，我师立即以迫击炮、重

*徐志超当时任第79军第98师第293团第2机炮连连长。

机枪向敌人猛烈射击，因出其不意，敌人伤亡很大。12时左右，敌机、敌炮轮番地向我阵地轰击，我官兵均掩蔽在简单工事内。下午3时以后，日军坦克20余辆，步兵1,000余人，分两路向我东南两侧猛攻，坦克在前，步兵随后，攻到离我阵地500米左右时，我军集中火力，勇猛还击，敌伤亡很大，迅速后退。

傍晚，王甲本师长亲自到阵地视察，问前面高地（鸡公山）是否有部队去守。团长李逸泰说：“暂时没有派部队去。”师长说：“要迅速派部队前去占领，如果被敌人占领，我军阵地将受到极大威胁。”团长即令第8连立即前往守备。连长唐辉庭年轻气盛，等全连开完晚饭后，才率部前往，结果部队刚到山脚，鸡公山顶已出现敌人的膏药旗了，该连只好暂时撤回。

晚上10时，团长命令第8连迅速攻占鸡公山，全团用迫击炮、重机枪掩护其前进。敌人面对进攻，一枪不发。不一会，天空发现第8连的信号弹，知道8连已进入敌人阵地，准备冲锋，我团遂停止射击，过了片刻，第8连冲锋号吹响了，官兵喊杀声一时惊天动地，第8连冲到半山时，忽然鸡公山上的敌人以异常猛烈的火力，向我8连射击，震耳欲聋。第8连官兵一时伤亡惨重，不得不撤退。连长唐辉庭、排长郝登高、李远志壮烈牺牲，全连120多人，生还者只10余人。随后团部又派第3营其他2个连再行攻击，仍未成功，营长黎富春英勇牺牲。原来敌人潜伏在山顶后背的工事里，当我部冲到山腰时，才进入阵地，用各种武器同时向我猛烈射击，居高临下，以致我部伤亡惨重。

日军占领鸡公山高地后，对我军阵地的威胁极大。黎明后，敌人的大炮和飞机互相配合，轮番轰炸我阵地后，数百名步兵跟在坦克后面，猛扑过来。我官兵沉着应战，当敌人的大

炮、飞机轰炸时，我们潜伏在工事内，这时敌人发起了冲锋，我们就进入阵地，进行猛烈反击。这一天我军打退了敌人的4次进攻，但我军伤亡也极大。

我们排有两挺马克沁重机枪，每枪都筑了几个射击阵地，以便遇着危险时及时转移。这天上午10时，敌人发现了我机枪阵地，用大炮向我一排王云甫班连发两弹未中，我要王班长转移阵地，王班长刚将机枪筒背上，敌人炮弹又落在了阵地上，王班长受了重伤，副班长罗玉简阵亡，机枪也被炸坏了，全班人员重伤的有七、八个，我的脚也挂了彩。但剩下的一挺重机枪，仍然在死守阵地。

敌人在炮击的同时，还用飞机丢下了许多传单，传单上有国货陈列馆、天心阁等照片，说长沙守军投降了，长沙城已被皇军占领。劝我军马上投降。我们很气愤，把传单撕掉了。我军虽然两天没吃饭，伤亡又极大，但仍然坚守着阵地。

晚上10时左右，团部通知撤退，决定向敌后转移，轻装出发。敌人发现我们撤退，只是射击，不敢尾追，我们离开阵地10公里左右，敌人才投有射击了。10月1日清晨，我们到了罗家大山，一面休息，一面派便衣到捞刀河阵地侦察，便衣队回来报告说，大队敌人已从我们阵地前迅速撤退。

原来日军占领长沙、株洲后，我九、六两战区大军，从江西、湘南、湘西向长沙猛攻，一部切断了敌人退路，日军才被迫撤退，此时我军奉令截击。日军不得不向我阵地猛攻，我军因伤亡惨重只好后撤，日军见无人阻击就乘机迅速撤走了。10月3日，我军再行追击，将日军赶过了新墙河。至此第二次长沙会战宣告结束。

第10军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纪实

黄 钟*

1941年12月31日晚，日军抵浏阳河北岸黑石渡、东屯渡之线，企图夜渡，为守卫长沙城的第10军第190师警戒部队所阻。当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设指挥所于岳麓山，薛将所有船只集中湘江西岸，令第10军死守长沙，背水而战。

1942年1月1日，抵廖家渡、洪山庙、黑石渡之日军第6师团与抵东屯渡之第3师团作出强渡浏阳河姿态：长沙南郊却无敌情。我军集中兵力把守东门与北门。上午9时许，东南角赤岗冲突然杀声震谷，我在赤岗冲构筑前进阵地的部队，奋起迎战，枪刚架好，敌人已至山腹，我军退守马家冲，立足未稳，敌人跟踪而至，又退守侯家塘，敌人尾随而来。我军一营长率两个步兵连反击，一举将敌人打退到马家冲，我军这才稳住阵脚。不多时，敌后续部队陆续到达，合力再攻侯家塘阵地，我预备第10师第28团寸土不让。敌炮则猛轰冬瓜山、扫把塘一带我军阵地。

当南门战斗开始时，东屯渡之敌炮击五里牌、杨家山、阿弥岭；北郊之敌炮击开福寺、伍家岭、周家咀、黑石渡。我炮兵部队也勇猛还击轰炸敌阵，并集中火力制压敌炮，至此，第三次长沙会战全而展开。当晚，北门之敌由周家咀，东门之敌由东屯渡渡过浏阳河。敌我在伍家岭、蒋家垅、九尾冲、黑石渡、五里牌、杨家山、阿弥岭等地发生激战，尤以五里牌战斗

*黄钟当时任第10军第190师作战科科长。

最为激烈。战至午夜，我军退守到开福寺、上潘家坪、唐家巷、上大塘、湖积渡、陈家山、杜家岭、袁家岭、窑岭、长岭之线；南郊我军仍固守侯家塘、扫把塘、冬瓜山一线阵地。

第一天的战斗，敌人渡过了浏阳河，攻占了我军在东郊、北郊和南郊的全部阵地。这应归咎于我方情报人员的疏忽，以致受敌人迷惑。开始我军上下注意力都集中在东郊、北郊，而不识其第3师团一部绕至东山渡过浏阳河，乘我不备，突袭南郊，结果我方匆忙应战，打了一天被动仗。

长沙市区西临湘江，东、北两面是浏阳河，象个口袋，袋口向南。日军采取由南向北进攻的策略，企图将我守军压迫于袋底一举消灭。

1月2日晨，北面日军第6师团炮击开福寺、上潘家坪、谭家巷、上大塘、湖积渡、陈家山；东面日军第3师团炮击杜家岭、袁家岭、窑岭、长岭；我岳麓山炮兵群对洪山庙、东屯渡敌炮兵阵地进行压制。上午9时许，敌第40师团接替南面的第3师团，猛攻我预备第10师阵地，长沙保卫战主决战全面开始。双方决战兵力是：日军减去强渡新墙河、汨罗江两次战斗伤亡约2,000人外，3个师团约有60,000人；我第10军因不满员，全军约20,000人。兵力比例为3:1。

10时许，敌3个野炮联队各以一部支援步兵攻阵，敌炮主力则与我炮阵对战，6架敌机也编队轰炸岳麓山我炮兵阵地与长沙市区。下午2时，各路日军白刃冲阵，随后北门开福寺、东门袁家岭、南门冬瓜山相继失守。我第3师反攻袁家岭，第7团复而据之；预备第10师反攻冬瓜山，第29团复而据之。黄昏，东、北两面敌军之步兵大部渡过浏阳河，南面第40师团也全部到达战场。敌3个师团向我发动黄昏联合攻势，我军奋勇抗击，彻夜激战。在零度气温下，我军将士斗志旺盛，愈战愈猛。但因城郊阵地部分失守，我军退守油铺街、湘雅医院、陈

家山、清水塘、韭菜园、识字岭、回龙山、白沙井、沙河街、楚湘街一线继续作战。

1月3日微明，李玉堂电话询问第190师师长朱岳：“陈家山怎么失守了？”朱答：“没有失守。”李玉堂责令查复，陈家山果然失守了。

我军每个阵地彻夜都有哨兵监视，陈家山怎么会轻易失守呢？原来前一天敌第6师团攻北门，受陈家山我军阵地炮火的袭击，伤亡惨重，攻击受挫。入夜，敌利用我守军在堡垒内瞭望视角缩小的机会，一个个匍匐潜行到山下集结，凌晨冲到山顶，占领了陈家山。我第570团团长李芝当即披衣督部攻击，终因敌人占领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火力猛烈，我军三次反攻均未能收复（战后营长吴子南离职，李芝告退）。

陈家山失守后，北门之日军第6师团与东门之第3师团连成一线，3个师团合围长沙城的计划得以实现，乃合力进攻。第40师团炮击回龙山、沙河街、南门口，第3师团炮击清水塘、小吴门、浏阳门、识字岭，第6师团炮击油铺街、湘雅医院、兴汉门、邮政局仓库（何键公馆后门）。我岳麓山炮兵强大火力立刻进行压制，敌炮火渐呈颓势，但步兵咄咄逼人。守湘雅医院之第569团团长符志豪告急，第190师师长朱岳督战于兴汉门；南门第30团团长葛先才告急，预备第10师师长方先觉督战于南门口；识字岭守军也力不能支，第3师师长周庆祥督战于天心阁，并对团长张振国说：“你我都是李玉堂军长提拔的，长沙守不住，军长是挽不回来的^①，于公于私，我们都说不过去！”张团长表示坚决与阵地共存亡，周庆祥说：“我陪你干。”周庆祥要求炮兵对扬家山、妹子山、窑岭一线的日军火力进行压

^①第二次长沙会战时，李玉堂率第10军作战失利，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被蒋介石免去军长职务，派钟彬接替。钟彬尚在途中，第三次长沙会战即爆发，蒋令李再率第10军作战，带罪立功，故部曲有“要回老军长之说”。

制。张振国增加两挺重机枪封锁窑岭至识字岭的道路，并增派一个排固守，识字岭险情方才缓和。

守小吴门之第568团团长陈家堂是李玉堂由军部工兵营营长提拔的，在战场上指挥若定。他是军校八期工兵科出身，长于阵地编成战术。该团严密布置十字交叉火网，另在要道口伐树枝堵塞，并堆放桌椅门窗封锁，还在敌人必经之地、必入之房广洒粪便。当各处告急时，唯独该团从容不迫，三挫敌人攻势。

此期间，李玉堂将称病不去督战的其山东同乡、某师副师长高某通令撤职，严肃了战场军纪，振奋了部队士气。

下午4时许，日军继续猛烈攻击，第3师团工兵营于韭菜园一带穿墙凿洞，窜入市区。位于藩后街以北之我军第7团立刻出兵堵击，位于小吴门内何键官邸之我军第569团阵营也奉令跑步前往堵击。第3师第8团由南向北，第190师由北向南，共同封锁敌后续部队，隔断内外之敌。入城之敌多是工兵，善于登楼爬屋，占领有利地形，我军也针锋相对，争夺制高点，双方激战至晚，城内外之敌均受挫，突入城内之敌团守待援。当晚，专与长沙守军联络的第九战区高级参谋容有略向守军宣告：我外围各军已按战前制定的“长沙决战案”到达指定位置。

1月4日，敌全面攻阵，炮火命中率惊人。国货陈列馆第3层有一窗朝北，敌军误以为是我军炮兵观测所，连续三弹俱从窗口入内爆炸，造成伤亡。近午，日军白刃冲击湘雅医院，被我火力击退。复集中掷弹筒轰击，因我军沿墙根脚开射击孔，又未奏效；再用平射炮轰击墙脚，轰得到处是洞，我军退守兴汉门抵抗。敌攻至护城河（大水塘）时，被我军扼止，这时，回龙山失守，预10师副师长孙明瑾前往督战；浏阳门吃紧，第3师参谋长孙鸣玉往阵地策军。三个师的正副师长均未回师部吃午饭和休息，惟李玉堂与参谋长蔡雨时在指挥所对坐

吃馒头稀饭，忽然一弹穿破玻璃击碎菜碟，并击折李玉堂一箸。李玉堂就用手抓大头菜吃。蔡问：“是不是换一个位置？”李答：“不动，不动。”蔡又问：“那我们就快点吃。”李又答：“不用，不用。”可见李玉堂之镇静。

下午，敌人炮兵阵地被我岳麓山的炮兵强大火力摧毁殆尽，惟闻我方炮弹迎着西北风，落到敌人阵地上的爆炸声。

薛岳电告李玉堂：“外围各军已全面反攻。第4军已抵暮云市、大托铺；第73军已由乔口渡过湘江，……望再坚持一夜。”喜讯传遍整个火线，第10军将士提出了“苦战一夜，打退敌人，守住长沙，要回军长”的口号。激战至晚，炮声息而枪声疏，侵入市内之敌，都系工兵，只会架桥凿洞，不善巷战，却是一根闹心钉。李玉堂令军部工兵营参战，配合包围敌人的步兵营，并令第190师副师长彭问津（黄埔五期毕业，茶陵人）统一指挥，务必围歼窜入市内的敌工兵营。我工兵纵火烧楼，追敌往楼下跑，再由步兵冲击。敌退我追，逐屋争夺，经三小时的火攻，侵入市内盘踞了一昼夜的敌工兵营，一部被歼灭，一部逃出城外。

1月5日天明，已不见敌踪。清扫战场时，发现有日军剖腹尸体数具，为下级军官。

第10军苦战4昼夜终于击退3倍于我的敌人。1月9日，国民党军委会派魏镇到长沙向第3师、第190师、预备第10师授“民族荣誉”旗；李玉堂获二等宝鼎勋章，并晋升为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10军军长。

我在抗日空战中两次负伤的回忆

刘先儒*

第三次长沙会战一开始，中国空军第1大队（轰炸队）、第3、第5大队（战斗队）和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组成“中美空军混合团”，以桂林为基地，与我军陆战部队和敌后游击队紧密配合，给予向湘北进犯之敌和敌后方空军基地以沉重的打击。

日军不甘心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失败，经过三年的战备，于1944年集结了实力雄厚的陆军部队，以武汉为基地，向湘北发动了第四次进攻。对此，我军也调集了精锐的陆空部队，给日军以迎头痛击，使敌人再次遭致失败，敌空军作战飞机大部被我军击落。

记得1944年5月14日，我国出动B—25中型轰炸机54架，P—40战斗机27架，轰炸汉口敌军机场。在团指挥部下达任务时，我们每一个指战员无不斗志昂扬。美国空军指战员因日军偷袭珍珠港吃了大亏，也报仇心切。在受命完毕散队登机时，大家不约而同的高呼：“我们同心协力，彻底消灭日本鬼子！”当时我是空军第一大队第四中队中尉领航员，与美籍空军中尉格恩斯同机，为第2小队的左翼僚机。我们机队穿过武昌东南15公里至武昌城边上空时，上下、前后、左右都是稠密的高射炮弹爆炸区。旋飞抵汉口上空，发现18架敌战斗机正被我战斗机队追击，只见有4架敌机被击中冒烟下坠，其余敌机散队低飞逃走了。我们按预定的高度和速度飞行，并结合风向、风力，准确地向指定目标投弹。然后，观察敌人机场的设施、仓

* 刘先儒当时系中国空军第1大队第4中队领航员。

库、油库等。与此同时，停在机场待修的10架敌机都被我炸弹命中，顿时火势熊熊，烟雾冲天。在返航离武昌西郊约15公里时，又遇着一片高射火力区。突然，我机向左猛侧，我的面部撞在座舱右边的菱角上，鼻梁被撞歪，鲜血直流，疼痛难忍。飞机恢复平飞后，我一面忍着剧痛紧张地工作，一面掏出药物包好伤口。与我同机的格恩斯伸出手轻轻抚摸我的伤口，致以慰问。当我们向舱外察看时，方知右翼中的油箱被高射炮弹击穿，有一个约6寸直径的洞眼，炮弹穿过时侥幸没有爆炸，4个油箱被打漏一个，所幸航程不远，影响不大。回到桂林机场后，救护车很快把我送到医务所诊治。经过一个星期的治疗，伤势好转。病愈后，我请求仍回队执行作战任务。

不久，日军企图夺取我西南战略要地——芷江。自1945年春开始，日军先后三次进攻雪峰山地区。我驻守在芷江周围的陆军部队部署得当，勇猛善战，配合空军给来犯之敌以沉重打击，这就是著名的湘西会战。

从1945年6月开始，湘、桂一带的敌军偷偷向北撤退，主要是利用清晨、黄昏、夜间行动。我空军严密监视敌人行动，夜以继日地巡逻在湘西至武汉及粤汉、湘桂等运输线的上空，只要发现敌军的汽车、火车和部队，我们都毫不留情地俯冲轰炸或低空扫射，十有九中。

在整个湘西会战期间，我所在的空军第1大队第4中队奉令驻扎在芷江前进机场执行作战任务。会战结束后的8月1日，我和分队长申云麟同机，下午6时由芷江起飞，巡逻至芷江东北90公里的公路上空时，发现36辆敌汽车正由南向北行进。敌人发现我机后，急忙停车，车上的士兵纷纷跳下车向两旁树林内躲避，我们当即向敌军俯冲轰炸。与此同时，也隐约看见敌军中有几支步枪向我机射出的微弱火光。在第四轮扫射时，一颗子弹从我左耳上挨头皮穿过，伤痕约有2厘米长，鲜血沿着左耳直

往下流，当时我没有惊动伙伴，悄悄掏出药物将伤口包扎后继续战斗。在第六轮扫射后，敌军已无动静，敌汽车大部分被炸毁，尚有16处还在冒烟。然后我机方上升回航。回到芷江机场后，我们下机检查了机身，发现从座舱至机翼、机尾中共中了7颗子弹，机尾还挂回两根长约一丈二尺的电线，真是危险极了。在同机伙伴的陪同下，我到药务所清洗伤口。队里战友得知我受伤了，都来看望。10天后，我的伤口已痊愈。此时，正是日军投降的日子，我感到万分欣慰。

第四次长沙会战的片断回忆

张国泰*

日军进犯前情况

日军三次进犯长沙，均未得逞，于是企图第四次进犯长沙，并为此作了充分准备。如1943年底日军攻占常德，其战略意图就是为了最终进攻长沙。我军及时侦悉到了日军的阴谋。据闻当时对此有三种对策：一是重庆军令部的意见，准备放弃长沙，诱敌深入至衡阳与敌会战；二是白崇禧的意见，也是放弃长沙，在湘桂边境的黄沙河会战；三是薛岳的意见，即在长沙与敌会战。薛岳是第九战区的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直接掌握湖南的军政大权，他保卫长沙已有经验，于是，薛岳的意见被采纳了。

日军进攻之前几个月，第4军已由浏阳移驻长沙，军部设在长沙城内，第59师驻黑石铺（长沙市南约10公里处），第90师驻岳麓山，第102师驻浏阳河附近（长沙东站）。城防部队由第59师每月派一个团轮流担任。

经过长沙大火和日军三次进攻，长沙人民吃够了苦头，城市破烂不堪。但因它是当时湖南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员来往频繁，所以还是呈现出热闹的景象。虽说是前线，但并不显得紧张。

长沙的兵力部署

大约在6月上旬，战区判断敌人可能很快大举进犯长沙，于是调第4军集中长沙待命。第59师（我当时是师参谋长）师

*张国泰当时任第4军第69师参谋长。

部设在天心阁附近，担任浏阳门以南沿南郊直至江边一线防御，并构筑和加强了城防工事，第102师师部设在浏阳门附近，担任长沙东面及北面防御，也构筑和加强了城防工事；第90师仍在湘江西岸，师部设在岳麓山下，担任岳麓山、桃花山之线防御。军部设在长沙城中心。

长沙沿江一带也构筑了坚固的工事，是用杉木一根根拼成的木棚，除了开有两个小门外，江边与岸上被木墙隔绝开来。

在得知日军由湘北出动的消息后，战区长官部发出市民疏散令，3日内市民便全部疏散完毕。第59师抽出第177团为总预备队，归军部指挥。军部还直辖了一个7.5厘米口径的山炮团及一个重迫击炮营，用于市区防御。另有一个15厘米口径的榴弹炮营（4门），用于岳麓山方面的防御。当时长沙备有足够的粮秣和弹药；还有两艘汽船，十几条木船，供东西两岸联络之用；长沙到西岸有水底电话线，随时能通话。长官部南撤后，为协助张德能军长指挥作战，特别留下长官部参谋长赵子立驻西岸与第90师一起共谋策划。战区还指挥有飞机，可供与长沙联系。以上说明我军在战前的准备是充分的。

战斗经过及决定渡江问题

1944年6月13、14日前后，每晚都有敌机在长沙上空盘旋，并用机枪扫射。市区内残留的少数不良分子，用信号弹与敌机联络。日军对长沙进攻，分作三路：一路向长沙以西（即湘江西岸）的桃花山、岳麓山方面进发；一路向长沙以北捞刀河方面压来；一路从长沙以东直奔城南。约在17日，三路敌军开始包围长沙。

6月15日下午3时左右，我军发现敌人在城南向市区进军，并向我警戒阵地及前进阵地开始攻击。战斗刚发生，便闻炮声隆隆，是我军榴弹炮的声音。不到半小时，据第176团报

告，我军警戒阵地和前进阵地被敌人占领，守兵撤回到了主阵地。当日西岸方面也发现了少数敌人，向桃花山、岳麓山进击。长沙东面和北面没有发现敌人。直至晚间，情况没有变化。

16日，敌一部向我城南阵地突出部红头山攻击。该阵地由第59师第176团第3营防守，战斗颇为激烈，从中午12时战至下午6时，敌人才占领了红头山。同时长沙东南面亦有敌军进攻，南面红头山左翼阵地一处也被敌军突入，但我军仍阻止了敌人的继续前进。西岸桃花山阵地我军第90师第207团于翌日被迫撤退。

17日，敌军向长沙我军主阵地攻击，战斗尚不激烈，阵地无变化。西岸敌人占领桃花山后，继续前进。我军山地阵线绵长，侧翼暴露，受敌威胁严重。该师师长陈侃认为守军势单力薄，阵地难以长久坚持，在敌军猛烈攻击下，请求长沙方面支援。当日上午，战区参谋长赵子立打电话给张德能说：西岸岳麓山守军只能坚持到当日黄昏，如果晚上没有部队增援，岳麓山就守不住了。张德能鉴于情况紧急，便召集各师长、副师长及军参谋长开会研究。结果认为派部队渡江增援，等于放弃长沙去固守岳麓山；不派部队增援，则等于放弃岳麓山而固守长沙。是守长沙还是守岳麓山呢？大家一时拿不定主意。第59师师长林贤察认为：这次会战要取得胜利，一定要确保长沙城。长沙工事坚固，粮弹充足，可以固守，以待外围援军的反攻，最后将敌歼灭。但西岸赵子立和陈侃等指出：岳麓山如果失陷，长沙必然暴露，将全面受敌人控制，最终也守不住；并且岳麓山不守，长沙与后方援军的通道就将隔断，那里岳麓山和长沙城都难保住，不若固守岳麓山，以待援军。军部参谋长罗涛汉也同意后一方案。张德能便也同意赵子立的意见，但他没有仔细考虑增援部队如何增援、运送部队需要多少时间、增援后是否能确保岳麓山等一系列问题，就决定翌日黄昏开始渡

江，并调整部署。

他命令第59师175团于黄昏后先行渡江，至岳麓山增援第90师的正面；以176团固守长沙主阵地，以待外围反攻部队的到来。其余部队逐次船载渡江，至西岸集结待命。

这时军部无线电台接到薛岳的两个来电，电文的大意是：长沙确保与否，是国家民族存亡的关键所系，望该军长晓喻各级将士奋勇杀敌，虽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亦要确保长沙。另一个电文是说岳阳附近敌军准备由湘江水运一些战车部队南下。于是张德能不得不重新考虑部队是否增援河西的问题，乃又找师长们商量。一些人认为，如果转移部队，长沙失守，责任重大，谁能担当？大家默不作声。无奈西岸方面电话催促不绝，苦苦哀求，张德能不能见死不救。最后，张德能说：“责任有多大就多大，由我张德能负，还是决定转移兵力。”这时已是下午5时左右了。

军长决心下定之后，忽来消息说敌人射来了瓦斯弹，就落在军部附近。当即一阵混乱，大家纷纷躲入防空洞内，大约半小时后不见动静，大家才出来。军部对部队渡江毫无准备，因此各师怕泄露计划，影响军心，故秘而不宣。

当时的战况，在长沙方面，敌向我主阵地攻击，无多大进展，直至晚间，枪声沉寂。西岸岳麓山方面，守军逐步退却，退守岳麓山，敌人进至岳麓山脚，占领岳麓山只是迟早问题了。

失 败 情 况

由于中午军部已经传出了渡江消息，军部各处及直属部队已作了些准备，虽然中间曾开会研究，但没有变更计划。时至黄昏，军部既没有制定周密的渡江计划，也没有专人掌握组织渡江，连船只分配、渡江线路都未落实。首先是军长、师长等渡江，留下副师长、参谋长指挥队伍；副师长布置了各团任务

后，便争先渡江，只留下参谋长。当时长沙城外已受敌包围，我军1万多人如何出城渡过湘江成了大问题。江边防御工事坚固，现在拆除并非轻易之事，两个小门一次都只能通过一个人，木栅最终对自己起了障碍作用。

指定增援西岸的部队还没有来到边江，军部直属队及携带公文行李的各处人员便争先恐后地向江边进发，人多门少，不到一刻钟道路堵塞，就摆起了一条长龙，水泄不通，杂乱情况，无法叙述。后经军部特务营维持秩序，才稍好一点。

横渡湘江要分两次，因为在江中有个水陆洲，长沙至水陆洲，火轮来回要半个小时左右，木船来回一次则要一小时，由水陆洲再到西岸，大概也要这么长的时间。

半夜12时左右，增援部队第175团向渡江地点进发时，见人马拥挤，不能前进。团长陶富乾预料即使到达江边，亦不易找到渡船，与其坐守等候，不如突出敌围。该团乃将队伍折回东南方向，乘半夜突围出城。

至下半夜3时左右，由长沙至水陆洲只剩一艘火轮，每次可载运200人；由水陆洲至西岸，也只有木船10来只，每只可容20至30人。当晚渡过了多少人，无人统计，也无法统计。

我在早晨4时左右抵达西岸，西岸江边寂寂无声，我想到岳麓山脚附近找到司令部或队伍，亦不见声息。我徘徊了10来分钟，知天色快亮，此地不能久留，正要离开，便闻步枪声从山巅传来。不久，敌机开始轰炸岳麓山地区。我离开岳麓山之后，遇着了一些师部参谋和连排长，便同他们一起向湘潭方向走去，沿途士兵不计其数。不多久，又发现守西岸的队伍纷纷到来，不用说岳麓山已经失守了。

留守长沙的176团团长屈化平知道长沙守不住，不守又有责任，就只身走了。副团长李春鹏则率领少数队伍南下，长沙遂于6月18日沦陷。

我参加长沙会战和被俘逃出的经过

黄小兵*

1942年，我从中央军校第17期炮兵科毕业，被分配到炮兵补充兵训练处第1团第1营第1连任少尉观测员。1944年3月，我炮兵补充兵第1团第1营拨归第九战区指挥。4月，奉命由云南曲靖步行出发赴湖南。

第九战区长官部派人到贵阳迎接，并命令我部乘专列赴桂林装备美式火炮后火速开赴长沙，向第4军报到并受其指挥。我炮兵营在桂林领取美式火炮及其它装备后即乘原专列赶到衡阳，换乘船只分两批在我空军掩护下驶抵长沙。此时第4军已派工兵营和辎重营在湘江岸边迎候，并协助我们清除了进城道路上的障碍，将火炮运载到城内指定地点。这时日军已推进到长沙外围郊区。按当时的部署，我美炮营第1连射击目标是湘江东岸长沙城南各据点，第2连射击目标是长沙东面各据点，第3连射击目标是湘江东岸长沙城以北各据点。进入阵地后，我营便奉命向各射击目标进行炮击，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在这以后守城之战的10多个日夜里，守城部队在我炮火的有力配合下，英勇杀敌，击退了日军数次猛烈进攻，虽然日军兵力数倍于我，但由于伤亡惨重，日军放弃了攻城计划，而把攻击的重点转指向我兵力部署的薄弱点——岳麓山。

当时我长沙守军的兵力是这样部署的：守城指挥官是第4军军长张德能，兵力有第4军的第59师和第102师，分别防守

*黄小兵当时任国民党军炮兵补充兵训练处第1团第1营第1连少尉观测员。

长沙城东南半壁和东北半壁，张德能的指挥所设在天心阁，与我美式炮兵第1连观测所在一起；担任岳麓山防守指挥官的是第九战区参谋长赵子立，兵力有第4军的第90师及炮兵第3旅的几个炮兵连。战区长官部给张、赵二人下达了“死守”的命令。当获知日军将攻击重点转指岳麓山的情报后，赵即要张抽调兵力过江予以援助，张接赵信后，于6月17日午夜才率一部兵力过江支援。但长沙城内守军却失去了指挥以至军心一时大乱。

我美炮营初至长沙，地形不熟，本身又缺乏自卫能力，待我们撤出阵地渡过湘江抵达岳麓山山脚时，岳麓山已被日军占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仓惶撤返湘江东岸，与其它部队一样，除遭敌炮击牺牲或被江水淹死的外，活着的全部被日军俘虏。

此次长沙会战失败，有着血的教训。按当时情况看，虽然日军兵力多于我，但我军空军占有优势，我炮兵火力亦颇强大，加之是为保家卫国而战，官兵士气旺盛，即算难以取胜，至少也可与敌相持一段时间，不至遭受如此惨败。但是，由于指挥官无能，指挥不当，随意调拨部队，终使我军失去战斗力。事后，张德能经重庆军事法庭审判后被枪决。

长沙失陷后，我众多官兵被俘，大都关在湖南第一模范监狱（即现在的湖南绸厂），我在被俘营第13连担任连长，全连有120多人。在被俘营里，我们遭受了非人的待遇。每人每天只能吃四两无菜无盐的霉米饭，每天都有人饿死。还有不少人因伤势恶化得不到医治而死去。更有甚者，一些俘虏经常被枪杀或打死，死者均被弃在杜家山（即现在的烈士公园），不准掩埋。由于不堪忍受日军的虐待，我暗地里不断动员大家找机会潜逃。

当时，我在狱中结识了一名看守士兵，他叫韩必东，是朝鲜人，当兵前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学生，由于侵略战争吃紧，他

和所有的大学生一样被日本政府强征入伍，要服役三年才准予毕业。监狱看守中共有三名朝鲜人，另外两名叫金本和新井，与韩均是同学。我从与韩必东用简单的汉语交谈中知道，他们都不愿在日军里服役，并且对侵华战争有不满情绪。后来他们又表示，只要我们为他们保密并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他们愿意帮助并且和我们一起逃跑。

在我们被俘人员中，原来职位较高的除了美炮营中校营长任修（黄埔11期毕业）和第1连上尉副连长杜宏献（黄埔16期毕业）外，还有第90师某团上校团长朱荣（黄埔4期毕业）和第102师某团副团长张某。我把和韩必东谈话的情况向他们4人详细讲了，他们都表示可行。经我们商讨决定，先由炮兵第2连弹药队长李德芳和炮长李长生及朱荣的两名亲信先逃，逃出后去找长潭自卫游击司令邓如灿联系争取救援。因为邓如灿曾在朱手下当过营长，二人交情很好。这个计划确定后，由我再找机会与韩必东详谈。10月的一天，韩必东交给我一个纸团，我打开一看，上面写着他今晚9点至10点、11点至12点当班，地点在监狱东北碉堡附近，要我和他一道出逃。我赶忙把这一情况讲给朱、任二人听，并安排李德芳、李长生等4人作好准备。晚上，我带着他们四人偷偷摸摸地出来，走到第二道围墙时，有一个日本哨兵站岗，他哼了一声，我也同样地哼了一声就过去了。快到碉堡附近时，韩必东果真站在那里，他来到我跟前，抓住我的胳膊连声说：“要下班了，等等再、等等再。”说完就走开了。我们因没有表，时间掌握不准，晚了。韩说的“等等再”，是要我们11至12时再来。但我们不能再回住室，一是怕耽误时间，二来怕路上被日本哨兵发现。于是我们5人就在路边常青树后面的屋脚下隐蔽着，利用常青树作掩护。在这段时间里，一个日本哨兵不停地在路上来回走动，吓得我们连气都不敢出。当韩必东又一次当班向左右哨兵喊话时，我们才站起

身来。他一看到我们，就说：“快快的，快快的。”接着他又大声地向左右哨兵喊了话，便带着他们4人上了碉堡，我也连忙溜回了住室，不知为什么路上没有碰见日本哨兵。谁知，刚回到住室不一会，便听到一阵铃声，随即冲进来10多个日本兵，叫喊着起床集合，我心里紧张极了，出了一身冷汗，幸好，日本兵只清点了一下人数，没追问别的。我连恰好原来多几个人，因而没查出少了人。大家都议论纷纷，不知出了什么事，只有我和朱团长、任营长等几个人心里清楚，暗暗祈祷李德芳他们能够安全逃出，实现我们的计划。

第二次出逃的情况是：李德芳等4人走后半个多月没有消息，我和朱团长、任营长几个人心里焦急不安，于是又一起议论第二次出逃的办法。这次，我安排我的两名炮长张治国和肖俊准备绑腿20付拧成一条4米的粗绳。又过了几天，在一个阴雨的晚上，我们计划利用有利的天气出逃。我安排了张治国、肖俊二人带着粗绳在监狱西南角碉堡上等我，然后我和朱团长、任营长、杜副连长一起偷摸了出来（张副团长卧病在床不能行走，故未一起行动）。我在前面，朱团长等三人跟在后，相距约几十米。待我快要接近碉堡时，听到一声发问，我以为是张、肖二人之声，就答道是我，谁知却从碉堡内冲出两名日本兵，我见情况危急，心里一惊，随即喊到：“这里不能走，快回去！”任营长他们听到我的喊声，转身跑回了屋里，这一下惊动了日本兵，他们打着手电到处巡视。我被两个日本兵拎着胳膊架到了卫兵室，室内有十多名日本兵虎视眈眈地坐在椅子上，他们让我坐在小木凳上，对我进行审问。我一口咬定出来解手摸错了路。因语言不大通，又没有什么证据，审问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日本兵都走了，把我一个人关在房子里。

这时，我感到身体很疲倦，就坐木凳上打起盹来，天刚亮，一个日本卫兵长领着几个士兵气冲冲地开门进来，将手中

的粗绳子和两套中国士兵穿的军服（我被俘人员仍然穿着原来军服）朝我面前狠狠一摔，一个士兵还重重地打了我两记耳光，鲜血顺着淌下。我知道事情已经暴露，只好一声不吭。接着，几个日本兵用粗布绳将我的双臂拧向背后捆起来，把我吊在了屋梁上，用鞭子和竹棍朝我身上一阵乱打。开始真是疼痛难忍，到后来只感到浑身麻木，衣服被打得一条条的，和血粘贴在身上。直到中午，才将我放下来，松开了双臂，我疼痛难忍，靠着墙瘫坐在地上。后来，一个日本兵给我端来一碗米饭，我虽然又难过又难受，不想吃饭，但想到下午还会挨打，吃些饭也许会好一些，就去端饭碗，但手无论如何也握不住筷子，只好用手慢慢地扒着吃，这一碗饭吃了约有一个多小时。到下午，几个日本兵又将我捆吊起来，不过没有象上午那样抽打，只不时地用竹棍在我头上或身上敲打几下。晚上9点左右，新接班的卫兵长将吊我的布绳稍稍往下松了松，使我的两脚足尖能触到地上，就这样一直吊了一夜。第二天吃过早饭，日本兵又将我捆吊在监狱大门旁侧，用鞭子、竹棍轮番抽打。那里是被俘人员进出经过的地方，他们的目的是杀鸡给猴看。现住长沙市朝阳二村7栋1门2楼的湖南轻机厂退休人员左寿亭同志，就是目击我被吊打情景者之一，他当时任被俘人员第15连连长。

当天晚上，日兵又将我关在卫兵室，一个认识我的卫兵长给我端来了一碗甜稀饭。第二天吃过早饭，由日军官领进来两个人，其中有一位是中国人，这个人自我介绍姓朱，现在是翻译。另一位日本军官，是华中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情报处的大尉参谋，叫宋宫。姓朱的翻译对我说，总部接到了上报材料，说是越狱未遂。于是，便派宋宫大尉来处理我的问题。姓朱的又说不要怕，有啥说啥，如果诚实回答问题，他可以救我。说完还掏出总部批文让我看，大意是要集合全体被俘人员将我砍

头示众。接着，日军官宋宫用不流利的汉语向我提问题。开始，他假惺惺地说：“这两天你受苦了。日本士兵对你太无礼。”又说他很敬佩蒋委员长。还说他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等等。接着便问我：“你为什么要越狱潜逃。”我说：“第一，你们日本兵心狠手辣，时常无故打骂我被俘人员，士可杀而不可辱。第二，饭量太少，每天都要饿死人。第三，天气已经寒冷，我们被俘人员只穿一件单衣，晚上睡觉全都睡在水泥地上，会冻死冻残。第四，被俘的伤病员无医无药，已死了不少人。如果不逃，不被打死也会饿死、冻死、病死，如果逃出去，还可以活下来。”他听后哈哈大笑，说我说的是实情。宋宫又问我，那天晚上碉堡外的两套军服是谁的。我想，反正张、肖二人早已脱离危险，就如实地告诉说是我的两名炮长的衣服。宋宫听后“哦”了一声，想了半天又问我还有谁想出逃，我回答说人人都想出逃。宋宫听了此话站起来踱了几步，然后装出很关心的样子对我说：“你说的几个问题可以解决，放你回去后要向大家讲明，如果再逃跑格杀勿论。”宋宫开始说放我回去，我并不相信，后来，姓朱的说，宋宫大尉说了就是真的，并领着我回到了原来的屋内。

第三次出逃是在同年11月间，那位姓朱的翻译来监狱找我，说是上司有令，将我与朱荣团长、任修膏长、杜副连长4人从监狱调出去，安排住进了长沙市兴汉门湘春路12号的一幢楼房里。这幢楼房上下两层，我们4人被安排住在楼上后半边，前半边左侧前后有两间房，前间是日军官宋宫的居室，后间是姓朱的居室，右侧两间是饭厅和会客室。楼下是日本兵住室和厨房。后来才知道这是日军司令部情报参谋部的一处办公室。

第三天晚上，姓朱的翻译带着我们4人（其实背后跟着几位日本兵和便衣）去长沙中山路银宫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是韩兰根和殷秀岑主演的《难兄难弟》。第四天上午，姓朱的又

带我们上街逛了一圈，沿街有不少日本兵和便衣人员与朱打招呼。当我们走到天主堂医院附近时，朱团长看到了他手下的一位连长，这位连长也看到了我们。自此，那位连长就远远地跟在我们后面，直到进了楼房。当天晚上，姓朱的给我们每个人几张白纸，要每人写一份自传，限一星期交卷。第五天上午，他又用手相机给我们拍免冠照。这样一来，我们才基本搞清了敌人的意图，可能是要利用我们为他们做工作。

自从那位连长见到我们后，不时来我们住室附近踏腿观察。第九天早晨，那位连长又来了，朱团长假装出去买东西和他接上了头。他回来告诉我们说，外面出逃的路线和接应都已经安排好了，必须立即行动。恰好姓朱的不在屋，我们偷偷地摸下楼，朱、任二人在前，我和杜副连长在后，穿小巷赶到了湘江边，有人将我们带过江去，渡江后到溁湾镇又有人接应，把我们送往岳麓山后山，那里是长潭游击队活动区。下午6时许，我们来到了长潭自卫游击队司令部。次日，李德芳和李长生二人来看我们，诉说了他们和韩必东一起出逃的经过。并说韩必东已由别动队带交上级有关部门收留当了翻译，我有心去查找这位朝鲜籍的日本朋友，但因故终未如愿以偿。

我们数人在长潭游击队司令部住休10多天后，便一路步行到湖南郴州，向第4军报到，后被安排在附员队。次年春，我和杜宏献二人被送至江西横峰县莲河镇，参加中央干部训练团军官大队第13队培训，结业后被派到青年军第208师工作。

第10军增援常德会战经过

李拔夫*

常德会战时，我是第10军预备第10师的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随预备第10师（以下简称预10师）参加了常德会战，关于第10军整个军的战斗部署以及作战经过，我在会战后听到军长方先觉谈过一点轮廓，现将记忆所及略述如下。

第10军兵力及其部署

第10军（军长方先觉）辖预10师（师长孙明瑾）、第3师（师长周庆祥）、第190师（师长朱岳）3个师和军直属部队，为九战区的机动部队，归薛岳指挥。第10军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后，移驻衡山整训的各师官兵均不足6,000人，加上军直属部队，全军不到2万人。

整训后，预10师驻衡山龙头湾，第3师驻石湾，第190师驻朱亭一带，军部仍驻衡山。

1943年11月下旬，第10军奉薛岳命令，限时赶赴常德救援。全军于11月28日由驻地出发，其行军序列依次为第3师、预10师、军部、第190师。由衡山至常德300多公里，当时计算行程，难以如期到达目的地，因此我们取道湘潭、宁乡、益阳、沧水铺向常德急行军前进。军部由马迹塘渡过资水，经黄土店于12月2日抵兴隆街。第190师亦由三堂街附近渡过资水，经牛路汰向德山前进。是日第3师进至石门桥附近宿营，军部则在兴隆街驻扎。经过4天的急行军，部队疲劳已极。

* 李拔夫当时任第10军预备第10师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

12月2日夜晚，军部得知敌情：日军第3师团和第68师团向常德进攻，一路由津市、临澧，一路由安乡，其主力在安乡方面，先头部队已进至厂窖附近。

第10军为阻击日军南侵并策应常德守军第57师余程万部确保常德，当晚研究了敌情、地形，认为日军有由牛鼻滩方面渡过沅水先我占领德山高地的企图，遂决定先行占领德山。即以第3师为右纵队，向德山前进，任务是占领德山；以预10师为左纵队，向南站、德山一线前进；第190师为军预备队，集结于牛路汰以北地区；军部仍驻兴隆街指挥作战。

预10师作战经过

预10师辖3个团：第28团（团长葛先才）、第29团（团长张越群）和第30团（团长李长和），师直属部队有特务营、迫击炮营及工兵连。预10师于11月28日由衡山驻地出发，经过4天的急行军，于12月2日到达兴隆街以北某地。在距宿营地尚有5公里左右时，天已黄昏，有敌机一架在部队上空侦察良久。至宿营地后，得军部通知：预10师为军的左纵队，应于3日拂晓向德山前进。预10师研究敌情后认为，明日白天行军有与敌遭遇的可能，便不顾疲劳，提前于3日凌晨3时许出发，以28团为先头部队，向德山前进；29团在28团左翼，师部和直属部队随28团之后；30团则在师左侧后跟进。师部和直属德纵所选的行军路线有一段是小丛林地带，道路狭窄，搜索、了望均感困难。上午8时左右，师部行至上斜山附近山隘时，遭到日军伏击，官兵非死即伤。随后的直属部队无法展开，各自脱离阵地。战斗中，师长孙明璕被敌机枪射倒阵亡，参谋长何竹本负重伤后被俘，参谋处长陈飞龙阵亡，其余幕僚人员也伤亡甚多。我在师部后尾行进，仅以身免。28团于上午8时左右在放羊坪附近与敌遭遇，激战2小时，团长葛先才负重伤，官兵阵

亡甚众，该团残部且战且退。29团亦尚未展开即遭到敌人侧击，被敌人冲散。30团在师的左侧，听到师长阵亡后即撤走。

我到兴隆街时已是黄昏，军部已离开兴隆街进至某处，在第3师方面指挥作战。入夜，闻枪炮声越打越近，我乘月色往沧水铺退走。次日上午抵沧水铺，见本军士兵陆续从前线退下来，我只好收容伤病士兵往益阳桃花江集合。经过两天，收容了预10师的官兵700多人，第3师的官兵亦不少，但190师的官兵却很少。方先觉于10日左右来到桃花江，我见他时，他口中大骂要枪毙朱岳，说这次战败完全是因朱岳不听指挥，同时又怨薛岳不应直接指挥第190师。他问了我收容的情况之后，派我代理预10师师长，在桃花江整训部队。次日，29团张越群、30团李长和亦先后率残部队到达桃花江，预10师合计还有2,000多人，遂恢复了建制。在桃花江停留了10余天后，第3师亦来附近某处集合；第190师则在太子庙以南某地集结。全军于12月下旬回师衡山原驻地，补充整训。

预10军被击溃，主要原因是12月2日行军至兴隆街以北地区时，被日机侦知了将要宿营的地点和行军方向、路线。敌人于是日黄昏时派出部分兵力进入丛林地带埋伏，狙击预10师的首脑。所以预10师于3日拂晓出发后，行进不到15公里，就遭到敌人的伏击。其次是师长孙明瑾实地作战经验太少，疏忽之处太多。例如2日晚在研究敌情时，并未将敌机侦察我军的现象加以判断；对于部队经过复杂丛林地带时的警戒搜索，没有注意部署，以致遭到伏击。

第3师作战经过

第3师兵力与预10师相等，为军的先头部队，在预10师的右翼。该师先预10师一日到达三门街，12月3日由三门街出发向德山前进，估计是日可以抢占德山高地。可是敌人已先第

3师于2日下午进占了德山，另有一部向南站方向骚扰。第3师于午后展开，攻夺德山。经过激战，突破了敌人阵地，占领了一处高地，但伤亡甚众。这时预10师已被敌阻于上科山、放羊坪一带。军长急命第190师增援，可是190师到达牛路汰后，朱岳获薛岳电令，要他准备协助第10军右翼的友军暂54师作战，因此未能及时执行方先觉的命令，而按兵不动，以致第3师缺少支援，未能确保所占领的阵地，达到增援常德目的。同日常德守城部队第57师余程万部也遭受敌人飞机、大炮和毒气的攻击，损失甚大，放弃了城垣，纷纷由下南门渡到沅水南岸，师长余程万本人亦乘…小木船往下卡方向逃走。周庆祥睹此情景，认为有被包围之险，遂带领参谋长、副师长及卫士10余人冲出德山，乘船向太子庙方向而去。第3师各团残余部队七零八落，群龙无首，退守一线。时已入夜，警戒枪炮声通宵不绝于耳。次日，军长方先觉亲自前往督战，率第190师一部分兵力以及直属部队前往增援，将第3师残部重新部署，准备再攻德山。至7日，敌人已开始自动撤退，周庆祥亦回到第3师，与军部汇合，并重整部队。

关于190师作战的经过，因朱岳未执行方先觉的命令，方对他恨之入骨，未曾提及。我无从了解。会战后，该师仍归回第10军建制，回衡山原驻地整训。

第10军参加常德会战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薛岳认为常德是第六战区管辖地区，在日军进攻常德之前，对其企图和行动未密切注意，以致被动。其次是第10军，以疲惫之师，在对敌情、地形未能确切判明的情况下作战，因此难以取胜。

常德会战后，薛岳认为第10军作战不力，且不听指挥（方先觉因190师未能听命增援第3师，曾在电话中与薛岳争吵过），未能完成策应守城部队的任务，结果方先觉被调职，以钟彬接任第10军军长。后经李玉堂在重庆将第10军参加常德会战

的实际情况报告顾祝同，请其向蒋介石说项；同时第10军全体官兵愤愤不平，通电请求中央保留方先觉原职。钟彬见此情况，迟迟不愿到差，拖了两个多月；方先觉亦亲自去重庆向蒋介石请罪，进行活动，适逢日军有第四次进攻长沙之势，蒋介石遂令方先觉担负守卫长沙的任务（长沙会战后复调守衡阳）。

我所知道的常德会战

张九思*

1942年夏，我在西安陆军大学参谋班特三期毕业后，被分配到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任作战参谋。

我到参谋处不久，就赶上了常德会战的部署工作，自11月2日至12月30日，我参与了兵力部署、部队调动和作战图表绘制等工作。

常德会战时敌我兵力部署

10月下旬，日军以原驻湘北、鄂西之第40、第13两师团的大部兵力，首先占领华容、石首、藕池口、弥陀寺等处前沿阵地为掩护，并分别由赣北、荆沙、安庆、芜湖抽调第3、第68、第116师团全部，第34师团大部，第58师团及第39师团的几个联队，独立第17旅团的一部与毒瓦斯队、辎重队、空战队等共约10万余人，于11月2日开始向我第六战区发动全面攻势。由第13师团长官横山勇，坐镇观音寺指挥。

第六战区根据敌人的战略部署，将敌主力引入沅江地区作正面抵抗，我主力由西北作轴心攻击，把敌人压阻在洞庭湖畔予以歼灭。以第29集团军的第44军三个师部署在华容与藕池口之间；第10集团军的第79军三个师和第66军两个师部署在藕池口、宜都以西地区；第26集团军部署在当阳西北；第33集团军则部署在荆门以西地区。同时严令各部对当面之敌作持久抵

*张九思当时任第六战区长官部参谋处作战参谋。

抗，牵制日军对常德之增援。再以第74军固守常德核心阵地，采取顽强抗击；另调第18军、第100军和李玉堂第10军作为机动部队，协助外围部队回师反击，将敌人全歼于洞庭湖畔。为了阻击敌人，我方又组建了三个游击支队：在洞庭湖滨，以张振华部为第1挺进支队；在宜昌，以赵益之部为第2挺进支队；在荆门、当阳，以郑家良部为第3挺进支队。各有800人枪。这些游击支队对扰乱敌后，牵制敌军进犯，起了一定的配合作用。

战斗开始后，司令长官陈诚由云南飞回恩施，指挥整个会战。代（副）司令长官孙连仲则到湘西沅陵设立前进指挥所，指挥具体战斗。

常德会战的前哨战

1943年11月2日拂晓，日军自华容亘松滋地区之间，以三路兵力开始向我警戒阵地进攻。

敌军中路部队的第3师团扑向公安地区时，与我第73军、第76军及第66军发生了激烈战斗。

3日，右路敌军第13师团陷公安。

4日，日军独立第17旅团陷南县。

5日，日军左路第39师团部分兵力在飞机、骑兵、排炮的掩护下，陷松滋（当时县治在街河市），继而侵占了新江口、西斋等地。旋即越过松滋河，分路西犯，遭到我第185师、第199师的坚决阻击。

8日，日军中路抵王家厂，遭我第79军猛烈追击，敌人攻势顿受挫折。

10日，日军右路第13师团部分主力陷安乡，一部直逼津市、澧县，经我第29集团军第44军和第79军顽强抵抗，敌我双方伤亡均很惨重，形成对峙状态，入夜，敌大举增援，再度猛攻，我阻击尤烈，敌未获进展。

11日，敌人复向我阵地猛攻，并以空军向我阵地狂轰轰炸，辅以炮击，激战至15日，我阵地工事大部被摧毁，津市、澧县等地先后陷落敌手。接着，敌强渡澧水，继续南犯。我第24集团军副总司令王耀武指挥的第77军和第100军转移至慈利，给南犯之敌以侧面攻击。

长官部为了诱敌于常德附近予以围歼，决定再次调兵遣将。以王泽俊率第44军守备汉寿；以余程万率第57师守备常德城；施忠诚则率第100军守备桃源西北地区，阻击敌之主力；由衡山调第10军北上增援；又调第18军向津市、澧县之敌侧背围击，迫使敌就地展开决战。

11月21日，敌第39师团、第58师团在20架飞机配合下，空投伞兵，猛攻桃源城，我第100军与之发生激烈争夺战，几度形成拉锯状态，鏖战至22日下午，敌我两方伤亡惨重。而我第100军根据军令部指示，暂时退出桃源城，乘机反扑，予以冲杀和围歼。

11月24日，敌各路军种形成了包围常德城郊之势，与我第74军第57师展开了激战。同日，彭位仁率第73军为阻止敌人增援常德，向慈利敌军展开猛攻，克复了慈利县城，牵制了右路敌军，并予以严重打击。我军各部激战至26日，对常德、桃源之敌形成了反包围，并紧缩包围圈。这时，我军驱逐机、战斗机、轰炸机共200架先后从恩施、芷江、衡阳、白市驿、梁山等五个基地出动，轮番助战和轰炸，压制敌人的火力。

11月27日，我第100军在强大的空中雄鹰掩护下攻克了桃源县城，溃敌大部被歼灭。

常德会战中的常德鏖战

常德城的战斗始于11月28日，当战况紧急时，重庆统帅部曾电令第六、九两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和薛岳：“常德如果失陷，应

“第10军和第74军负完全责任。”九战区薛岳旋令第10军军长何先觉于11月30日晨攻占德山，以解常德之围。于是，第10军第93师，在空军配合下，不顾敌军的火力封锁和飞机扫射，钻山突进，前仆后继，尸横遍野，于30日晨如期克复常德东南之重要据点德山。我第3师周庆祥师长率部攻克德山后，还扫荡了沅江南岸的残敌。

然而，疯狂的敌军，继续冒死进犯，向常德猛扑，在100架战斗机、轰炸机的掩护下，重炮齐发，常德全城陷入火海。仅11月30日，敌军用飞机21架次投放毒瓦斯，企图削弱我军战斗力。而我守军余程万部在此危困形势下，抱定与城池共存亡之决心，从外围据点之争夺到城内每个屋角之争夺，与敌人展开了白刃肉搏战。真是一寸土地一寸血！此时余程万部仅剩500人了，但仍坚持苦战，不幸柴团长在战斗中牺牲。余程万最后不得不向统帅部呼救。12月3日下午7时20分电讯中断。常德城于4日清晨陷于敌手。余师长率200余人，突破沅江南岸敌人封锁线，于7日在毛湾与前来增援之新11师会合。就在开始反攻常德城的时候，统帅部再令衡阳、芷江等地出动轰炸、歼击、战斗各种飞机助战。参战飞机先后共有1,467架次，常德外围攻击之部队，则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常德猛攻。

常德会战的胜利

当常德外围敌我战斗进入拉锯态势之际，常德城内的日军成了孤军。敌人企图由沅江用100只木船和数十只汽艇载援军和弹药增援常德，但均被我外围部队俘获，日俘都送到长官部参谋处后，由一个朝鲜籍的韩参谋审讯。空投敌机5次飞来，也被我第14航空大队在空战中击毁。与此同时，我第10军周庆祥师、朱岳师、孙明瑾师在地面与敌军经过激烈争夺，再克德山，拱卫了常德南大门，堵死了敌军南退的后路。这时新11师

与第57师余部猛攻常德城，敌第13师团长赤鹿里被打死，敌顿时全线动摇。我空军俯冲横扫，新11师部队在飞机掩护下奋勇前进。敌军溃退，我军乘胜追击，敌分路向西北逃窜，我军于12月8日收复了常德城，第九战区薛岳特电嘉奖，并奖给余程万师20万元，周庆祥师10万元。

12月10日，敌骑兵500人，窜到馒头嘴，被我第66师伏击全歼。

13日，敌窜到卸甲坪之骡马队（运输队）附近，被我第199师第596团包围歼灭，俘获骡马、弹药无数。

22日，我各路大军先后克复南县、安乡、津市、澧县、王家厂、公安、枝江等地。

30日，被我击溃之敌，窜回其原阵地龟缩不动了。由赣北、安庆、芜湖抽调之援敌也窜回武汉。

日军妄图占领常德、进窥衡阳、控制湘黔铁路线、跨越滇缅路直达越南接通太平洋的军事部署，至此被我军彻底粉碎。

在常德会战中，日军调动了皖、赣、湘、鄂各路兵力10万余人、飞机200架、重炮数百门，战斗异常激烈、残酷。损耗大、折将多，不仅敌方如此，我方也一样。据当时战报战况统计：我空军恩、芷、衡、白、梁五个基地先后出动轰炸机280架次，投弹3,000余枚；驱逐机1,467架次，击败了敌机10次助战；战斗机175架次，与敌空战261次，击落敌机14架，击伤19架，在地面炸毁12架。在地面战斗中，我军打死打伤敌军第13师团长赤鹿里、第39师团长滋田赖郎以下40,000余人。我军伤亡近10万人，仅余程万师就战死了近万名官兵。我第15师师长许国璋、暂编第5师师长彭士量、预备第10师师长孙明瑾等均于是役英勇殉国。

湖 滨 喋 血

李晋衡*

1943年冬，日军以重兵猛攻常德，守军余程万部陷入苦战。为了策应六战区作战，第九战区命令驻守沅江的92师派出部队进入敌后，在安乡、汉寿间截击敌人，断敌补给、阻敌援兵。这一任务就落在275团团长邹鹏奇和我的肩上。邹团长欠一个营，我是274团中校营长，率一个加强营，归邹团长指挥，任务是经鸭子港横截流花口、进出流碧（牛鼻）滩，在敌背后猛插一刀。我营和邹部分路并进。

在滨湖作战困难重重：港汊纵横，行动不便；堤垸少树，部队暴露；虽一般没有与敌主力部队作战的可能，但敌机的威胁无法避免；敌人日夜调动，我军临战时往往还摸不清敌情；敌人有大量舰艇，我军则连民船都须临时寻找。困难自不待言。我军惟一有利条件是人民的支援。这次行动共进行了鸭子港、流花口、围堤湖和尖刀咀四次战斗，并付出很大代价，但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轻取鸭子港

我营于日落从沅江出发搜索前进。沿堤民房荡然无存，湖汊里有一些破船，船上还有不少死难同胞。直至次日拂晓才找到一位老人，他告诉我白天有三、四百敌人在鸭子港骚扰，入

*李晋衡于常德会战时任第92师第274团营长。

夜后情况不明，我问他破船的由来，老人悲切地告诉我，原来是敌人掳得大批民船，把几条船连结在一起，在武装汽艇威逼下前进，触水雷后船毁人亡，敌人竟用我同胞的血肉扫雷进军，实在令人气愤。听罢老人的话，我率部急进，天亮时到达鸭子港东侧，发现堤转弯处有一片坟堆，道路由此下伸到垸中，横过垸子便是鸭子港。从地形看，这片坟堆很有军事意义。我令尖兵文礼中连严密搜索，可是并未发现敌情，于是文连向垸中行进，突然遭到坟堆内轻重机枪猛烈扫射，文连损失严重，我令炮排猛轰坟堆支援文连，10多分钟 后占领了坟堆，毙敌11名，生俘1名，我军则伤亡21人，接着搜索兵发现敌人正在鸭子港渡河，显然，坟堆之敌是掩护渡河部队的。于是我命令用三个连的兵力附四门迫击炮，以强大火力猛烈击渡河敌人，敌人一批批倒入水中，对岸敌人虽然疯狂还击，妄图掩护，但终不奏效，悻悻然向汉寿方向逃窜。此次战斗，共消灭敌人100余人。

血战流花口

收复鸭子港后，我营当天即就地布防休整。傍晚接邹团长手令，大意是流花口有 敌三个仓库，守敌只一个中队，命令我营速攻流 花口。入夜，我 营即向流 花口前进，天亮时发现敌机，我令部队隐蔽，藉机休息，准备战斗。这时我分析从鸭子港窜走的200多敌人很可能也到了流花口，并派人 把情况报告了团长。入夜，我营又向流花口搜索前进，抵达距街1公里许的小松林时，邹团长和两位营长赶上来了。他们俘获了一个便衣敌探（汉奸，岳阳人），他谈了关于流 花口 的地 形等情 况。我们经过分析，认为他的供词已经过时，对我们没有多大用 处。于是决定重新仔细侦察。白天，部队休息，我们几个指挥官进行侦察，从望远镜中看到流花口是条 小街， 堤上 多是茅

屋，斜面有几栋瓦房，没有炊烟，看不见人，静静地象一条死街，地形复杂，没有障碍，显然是敌军据点。几经寻访，才找到一个渔民，是刚从流花口逃出来的。他说半个月前街上的人就跑光了，敌人常用船运一些东西来，几处瓦房都成了日军的仓库。他的话虽简单，但对我们却很有启发：首先，不必担心因攻击而造成同胞的伤亡；其次是知道了敌人仓库的位置。于是我们决定以武力搜索，摸清敌人兵力和火力部署等情况。

下午，我派三个排长分率所部扑向流花口，但立即遭到敌人强烈火力的阻击。这样我们对敌人的火力配置也就一目了然了：街南北两口及三处瓦屋都是重机枪火力点，街上自南至北轻机枪有 20 余挺之多，但未见炮击。从火力看，敌人兵力决不少于一个大队；从未用炮击看，可能是拼凑的部队；综合所得情况，大家一致认为流花口是敌军的一个补给中转站，攻下流花口对于整个常德会战极有意义。但敌人凭借有利地形和强炽火力固守，我军不易攻下。于是有人提议“围而不攻”，断绝敌人与外界的联络，既可完成任务，又能保存兵力。我则认为敌人前后方联络并非只此一路，围困不足以打击敌人，只有迅速攻下流花口，才会给侵常敌军造成威胁。我方即使有些伤亡，也要在所不惜。我的意见得到了大家同意。于是我们决定集中两部的炮兵，归炮兵连长统一指挥，以掩护步兵攻击；我营攻街北口和两个仓库，邹团的周营攻街南口和另一个仓库，任何一处得手后即将预备营投入，扩大战果，并定于次晨在团长指挥下行动。

次日凌晨 6 时半，我军发起攻击。在敌人密集的火力网下攻坚，谈何容易，尽管有炮兵掩护，进展仍十分迟缓，每前进一步都有一些士兵牺牲。7 时半，3 架敌机飞来助战，低飞扫射，我军攻势受到挫折。但在战斗中发现街北口敌人的火力较弱，于是我断然将攻仓库兵力大部转攻北口。9 时稍过，即攻

占了北口，可是一进入街区却遭到更猛烈的抵抗，我部已死亡连排长3员、士兵百余人，而战果仅仅只占领了北口而已，双方胶着至11时许，敌一仓库起火，爆炸声震耳欲聋，火光冲天，我部乘机再发起攻击，前进不过20米又伤亡30余人。午后，街内又有几处起火，但守敌并未动摇，坚持逐屋抵抗，直至日落，我军只前进100余米，攻下20多处房屋，而周营攻南口尚未得手，亦伤亡不少。入夜，我向团长建议：顽敌不甘受歼，势必全力抵抗，依原计划最终固可全歼守敌，但我军伤亡必数倍于敌，而且我军孤军远出，并无支援部队，难以再进行攻击，不如停止进攻南口，将兵力转攻北口，以绝对优势兵力向南席卷，逼敌不再死守而向南逃窜，然后再追歼残敌，这样虽不能全歼敌人，却可大大减少我军伤亡。这个建议被邹团长采纳了，我军随即乘黑夜调整部署。

次日凌晨，我军由北向南压迫敌人，9时未到，已攻下大半条街，接着敌人放弃了最后一个仓库，残敌龟缩在街南口内外，经不起我步、炮兵的协力攻击，终于狼狈逃窜。此次战斗，歼敌200余人；我军伤亡则两倍于敌。

歼敌围堤湖 进军汉寿

我军在流花口稍事休整后，即向汉寿前进，沿途无战事，过三圣宫后发现围堤湖中有敌舰5艘、汽艇20余只。敌情突变，如果我营仍向汉寿前进而置当面之敌于不顾，则必遭敌人背后袭击；另外，敌军还有可能从南而至，从腹背两面夹击我军。于是，我下令向敌开火，敌在水中，我在岸上，形势对我绝对有利。但凶顽的敌舰艇仍一次又一次地向岸边扑来，经过两小时的激战，击沉敌舰1艘，汽艇8只，毙伤大批敌人，我军则极少伤亡。这是我参加抗日战争以来打得最好的一仗。可是团长对我的“擅自行动”却很不以为然，当即改令周营趋

汉寿。既然周营先行，我决不与之争攻克汉寿之功。于是我营就地露营，次日才尾随前进。上午7时许，敌机来袭，周营全部暴露在敌机之下，5架敌机轮番低飞扫射达40分钟之久。当我营赶到时，他们正在重新集结，所剩不过200人。

攻取汉寿的任务重新落在我营的身上。鉴于敌机猖獗，我谨慎地派出部分兵力作远距离搜索，部队以连为单位分散前进，沿途既未遇敌，也未见敌机临空。当进抵汉寿时，已是一座空城，我营顺利占据了县城。

收复汉寿后，我即向师部电告实情，并陈以伤亡惨重，兵员仅余六成，弹药奇缺，请求补给。复电称：“截击任务已出色完成，着即日返防，另有任务。”于是我营遵令返回沅江，在赤山整补。其时攻常敌军业已溃败，正分道北窜。于是我们又接受了“尾追残敌、扩张战果”的新任务，向安乡方面追击。

喋血尖刀咀 收复安乡

敌人进兵快，退兵更快。我军向安乡前进途中，只见敌人弃下的伤马和成堆经过焚烧的伤兵尸体。这时我营又接到指示，略谓敌已大部北遁，安乡仅有残敌一个大队，着速歼该敌收复安乡云云。部队进抵尖刀咀以南时，邹团长决定以两路部队攻克安乡，令我营渡河，沿河东堤北进；邹团不渡河，沿河西堤北进；并要我星夜渡河，他神情至为严峻。因为尖刀咀在安乡城南10余里，河水从安乡南流到此处急转东又转北，形成一个鱼钩，境堤南端是个尖咀，真象一把尖刀，渡河后就是背水战，如果战斗失利，必将会全军覆没；加之，只有一只小船，每次只能渡20人，我营有近千人要渡河，绝非易事，如果半渡中受敌攻击，后果不堪设想；即使全部过了河，也难以抵抗住敌主力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要我指挥作战，着实没有把握。

然而命令必须服从，但我还是向团长陈述了利害，他再次命令说：“大胆渡河，我用炮兵掩护你，战机不可坐失。”这就是严重警告了，我只好服从，至于成败利钝，只有听天由命了。

我立即召集干部开会，讲明情况和任务，介绍了一些背水作战的战例，要求大家沉着、坚定，有进无退，要有“恃生不生，必死不死”的信念，并希望大家信任我，绝对服从指挥。随即我下达了口头命令：（一）着副营长为渡河指挥官，保证渡河安全，渡毕后，将船放回南岸，任何人不得向南岸返渡；（二）一律轻装，不分官兵，都须自带三日给养（炒米），行李、辎重和炊事人员一律留在南岸，着营副官指挥；（三）张彪连为尖兵，在第一批渡河时，张连须急进至距渡河地点3,000米左右处占领阵地，掩护主力渡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后退一步；（四）各连接番号依次渡河，渡河后接受任务；（五）我随尖兵连渡河。

部队匆匆吃过晚饭，即开始渡河，当我渡河时，前方响起了枪声，接着有信号弹升空，我知道有情况，急忙快步前进，不到2公里路，就追上了张连。该连已占领阵地，正在筑掩体。那里是大堤和一道横堤的交点，有几间茅屋，据报在前方不到500米处，也有一道横堤和一片茅屋，敌人就在那儿。当晚双方无战事。

天亮后，我和第一线三位连长开始侦察敌情，并派人分别探测渍水深度。敌方屋顶上挂起了太阳旗；主堤上层层设防，且有拒马障碍；横堤上有人活动，敌右后侧境中有两处坡地，房屋整齐，树木茂密，其间是否也有敌人盘踞则无从侦知；渍水深度在1米上下，水中芦苇丛生，虽然天寒水冷，却有利于隐蔽行动。据此，我先令丁克忠排发起侦察攻击，立即遭到敌人强炽火力的阻击，伤亡惨重，无法前进。但却掌握了敌方情况：机枪掩体有9处，兵力不少于1个中队；两个坡地亦各有两挺机枪射击，虽未见射击，但掷弹筒和榴弹枪的射击却异常

猛烈。半小时后，敌机临空，低飞扫射，掩护敌军向我阵地猛扑。整个上午，向我阵地进犯六次，但均被我军击退。下午，敌机未至，当面敌人一直不停地向我方射击，但未再发起进攻。显然其任务是掩护主力退却，只求压制我军不再前进而已，并无积极企图。我考虑，只有先夺取敌占两处坡地才能攻破敌人的主阵地。我派人下水在齐腰深的刺骨冷水中侦察，得知可以从水路接近坡地，而且愈近坡地，渍水愈浅。于是我令文连利用黑夜从水中摸到坡地附近，拂晓发起突袭，占领坡地后立即侧击敌主阵地。该连发起攻击后，不到半个小时就攻占了两个坡地，歼敌33名，缴获机枪4挺。原来敌人视渍水为天险，阵地全在坡地前沿，其侧背竟无守兵。由于这次战斗是短兵相接，文连陈排长负重伤，士兵伤亡48名。

两天战斗，仅前进500米，而兵力已损失四分之一。经过几天战斗，我了解到当面敌人为一个大队，其任务是掩护主力部队退却。但据判断敌主力这时尚未撤走。于是我督饬各部加固工事，保全残部，准备再战。第3天上午，我用3个连轮番进攻敌阵，没有效果。9时过后，敌方炮弹、掷弹、枪榴弹，急雨般地向我阵地倾泻，连我的指挥所也被击中，幸而当时我在张连，没被炸死。敌人每隔一段时间就向我阵地轰炸一次，直至日落。

第4天拂晓，敌人开始放火，这是撤退的信号，我即率部尾追，进入安乡，迅速占领了县城。

在洞庭湖歼击日军汽艇

郭坤森*

1943年春，日军侵入华容、南县后，在南县厂窖，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一个小小的厂窖地区，竟一次屠杀我同胞近三万人。

那时我们第46军全军官兵在衡阳闻悉厂窖惨案，无不咬牙切齿，悲痛万分，都决心为遇难的同胞报仇雪恨。1943年4月，我军奉命开赴湘西参战，全体官兵个个磨刀擦枪，恨不得一下子就奔赴前线。当时我在新19师第55团第2营第6连代理连长（连长调训）。我连是前哨连，4月20日，经过几天的紧急行军，经湘潭、长沙、宁乡、益阳、沅江等地，于4月29日到达沅江和汉寿交界处——白露桥。当时我军军部驻在益阳，我师驻汉寿，第56团驻南县鸟咀，第55团驻汉寿鸭子港，营部驻汉寿丁家口。我连于29日傍晚接到作战命令，即奔赴前线汉寿丁家口。

丁家口是沅水进入汉寿县的门户，前面是西洞庭湖湖汊，后面是渍水垸田，仅有一条堤段可以布防，日军的汽艇时常来丁家口一带骚扰，甚至鸣枪放炮，以致附近群众东躲西藏，无法安身。

我连配备有马克沁重机枪2挺，捷克式轻机枪9挺，中正式步枪72支，快慢机手枪25支，手榴弹200枚。我连官兵隐蔽在那条曲直垸堤的后面，严阵以待。夜晚9时，远远传来敌人

* 郭坤森当时任新编第19师第55团第2营第6连代理连长。

的汽艇声，接着发现敌汽艇的灯光由远而近。这时战士们都凝视着来犯的敌艇，准备战斗。当敌人的12艘汽艇进入我射击圈时，我一声令下，机枪、步枪同时射击，接着投掷手榴弹，形成了强烈的火力网。经过1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敌人的12艘汽艇全部被击毁炸沉，汽艇上近百名敌人也被消灭。次日凌晨，营长杨英带领第5连从15公里以外的下窑赶到，协助我连清扫战场，收缴机枪3挺，步枪约70支，手榴弹和掷弹筒200余枚。自那以后，敌人的汽艇，就不敢随便向丁家口一带侵犯了。

衡阳保卫战追忆

朱懋禄*

1944年6月下旬，日本侵略军调动近三个师团的兵力，向衡阳城进逼，企图一举攻占衡阳，打通粤汉线，牵扰黔桂，威迫重庆投降。因此，固守衡阳在战略上至关重要。其时奉命防守衡阳的部队是国民党第10军（军长方先觉）下辖的预10师、第3师、第190师和暂54师的一个团，以及军直属部队等。另外从昆明第5集团军（总司令杜聿明）整48师（师长郑庭笈）抽调一个摩托化战防炮营，配属第10军指挥。笔者当时为战防炮营第1连连长。6月24日，我营奉命从昆明赶抵衡阳。第1连配属预10师，在西禅寺附近布置阵地，封锁天马山下的公路，支援天马山制高点。6月24日，日军前卫部队已与我军前沿部队开始战斗。两天后，由于第10军兵力过于分散而主动转移到茶山坳、天马山、火车站一线地势较高的地方坚守。日军则集中兵力连续3天向天马山我军阵地猛攻，时间都在黄昏后到次日拂晓，因白天受我空军抑制难于进攻，只有在日没黄昏我空军停止活动之后，才能大肆出击。日军先用远程重炮向我阵地及市区轰击几十分钟，接着以两架轻型轰炸机携带燃烧弹低飞向市区投掷，将市区化为一片火海，然后以步兵攻入市区。另以一小部分士兵沿着鱼塘潜入我阵地侧背进行袭击。当时的防守部队大都与日军打过仗，故能沉着应战，等敌人靠近时即一齐投掷手榴弹，接着进行冲击搏斗。阵地上响起一片喊杀声和

*朱懋禄当时是配属第10军的摩托化战防炮营第1连连长。

受伤者的呼叫声，从晚间8时直打到次日拂晓，当我军飞机出动时，日军即主动后撤。这时只见阵地前沿尸体累累。白天双方均不敢将尸体收回，经过好几天日晒、雨淋，尸体很快腐烂，恶臭难闻。第3天日军利用有利的风向，在进攻前竟猖狂施放毒气，我军一度产生混乱，士兵们即用湿毛巾沾水捂住口鼻，继续坚持战斗。由于当时后方增援不及时，天马山阵地终于失守。次日我军在炮兵和空军支援配合下重新组织兵力，展开反攻。师部将全师号兵集中，一齐吹冲锋号，各团团长亲自压阵，排连长带头冲锋，士兵们随着冲锋号，象潮水般冲向天马山高地，战况激烈，伤亡较大。我连炮兵也猛烈发射榴弹，压制敌军火力。从上午10时开始反攻到下午4时许，终于夺回天马山高地。像这样拉锯似的战斗持续了好多天，双方伤亡都很大。7月中旬，市区一片残垣断壁，我军所有医院、伤病员收容所、弹药粮食仓库均受到严重破坏，很多伤员或被烧死，或因天气炎热得不到及时医治而死去。我连排长赵善敏和事务长李清海，腹部中弹，就是因为没有及时医治而死的。牺牲愈大，更激发了我军将士的斗志。在战斗的中、后期，每日都有我军空投物资如弹药、药物、饼干、蔬菜等，但落到我军阵地的为数很少，有些飘落在敌人阵地上了。当时兵员补充非常困难，军部的特务营，师部的特务连和勤务兵都编组补充一线，轻伤兵一律不下火线。在战斗中，官兵们忘记了饥饿和睡眠，都不想吃饭，只想喝水，如能喝到一杯壶子酒（湖南人用糯米制的甜酒），抽上一支香烟就会感到很大的满足。但大家想得最多的还是如何应付当晚的战斗，至于明天、后天及更远的未来，谁都不去想它。在衡阳保卫战的末期，军部不断电请重庆速派部队解围。复电则云：已派××军前来接应，已到达××附近，要军部派人与解围部队联系。我们每天夜间听到遥远的枪炮声，总以为是援兵到了，大家把眼睛都望穿了，最终还是失

望了。8月某日，日军炮兵向我阵地和市区持续猛轰不息，日步兵也加紧攻城，方军长向重庆发出了“来生再见”的电报，并通知各部准备突围。次日凌晨4时，市区内有零星枪声，人声嘈杂，到处呈现慌乱景象。我同本连士兵迅速将大炮埋藏，然后向江边撤退，潜伏在江边已毁的破屋内。天黑后下了一场大雨，四周漆黑，我们乘机找到两根木头顺湘江漂流而下，天明上岸，藏身在草丛之中，听到有狗叫声和枪声，估计仍处在敌占区内，只好待天黑后摸上岸。当我们来到一户农家时，主人知道我们是从衡阳突围出来的后，便热情招待我们吃了一顿饱饭，还连夜领我们越过日军封锁线，转向南走，到达耒阳，然后经郴州、道县、全州一连步行了半个多月才到达桂林。当时桂林铁路交通已非常混乱，如果衡阳不坚守40多天，湘桂黔后方将不知会乱成什么样子。衡阳城虽然陷落了，并且牺牲了成千上万的官兵，但也大量杀伤了敌人，为后方人民疏散和物资转移赢得了一点时间。

当我10月底从广西返回昆明嵩明报到时，我营只剩下我和3连的张荣光排长了。第2连连长颜振标和第3连连长邱志远都在7月中旬的激战中阵亡了。第4连连长杨光荣和营长刘卓（中央军校十期毕业）则下落不明。

我从衡阳三次逃离虎口

毛甫风*

1944年夏天，日军大举进犯衡阳。当时我是第10军预备第10师的上尉情报参谋，随军奉命保卫衡阳。

这次守卫衡阳，持续了47个日日夜夜，这是极不寻常的。当时外电报道说：这次战斗的激烈程度，可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齐观。

这是一场巨大的消耗战。我军能上火线的人员都上去了，每个活着的人，几乎都是战斗的直接参加者。

8月8日凌晨1时左右，我军的幸存者，全被压迫至市区中心的湖南省银行、中央银行附近的几处残垣颓壁之下。这时枪炮声已渐稀疏，敌机在低空盘旋，机身的红绿尾灯与探照光柱，不断从我们头顶掠过，掷散着“和平参加证”之类的宣传品。面对这种侮辱，我们发出了咬牙切齿的咒骂声。

这时，敌人从四面八方涌来，我们各自都在寻找间隙，试探脱身。然而，天已拂晓，一切暴露在强敌面前，已经丧失了主动权。于是我们不约而同地将随身武器及重要文件藏于墙缝，或扔向井中，并为之失声痛哭。

敌机继续在上面盘旋，地面上的日本士兵渐渐逼近我们，既未开枪，也不喊话。我们板着面孔，对敌怒目而视，有的就地而坐，有的靠在断墙上，等待命运的安排。一名日军打扮的中国人出面喊叫，要我们从现在起，自动列队，离开战场。两

*毛甫风当时是第10军预备第10师的情报参谋，在衡阳会战后被俘。

边站着不少持枪的日本兵，用凶狠的目光注视着我们。我们就这样当了俘虏。

战斗方酣时，我军好象没剩下几个人了，但此时集中起来，却还有一长队的人。有残腿的，有断臂的，有用层层纱布裹住脑袋的，也有用急救带包住耳目口鼻的，还有的用手托住自己露出肚腹的肠子，更有奄奄一息躺在地下无法起来的……。这些都是保卫衡阳的勇士，都是中华民族的抗日英雄，然而这时都成了日军的阶下囚。大家面孔铁青，默默无言，没有表情，似乎在诅咒援军不力，叹息自己必死未死，又似乎在默默地向亲人告别，也好象在为祖国的山河破碎而感到悲痛。

我们被带到城外，爬上一座小山，这里叫西禅寺，是一处几经争夺的战场。遍地都是弹坑、弹壳，寺庙仅存一片瓦砾，山下的池塘里，浮尸无数，这些尸体虽都腐烂，难辨面目，但从服装上看，尽为我军战士，“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我沉痛地低吟着唐人的诗句，禁不住暗自洒下一串热泪。

在这座孤零光秃的山头上，轻兵器的火力就可控制全局。只见敌人以机关枪枪口交叉对准我们，可能是要进行一场集体屠杀。不过，没过多久，4架美制飞机掠空而过，并在城区盘旋两周后向西飞去。这时我留心观察到日军的武士道枪神，也不过徒有虚名。当飞机临空时，他们一个个象兔子似的藏了起来。相反，我们这群不幸者，却原地未动。飞机飞走后不久，敌人并未开枪，我们又被吆喝着进入城内，关入湘江岸边一座残破的大院里。

8月9日上午10时左右，4架美国飞机，再度临空，我趁敌看守龟缩隐蔽之机，迅速潜至江边偏僻处躲藏起来，决定趁黑夜泅水外逃。我找到了两截巷战时的路障木，用铁丝紧扎两端，使成“A”字形，人在水里，以它为依托，顺水向北漂

去。开始我觉得有偷渡成功的把握，但涉江不久，只见江东岸夜行军的大队日军，举着火把，人叫马嘶，还不时向江心试探性地射击，我不知自己是否已被发现，不无惊恐之感。更为糟糕的是，盛夏夜晚的江水，竟冰凉刺骨，我全身颤抖起来，体力渐渐不支，只好泅回原地“归队”。第一次逃跑行动失败了。

衡阳北郊的蒸水上，有一座桥叫草桥，在战火中遭到了破坏。日军为了军事补给的需要，决定赶紧修复这座长衡公路上的桥梁，以确保运输畅通。他们以工兵为主力修桥，另从俘虏中挑出较为健壮的30人，搬运木料器材。我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逃脱机会，只要摸出衡阳城，便算脱离了虎口。据我所知，衡阳失守前夕，我第62军和第100军，在李玉堂将军指挥下，已进抵洪桥至樟木镇一线，因此出草桥北去约15公里，便进入青天白日的世界了。于是我混入修桥的队伍，夜半趁敌困乏、监督松懈之际，潜伏到稻田之中，随后以逐次跃进的方式，向西北方向疾走。待到太阳出山，我回头已见不到衡阳城的影子了。

我为重见天日而高兴，但经过通宵长途跋涉，体力消耗殆尽。特别是精神过度紧张之后，一旦进入松弛状态，顿觉又饿又累。但四野没有人烟，一场浩劫之后，地球上好象生灵已经灭绝，我一时真有鲁滨逊落入荒岛的感觉。我只好寻找一些附近农户菜园里留下的豆类、瓜类，狼吞虎咽起来。然后我找到一户农舍，试探性地进去一看，满地破布稻草，鸡毛棉絮，还有东倒西歪的缸罐罐和左倾右斜的箱子柜子，两口铁锅都只剩半边躺在灶后。真是满目凄凉！我取下一扇门板，和衣睡了过去。

一觉醒来，太阳已经偏西。此处非久留之地，赶路要紧。我心想，再走15公里，碰见穿黄军服和短军裤的友军，什么问题就解决了。但正当我走向一座小山的拐弯处时，迎面碰到了

三个日本兵，他们中两人挑着血淋淋的牛肉和猪腿，另一个腰横战刀，戴着高度近视眼镜，大概是个曹长。狭路相逢，已不及避开，我只好硬着头皮向前走，企图侥幸闯过。其实这想法太天真了。此时此地，敌人岂肯轻易放过我？我被他们抓住后，便要我帮他们挑担子。值得庆幸的是，他们没有对我施展淫威，加以戕害，只是要我往回走，他们跟在后面，发出一阵得意的狂笑。就这样，七弯八拐，竟然又看到了衡阳城。我的第二次逃跑，又告失败。

到达城内后，他们把我送回了俘虏营。

不久我们被赶到四面环水的东洲上，以后又被赶向江东岸飞机场附近的一所民房里。在这里，我又一次逃出了虎口，混在赶集的“良民”群里，由好心的乡亲指路，几乎是用跑步，经泉溪市奔向了与衡山、攸县交界的铁丝塘。这里活跃着一支抗日游击队，由一个姓陈的领导，他们给我开具路条，把我送到经永兴到郴州的路上，这时已是中秋节的第二天了。

郴州，是当时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的所在地。到达郴州后，我以衡阳突围将士的身份，受到抚慰。由于当时桂（林）柳（州）吃紧，我便赶乘从郴州开往广东坪石的最后一趟列车，取道连县、连山，过广西贺县、平乐、荔浦等县，连续徒步跋涉，跨过柳江，直趋宜山，向李玉堂重新编组的第10军报到。至此，我以必死未死之躯，冒千难，历万险，穿越湘粤桂三省，终于又回到了抗日的队伍。

湘西会战纪实

杨伯涛*

1945年初，日本侵略军在印、缅及太平洋战区处境日蹙，但侵华日军仍在作垂死挣扎，于4月调集兵力，发动了湘西雪峰山战役，历时两旬，在我军打击下，大败而退。日军遭此打击，气焰顿挫，不敢再发动攻势，不数月即宣布无条件投降。

我第18军军长胡琏原属第六战区序列，担任洞庭湖两岸的守备。该军辖杨伯涛第11师，守备常德、汉寿地区；覃道善第13师，守备益阳地区；戴朴第118师，随军部控制桃源附近地区。1944年冬，第11师首先接受美械装备，在雪峰山会战前已经过一段训练。其他两个师因运输关系，未及改装即参加会战。1945年4月，日军向雪峰山进攻，在战况紧急阶段，第18军奉命改归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指挥，南下参加会战。

会战前敌我态势

日军虽于1944年底，打通了自北平至广州和自北平至越南的大陆交通线，但湘桂和粤汉两铁路不断受到我军袭击和破坏，未能通车。特别是在芷江机场起飞的远程战略轰炸机的轰炸下，武汉至南京、上海的长江航运亦不能畅通，致使日军企图将我国东北、华北同东南亚地区联成一片的战略计划无法实现。因此，日军视芷江机场为心腹大患。日军发动雪峰山会战，第一个目的就是捣毁芷江机场，占据这一战略要地；第二个目的是破坏我军调换美械装备、待机反攻的部署。日军自1945

*杨伯涛当时任第18军第11师师长。

年3月起即开始调兵遣将，在长沙、衡阳、邵阳各要点，屯积粮弹，进行备战。

日军发动雪峰山战役得到了驻南京中国派遣军总部的批准，具体指挥由第20军团司令官坂西一郎负责，参战的有内田银之助的第116师团，渡边洋的第47师团，伴健雄的第34师团，提三树男的第68师团一部，船引中收的第64师团一部及独立第86旅团等作战部队，加上后勤部队，约有10余万之众。坂西一郎指挥所进驻邵阳后，敌人的兵力部署态势为：

第64师团一部，附独立第86旅团，集结于宁乡附近地区；

第116师团，第47师团集结于邵阳、永丰间地区；

第34师团集结于广西全州、兴安间地区；

第68师团集结于东安、零陵间地区。

我军方面担任湘西全面防守的部队为王耀武的第四方面军，所辖韩浚第73军，施忠诚第74军，李天霞第100军，都正在接受美械，调整训练。当时各军的防守配备如下：

第74军主力置于雪峰山东麓，占据山口要隘有利地形，构筑决战主阵地，以确保芷江机场的安全。一部于武冈、石下江、洞口各要点构筑工事，准备逐点抵抗，消耗敌军兵力，阻滞敌军行动，赢得时间。对盘踞东安、邵阳之敌，以游击部队加强活动，严加监视。

第100军连接第74军左翼，配备于雪峰山东麓之山口、龙潭一线，构筑坚固工事，作为决战主阵地。一部于隆回、山门各要点构筑工事，逐点抵抗。对盘踞湘乡、邵东之敌加强侦察监视。

第73军主力占领新化县城，构筑工事。一部对宁乡、湘乡方面之敌保持接触。

这次会战最高指挥官为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战况紧急时，何曾离开昆明总部设临时指挥所于距离芷江不远的安

江。根据王耀武第四方面军所获情报，判断日军有发动夺取芷江机场的企图。第四方面军欲增加兵力，以确保这次会战的胜利，遂将在印度兰姆迦接受了全副美械装备、于1945年春打通了中印公路后回到昆明的廖耀湘的新6军，迅速空运芷江，作为总预备队。该军从5月初开始起运陆续到达芷江后，未及参战，我军即已告捷。

芷江机场驻有中美混合航空兵第1团，拥有各种战斗机群。日机曾来轰炸多次，在芷江上空与我空军发生过激烈空战，日机被击落多架，机场一直保持完好。唯芷江县城则被狂轰滥炸，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严重。以后中美空军混合第1团的战斗力一再得到加强，逐渐居于绝对优势，在会战中掌握了制空权。

在黔桂边区的汤恩伯第三方面军，除以主力对付湘桂铁路之敌外，还抽派所属牟廷芳第94军进驻广西龙胜、湖南城步地区，向由全州西进之敌拦腰截击，胁迫敌左翼兵力，以配合第四方面军进行决战。

战斗经过

1945年4月中旬，日军对我军攻击部署俱按预定计划完成后，开始分左、中、右三路向我第一线守军展开全面攻击。

日军集结在宁乡之第64师团一部及独立第86旅团为右翼攻击队，其任务为掩护日军在邵阳的主力部队——中央攻击队右侧背的安全，向益阳攻击前进。沅江之敌数千人亦南下向益阳北面攻击。我益阳守军在敌南北两面夹攻下，主动撤出，退据预设阵地，逐点予以阻击。敌侵占益阳后继续向桃花江（现桃江）、安化西进，遭到我第73军顽强阻击。激战至5月初，日军前进至烟溪、新化之线。我新化守军固守城垣阵地，敌屡攻未能得逞，两军形成对阵，互无进展。

日军集结在零陵、全州之第68师团、第34师团为左翼攻击队，分两路向我军进犯，敌第34师团于攻占新宁后继续西犯，由武冈南侧直犯武阳。我第74军守备武阳的一个连，全部战死殉国。敌逐点攻击于5月中旬前进至瓦屋塘、水口一线，向我第74军雪峰山主阵地展开猛攻。敌第68师团则沿新宁、武冈大道西犯，击破了我前沿阵地，从三面包围了武冈县城。守备武冈的我第74军一部，在予敌重创后，转移至主阵地。

日军集结于邵阳附近的第116师团、第47师团为中央攻击队，是这次会战的日军主力。该敌利用湘黔公路运输的便利，附有坦克、炮兵部队，企图在左、右两翼攻击队的掩护下，以优势兵力迅速击破我第四方面军雪峰山主阵地，直取芷江机场。因而将其全部兵力投入战斗，分四路同时进攻。

敌第一路由邵阳循湘黔公路线西犯，窜至桃花坪我第74军前进阵地时，受到我军顽强阻击。敌两面包围攻击，我一部守军撤出桃花坪，敌跟踪追击，相继攻陷我高沙市、石下江、竹篙塘等阵地，直抵我第74军洞口主阵地前，展开猛攻。第74军第58师凭借山险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予敌重创，敌攻势顿挫，虽一再增加兵力攻击，俱未得逞，两军陷于胶着状态。

敌第二路沿邵阳公路线北侧向西进犯。第74军第57师一部协同第100军一部，逐点予以阻击，敌疯狂钻隙而进，我军退守雪峰山东麓放洞既设阵地，奋力阻击，杀伤敌军甚多。

我第100军增调兵力投入战斗，对敌进行反包围，鏖战一周之久。敌无力再发起攻击，退据放洞周围，转取守势。

敌第三路由邵阳向西北进犯，攻击我石马江、巨口铺、顺水桥各既设阵地，我第73军逐点予以阻击，该敌全力西犯，击破山门镇我守备部队阵地，进抵龙潭、雪峰山我第100军主阵地。敌企图一举突破，未能实现。经数日激战，敌我阵线犬牙交错，我军坚守阵地，毫不动摇。

敌第四路由邵阳北犯，击溃我第73军一部守军，窜至新化洋溪桥附近，经我第73军主力及第18军第18师一部增援，两部协力反击，战线遂稳定在新化东西地区一线。

日军自4月中旬发动全面攻势后，遭到了我军大纵深阵地带阻击。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的代价。因此，前进迟缓，费时两旬，始到达我第74军、第100军占领的雪峰山主阵地前沿，但敌军官兵粮弹大量损耗，已精疲力竭。

我军利用大纵深既设阵地逐步阻击，利用空间优势赢得充裕时间，以加强雪峰山主阵地的防御工事和调动增援部队，同时乘敌于正面仰攻、兵力分散、部队运动暴露之际，各部队在炮兵协力配合下，对敌进行猛烈攻击，并组织逆袭部队轮番向敌军反击，致使敌人穷于应付。

早在4月初，我空军中美混合团即加强了驻芷江机场的实力，日夜轰炸粤汉、湘桂铁路的交通运输，以迟滞敌军的集结和补给。战幕揭开后，空军全力支持前线战斗，随叫随到，协同地面部队联合作战。这时日本的空军在我国大陆上残留无几，不仅丧失了制空权，而且陆军的侦察、联络手段也丧失了。因此日军在会战过程中，表现钝拙，不像过去那样灵活敏捷了。在山门要隘争夺战中，几个山头上的日军企图阻我前进，我在摆好攻势后，命令一个营向山头攻击。在一架轰炸机配合下，这个营一直冲上了山头，用冲锋枪对准手端刺刀的日本兵一阵扫射，日本兵纷纷倒毙，少数日本兵弃阵逃跑，不到2小时，就全部占领了这几个山头。

过去和日军作战，我在战场上遭遇日军时，都要极力隐蔽身体，秘密窥视日军动态，若不慎被日军发现目标，就会招致日军炮兵和空军的轰击。这次作战就大不相同了，我率领师指挥人员和美军联络官司乐中校一行，到第一线观察地形、敌情时，发现对面700余米处走来十几个日本兵，探头探脑，东张

西望，似乎也在侦察情况。他们发现我们后，就钻进树林隐蔽起来，我们哈哈大笑，从从容容指挥部队向其进攻。

5月初，我军统帅部开始部署反攻，决心动用精锐兵团歼灭当面之敌。于是命令在黔桂边区之汤恩伯第三方面军，以主力对湘桂铁路沿线之敌，另以所属牟廷芳的第94军自城步、绥宁疾进，向武冈西北我第74军对阵之敌左侧背展开攻击。被攻之敌不得不分兵抗拒，形成两面受敌态势。第94军经过激战，逐步进展至武冈、瓦屋塘一线，敌对雪峰山正面转而采取守势，我第74军乘机转移攻势，协同第94军合力围歼当面之敌。

早在4月末，最高统帅部将守备常德、桃源地区之胡琏第18军拨归第四方面军指挥，向辰溪附近集结待命。胡琏命令全军克日登程，行军速度一日约40公里，赶赴湘西会战前线。芷江是我的家乡，这次战斗对我来说既是卫国，又是保家，为了尽到神圣职责，我决心不避牺牲，奋勇杀敌。我师部分官兵也议论说：“我们一定要保住师长的家乡，这一仗只能打胜，不能打败！千万不能让师长在家乡人民面前丢脸！”

何应钦与王耀武原定的作战计划是：乘日军攻势顿挫之际，将未参战的精锐部队第18军用于雪峰山正面阵地作战，居高临下，对敌出击，给敌军以粉碎性打击，一举结束整个会战。后来第四方面军参谋长邱维达等建议：日军以夺取芷江机场为目的，主力部队用在雪峰山正面，企图直捣芷江，其两翼则是掩护和助攻部队，兵力较为薄弱。我军从正面出击，未避其锋，难操胜券，不如向敌侧面薄弱处出击，较有把握。最后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决定以第18军由溆浦南下，向日军右侧背新化、山门之线发动攻势，断敌退路。当时第18军先头部队第11师已通过辰溪、花桥、怀化，到达安江附近，奉命后立刻掉头向溆浦前进，寻敌攻击。第118师由溆浦向东从新化南下。第18师以一部向新化前进，协同第73军进击围攻新化之敌。

第11师遵照上级命令，向日军侧背猛进，截断其后方联络，经过溆浦县城后，即以战备姿态向南搜索前进。预定第一攻击目标指向敌右翼兵团之交通要隘山门镇；第二攻击目标指向敌中央兵团之主要交通动脉——邵阳至洞口的公路。师先头部队前进至山门正北15公里之马颈骨附近时，即遭遇日军迎面阻击，我即命令部队展开猛攻。激战方殷，适逢日军一个步兵联队和一个辎重联队经山门向龙潭雪峰山前线之敌增援补给，那个步兵联队即转援马颈骨之敌。我乘该敌展开运动之际，组织突击队迅速肃清当面之敌，而将锋芒指向该增援联队。这个联队尚未部署完毕，即遭我突袭，伤亡颇众，一度陷于混乱，惊魂稍定之后，才占据附近高地和村庄，进行抵抗。日军素以白刃战见长。这时日本兵都端着闪亮的刺刀向我军扑来，我师士兵（已装备美式近战武器）用冲锋枪，于数步之内向密集日军迎头扫射，卒将该联队歼灭，并缴获山炮2门，机枪多挺，生俘日军（含轻伤兵）60余名。随师美军官兵听说俘虏了日兵，都好奇地去观看。其中有一通讯少尉持枪欲将一名俘虏枪毙泄愤，被我阻止。战利品内有一堆日本钞票，美军以所带美钞斟换，作为纪念。次日，我师来不及清扫战场即向山门进攻。山门地当东西要道，为日军后方补给点，有一部日军防守。我师与日军接触后，日军兵力稍有增加，我即分兵一部从山门东北地形比较开阔之处迂回敌后攻击。在我两面夹攻下，残敌向南溃退。我即刻要副师长王元直指挥一个团追击，全歼敌辎重联队，缴获大洋马300余匹和许多武器装备。我师克复山门镇后，在日军右翼侧背阵地开了一个大缺口，后方交通有被完全截断的危险，形势对他们非常不利。日军在雪峰山前线的部队，立即抽调兵力向我反扑，企图夺路东窜。我师迅速调整部署，在山门北面高地占领侧面阵地，控制东西隘口严阵以待。日军向山门进攻时，摸不清我主阵地所在，盲目向山门乱轰一阵，即贸然

进入山门。我师乘此良机，各个阵地，枪炮齐鸣，日军毫无还手之力，其先头部队几被全歼，后续部队只得觅路逃窜。我师以少数伤亡，获得全胜。

为彻底截断日军后方交通，协同友军全歼日军，我师继续向南攻击前进，以达到第二个攻击目标。这时日军向我雪峰山进攻的部队，由于形势不利，已开始向东后撤，部队聚集在邵阳至洞口公路两侧，占据了所有山头和村庄，我师每前进一步，都遭到敌人的拚命抵抗。但我师已装备美械，火力较日军占优势，加上中美空军也积极协同作战（美军联络官司乐中校携带陆空联络电台随我身边行动，在战场上向驾驶员指示射击和轰炸目标），敌人还是遭到了严重打击。日军飞机由于失去了制空权，只在拂晓时，以单机低空飞行，在我军阵地上空一掠而过，对我军根本没有什么威胁。故此我师能主宰战场，乘隙猛进，席卷敌阵。我以一个团兵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攻占了湘黔公路要点石下江镇，完全截断了日军后方的交通线，形成了对日军四面包围的态势。我军左翼第118师亦前进到荷香桥附近，向邵阳迤西前进，敌顽强阻击，战斗甚烈。军长胡琏以第18师一部从侧面增援，制压敌人的火力。

我南面战场第三方面军之第94军，经过激烈战斗，击溃了新宁、武冈之敌；左路敌军向东溃退，该军尾追，封锁了南部战场。

我据守雪峰山主阵地的第74军、第100军不失战机，全线发动反攻，不顾长期苦战的疲劳，奋勇直前，咬住敌人，毫不放松。日军在包围圈内越来越紧缩，濒临绝境。

我判断日军处此紧要关头，势必竭尽全力打开一条血路。因此，我以师主力面对雪峰山，占领有利地形，构筑工事，加强封锁，迎击突围之敌。另以一个团的精锐一部占领石下江镇一处坚固建筑，卡住公路，断绝交通，成为阵地锁钥；该团主

力以此为依托，占领公路两侧有利地形，迎击东窜之敌。第11师正在秣马厉兵、严阵以待之际，忽然接到军长胡琏转来上级命令：要我将扼守在石下江镇的一个团全部撤离，集中全力向敌侧面攻击。这样一来，包围网就出现一个大口子。被围日军一见有路可逃，就不顾一切地一拥而出，我虽督队猛击，但斩获之数不大。随后我军在全线乘胜追击，很快收复了所有失地，恢复了会战前的态势。湘西雪峰山会战，于6月初胜利结束。

第11师在这次会战中，共伤亡官兵400余人，大多是在山门战斗中阵亡的。对此，我极为悲痛，战后，我征得全师官兵的同意，派得力干部数人，在山门镇建立了“第18军第11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坊”一座，以寄托哀思，兼示崇敬之意。

回忆抗战初期的湖南救亡运动

曹国智*

从七七事变到南京、上海、武汉失守和长沙大火以前的一年多，从北平、上海、南京、武汉各地回湘的大批大学生和文化工作者云集长沙，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七七事变前半个多月，我从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回到长沙，我的哥哥曹国枢和我的未婚夫肖敏颂（1938年1月与我结婚，1957年病逝）也分别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毕业回家。由于我父亲的关系，我一回长沙就被聘为湖南私立自治女子职业学校教导主任，不久代理校长。当时自治女校的校长是曹治阳，他以省民政厅科长名义兼任校长，自治校董会董事长为商界著名人士左益斋，我父亲曹耀材和叔父曹伯闻都是校董。我有了公开的职业和许多上层社会关系，也就有了一个合法的活动基地。我首先以自治女校为据点办了一个暑期补习班，招收了100名学生，分作两个班，讲授语文、历史和抗战形势，团结了一部分进步学生，并组织自治女校学生和部分积极分子参加了省妇女慰劳会，我和自治女校教员、湘大毕业生李颖生（解放后去大连，曾任市政协副秘书长、民进市委秘书长）等同志当选为妇慰会理事。

我家住在赐闲湖4号附1号，是我父亲自己的房子，有两层楼、12间房屋，居住条件宽敞。因此各方面人士经常到我们家来聚谈，无形中我家成了一个聚会中心，好些活动都是在我

*曹国智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员，曾任湖南省妇女慰劳会理事、湖南省妇女工作委员会伤兵服务组组长等职。

家议论酝酿、开展起来的。我们与地下党组织的关系也是在我家接上的。当时从外地回来的文化工作者有吕振羽、翦伯赞、杨东莼、谭丕模、曹伯韩、廖伯华等；从北平、上海、南京回来的大学生有杨隆誉（北大）、黄启威（北大）、陆永新（北大）、宋绍尧（清华）、陈泽云（北师大，即于刚）、陈德明（北师大，女）、黎树苍（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即黎澍）、冯秀藻（中央大学）等。原来在长沙工作的有李仲融、苏镜、唐荣前、廖意林，这三人都是省长二中附小教员，以及孙伟（育英小学校长）等，还有湖南大学毕业生（我的中学同学）李颖生、李静、黄益德、张端元等。各方面人士逐渐联合起来，先后组成了妇女、青年、文化界的救亡组织，出版了《前进》、《民族呼声》、《火线下》、《抗战日报》、《观察日报》、《中苏》半月刊等报刊，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救亡活动。

《前进》社是我们从北平回来以后最先成立的杂志社，这是一个以北平学生为主的进步群众组织，大约是在1937年8月下旬组织起来的，开始有30多人，由曹国枢担任社长，肖敏硕担任《前进》旬刊总编辑，杨隆誉、章东岩（北平民国学院学生）、唐荣前、冯秀藻、李仲融等9人为理事会理事。经过短期筹备，《前进》创刊号在9月18日出刊了。刊头是画家翟鸿的，是工、农、兵、学、商五个人手挽着手作战斗的姿态，背景为一轮红日。社址先设在南门都正街79号陆承新家里，后搬到上学宫街自治女校附设的缝纫店里。经费是大家凑起来的，也找过刘道衡、熊子烈捐款。他们两人当时的身份是上层绅士，与曹伯闻关系密切。编辑、校对、发行等各项工作，都是我们自己尽义务，投稿的也一律没有稿费。《前进》的组稿、审稿、编排，以至校对都是肖敏硕为主承担的，他写的稿子比较多，专论、时事评述很多出自他的手笔。杨隆誉、黎树苍、

陈泽云、章东岩、吕振羽、翦伯赞、谭丕模都是《前进》的重要撰稿人，我也写过两篇谈抗战教育的文章。稍后，张天翼、蒋牧良、魏猛克等从外地回来，也积极为《前进》撰写专稿。曹国枢主要负责筹备并与各方面联系打开局面。《前进》社活动时间不长，由于形势的发展，成员工作的变动，人力分散，只出了五、六期。以后，与《前进》社有关的邓克生、杨荣国（日新女校教员）等另办了一个刊物《民族呼声》，黎树苍也办了一个刊物《火线下》。两个月后，《前进》、《民族呼声》两个刊物合并，改名为《联合旬刊》，仍由肖敏颂等少数同志主持，一直延续到1938年武汉吃紧、长沙疏散，刊物才停办。

在我们开展了一段活动以后，地下党负责人任作民来到长沙，那是在1937年10月至11月间。某天上午，任作民来到赐闲湖我家，找到了曹国枢和我。当时任大约是30多岁，中等身材，穿着一件浅兰布长衫，戴一顶旧博士帽，很像一个商店店员。他态度沉着、和蔼，操带湘阴口音的长沙话。他从武汉为我们转来了党的关系。任作民要曹国枢、肖敏颂和我先成立一个临时党小组，再陆续为一些同志转接组织关系，并相机发展党员。以后任作民领导我们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他还教育我们团结群众，坚持抗战，百折不回。我们三人在一个党小组的时间不长，以后我与李颖生、黄时雨、李渝威另外成立了一个妇女党小组。肖敏颂和吕振羽、谭丕模三人组成了文抗会党小组。曹国枢参加了青年党小组，担任青委。以后，我们三人在地下党领导下，分别在妇女、文化、青年三条战线开展活动。我由于参加妇女工作，因此在这方面能回忆的事情较多。

抗战以后，湖南先是有妇女慰劳会的官方组织，由当时省政府主席何键的女儿何枚当主任，刘尚之任副主任。张治中取

代何键任省政府主席以后，建立了湖南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由张治中的女儿张素我任主任委员，陈洁任副主任委员。这是抗战期间宋美龄领导的全国性妇女团体，各省都有这个组织，一般是由省政府主席的夫人、小姐当主任委员。我和李颖生、李涵威、黄时雨、罗琼、罗叔章、任振威等10多人都参加了妇女工作委员会，或担任委员，或担任组长。罗琼、罗叔章是从上海回来的，当时都是《妇女生活》的编辑；梁淑德是上海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干事；任振威是英国留学生，与张素我同学。张素我文化素养较高，比较开明，能容纳妇女界各方面人士参加活动。我和李颖生、黄时雨、李涵威在一个党小组，黄时雨任党小组长，上级党组织负责人常出席我们的党小组会，分析形势，布置任务。当时的指导思想是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一切公开活动的机会，利用国民党合法机构进行工作。这些负责人的身份都是保密的。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住址和职业，我对他们十分敬重，甚至崇拜。党小组开会的地点，是在自治女校教员李颖生的寝室里，或是在我家或李涵威家。解放以后才知道当时几个负责人就是帅孟奇大姐、宋濂大姐和高文华同志，至于罗琼、梁淑德等人当时是否党员我们不知道。

湖南妇女工作委员会的活动主要是宣传抗战，慰劳伤兵与难民。上海、南京失守以后，从前线运来的缺手断腿的伤员和从安徽、江苏逃来的难民，流落长沙街头，政府设置了许多伤兵接待站和难民收容所。11月间，我利用家庭的关系，到省伤兵管理处任宣慰组干事。我原在妇女工作委员会担任伤兵服务组组长，这样我就可以以双重身份做慰劳的伤兵工作了。我帮助各个伤兵接待站建立了20个伤兵俱乐部，组织联系各方面的妇女参加服务工作。经常参加工作的，我记得的有余书丹（即许庄），唐荣前、廖申之、李英华、黄子坚（北平朝阳大学学

生）、任振威、黄君珏（即黄维佑，抗战中牺牲）等，张天翼的爱人徐昭也参加了。此外，经常和我们联系的有长沙基督教女青年会干事徐幼之、刘淑元以及文抗会的一些女同志。同时我们也发动了自治、周南、含光、明究几个女校的学生经常参加慰劳伤兵的工作，特别是自治女校学生在李颖生老师带领下，无偿地为伤兵缝制衣服，一次几百套。我们主要在黄泥街、落星田、都正街等接待站和丝茅冲伤兵医院，以及占用自治女校校舍的重伤兵医院做宣慰工作，宣传抗日战争的形势和持久战的道理，代伤兵书写家信，缝补衣服，赠送抗战画报书刊，教唱救亡歌曲等等。

对妇女难民的工作也开展得较好，黄绍湘（清华学生）、李颖生、罗琼等经常去难民收容所做宣传慰劳工作。当时妇女工作委员会还出刊了《湖南妇女》半月刊，由李颖生、廖申之等负责编辑、校对及发行等工作，十分辛劳。1937年三八妇女节，妇女工作委员会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纪念会，到会的各方面妇女主要是女学生，有2,000多人，当晚还举行了火炬游行，虽遇到了强烈的暴风和冰雹袭击，但群众情绪一直很好。长沙大火以后，湖南妇女工作委员会转到沅陵，继续工作了一个时期。

1938年暑假，长沙学校疏散，自治女校分两部分搬迁，一部分迁桃源，由李颖生负责。一部分迁衡阳西乡库宗桥，由曹治阳、刘莘田负责。我因怀孕，到11月长沙大火前夕，才和敏颂到达桃源。不久我为自治女校的事去到沅陵。当时省妇女工作委员会已迁到了沅陵。陈德明、黄时雨、李涵威、余书丹，以及小美子（李淑纯）等都到了这里。妇委会主任叫朱王浣青，是长沙青年会总干事张以藩的岳母，大家称她为朱师母。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热心抗日救国，是沅陵妇女界的上层人物。我在沅陵找到陈德明后，就接上了党的关系，又再度参加了妇

委会的工作。

当时沅陵工作条件艰苦，妇委会只有一间大房子，大家都是铺稻草睡地铺。妇委会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开展宣传慰劳活动，到沅陵白田头伤兵医院慰问伤兵，1939年元旦在沅陵伤兵医院还举行了慰问茶话会，余书丹演唱了《春天里来百花香》等歌曲。后来我与陈德明、黄时雨借了几部缝纫机，筹办了一个难民妇女缝纫工厂，由陈训英具体负责工厂事务，韩淑仪、应瑾安等都参加了缝纫厂工作。我们组织了几十个难民妇女一边学习文化、政治，一边缝制衣服、维持生活。我当时在沅陵《抗战日报》上还写了一篇《难民妇女生产与教育》的文章，介绍难民妇女缝纫工厂，《抗战日报》在沅陵是由廖沫沙负责的。工厂开设不久，我与肖敏领应杨东莼先生邀请到桂林去了。我走以后，听说工厂发展到60多人，生产自救取得了一定成绩。

上面是妇女工作的情况，下面谈谈文化界的抗日救亡活动。

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是当时地下党领导的一个最大的群众性组织。当时所有群众组织都要经过国民党省党部备案，备案时要有30个基本会员签名，我们用《前进》社一部分会员、自治女校的几个教员，以及自治女校校长曹治阳等三十个不太引人注目的人的签名去备了案。然后联络了从北平、上海、南京回来的大学生及文化界人士100多人。1937年10月在青年会礼堂开筹备会，选举了吕振羽、孙伟、曹国智、陈润泉、翦伯赞、廖伯华、皮宗石、姜曼郎、肖敏领、蒋寿世等11人为筹备委员，起草宣言及会章，10月17日在敏育街第一师范礼堂举行了成立大会。《民族呼声》当天就发表了文抗会的宣言和发起人名单。发起人除筹委11人外，还有张天翼、曹国枢、李静、蒋牧良、魏猛克、李声玄、黄芝冈等50多人。参加成立大会的有300多人，国民党省党部特派员赖琏和省政府主席何健也应邀

出席。

文抗会成立之初，没有建立地下党组织，但领导人很多是地下党员，都是单线联系，谁是党员互不知道。肖敏颂和吕振羽、谭丕模在文抗会自成一个党小组，时常到我家开会。1938年2月以后文抗会才单独成立党支部，先是白云任支部书记，后来是杨第甫。

文抗会有各个方面的会员800多人，分成30几个小团体，如读书会、时事研究会、“新声歌泳队”（金汉虚负责）、“一九三六年剧社”（唐寅斋负责），“一致剧社”、伤兵服务团、难民服务团、学生抗敌工作团、世界语学会等等。文抗会举办过许多活动，如请徐特立同志在银宫电影院作过一次《赶快组织游击队和义勇队》的报告，轰动了全市。还办有街头壁报《大家看》，内容生动活泼，编排鲜明醒目，战斗性很强，还举行过街头演出，崔嵬、张瑞芳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深深感动了观众；还举行过为文抗会募集基金的公演大会，熊佛西导演的《后防》在民众俱乐部（今青少年宫）演出后，博得了广大观众的掌声。此外还办过战时训练班等，这些活动影响极大，也引起了国民党省党部的嫉视，企图放组文抗会扭转其斗争方向。他们公开攻击《前进》旬刊，写匿名信给肖敏颂、唐寅斋、杨快山等进行威胁。1938年2月17日，文抗会第二次大会改选出理事104人，进步力量只占到30多人；由理事会选出常务理事23人，进步人士只有吕振羽、陈润泉、翦伯赞、廖伯华、李仲融、田汉等6人当选，C·C派和复兴社成员占了绝对优势。因此，到长沙大火前，文抗会的活动和声势已大不如前。

除文抗会以外当时还成立了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由翦伯赞、吕振羽出面请覃振（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出来当会长。理事会理事除翦伯赞、吕振羽外，还有谭丕模、肖敏颂、

杨东莼等。肖敏颂任驻会干事，负责编辑《中苏》半月刊机关刊物，他担负写稿、编辑、校对等具体工作将近一年，呕心沥血，留下了许多篇章，现在湖南图书馆还保存了当时的刊物。该会还举办过俄文学校，有300多人参加学习，由留苏学生游宇任教员，办得很好。

此外，当时在长沙还有一个高级文化人座谈会，由杨东莼（当时任省政府参议）发起，称为文化工作者座谈会，参加的有薛暮桥、罗琼、罗叔章、曹亮、梁漱德、刘良模等，我和肖敏颂、曹国枢也被邀参加，每次由杨东莼作东道主（他住在北门外十间头一座房子里），设便餐招待大家。座谈内容一般是谈论形势，分析时局，交流情况。

1938年上半年，田汉、廖沫沙在长沙创办了《抗战日报》，不久《观察日报》也出刊了。《观察日报》是由杨隆誉、黎树苍、肖敏颂、曹国枢等在我们家里商量办起来的。办报的经费是由黎树苍找他的一个醴陵同乡唐文燮等筹措的，唐的父亲是何键的经理处长，愿意拿出一两千元办报，并同意人事、经费、方针完全由我们掌握。报社社址设在政育西街，距离赐闲湖我家很近，开始杨隆誉经常来我们家与敏颂、国枢商谈办报事宜，以后潘开茨、潘先隆也参加了报社工作。肖敏颂经常为报纸写社论，常写稿到深夜。有一天晚上，他写完社论送稿到报社回来，已经是午夜一点钟了。他说，杨隆誉、黎树苍正在等稿发，看见他送稿去都高兴得跳了起来。以后《观察日报》成为地下党机关报，长沙大火以后迁到邵阳出版。

最后简单谈谈青年工作的情况。1937年11月间，长沙就有敌机轰炸，第一次敌机在小吴门老火车站附近投下炸弹，市民伤亡较多，大家感到要进行救死扶伤。曹国枢通过曹治阳的关系，组织了一个新生活劳动服务团，联系了几十个青年学生参加，每当警报解除以后，大家立即集合起来奔赴投弹现场，帮

助抢救。经过短期联络活动，又吸收了一批第一师范和一些中学的男女学生参加，并组成4个大队：第1大队以平津回来的党员、民先队员为骨干，吴磊伯（北大）、杨隆耆为正副大队长；第2大队以上海、南京回来的学生为骨干，冯秀藻、杨浑湘任正副大队长；第3大队以本地中学生为主，陈俊、何楚雄任正副大队长；第4大队是女学生，由周南女中欧阳中道（艾森）和二中易尧琼任正副大队长。不久，长沙临时大学成立，办在当时圣经学院里面，收容北平、天津、上海各地来长的大学生入学，临时大学中许多进步学生，推动了湖南救亡运动的进一步开展。以后曹国枢与清华大学的党员及民先队员联系，成立了临时大学党支部，由清华大学的吴继周担任支部书记，曹国枢负责联络工作。我记得当时来过我们家的北平女同学有黄绍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所长）、郭见思（即郭建，现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戴中依（即黄葳，原中国科学院科技干部局局长）、魏寨一（即韦君宜）、陈舜尧等；男同学有叶笃廉（即叶方，原中央党校三部主任）、杨戍申（即魏东明）和程骏声（即程之平）等，程住在国枢处很久，和我们全家都熟识了。他们都是党员，但与我没有党的关系。以后陈泽云负责青年工作，与国枢有联系。

从七七事变开始到武汉失守前后和保卫大武汉那一年多的时间，是湖南救亡运动蓬勃开展的全盛时期。但到武汉失守以后，长沙大火前夕，情况发生了变化，长沙大、中学校开始疏散，许多外来文化工作者纷纷离开长沙，力量分散，长沙也就失去了文化中心的作用。加以反动势力开始对进步势力进攻，抗战救亡的声势逐渐趋于低落。1938年11月长沙文夕大火以后，中苏文化协会迁往沅陵，《观察日报》迁往邵阳，原有各方面人士分赴沅陵、邵阳、桂林等地继续战斗。抗战初期盛极一时的救亡运动在湖南抗战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现在，抗日战争

胜利已经42年了，当日的青年都变成了老人。我也过了古稀之年，回忆50年前湖南救亡运动的高潮与低潮，我不能忘怀当年共同战斗过的而且早已逝世的亲人和战友，在这里谨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追怀和沉痛的悼念。

徐特立支持我们北上抗日

何进*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京失守，长沙遭受日本飞机轰炸。湘雅医学院师生的爱国抗日热情日益高涨。大约从1937年9月开始，内科教授杨济时发起组织了湘雅医学院学生战时服务团。

约在1937年12月，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成立，徐特立以八路军代表身份在长沙公开活动。一天，周博文同学邀集唐家桢、何锡祉、李剑青、李振湘、李震勋和我（当时叫何武坦）几个人到他的家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们，并说可以通过徐特立的介绍，到陕北去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参加抗战。

不久，李震勋告诉我，徐特立要在银宫电影院演说，介绍八路军抗战的情况，约我一起去听。徐特立是湖南的老教育家，又是毛泽东的老师，长沙的青年学生都很尊敬他。当时我有抗日救亡的热情，又想了解一下共产党、八路军的情况，就和李震勋去听了徐老的演说。徐老身穿八路军战士的棉衣，腰间束一条皮带，态度庄重，讲话诚恳动人，使我肃然起敬。他在演说中讲了红军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和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的艰苦情况，说：当时物资奇缺，有时盐都没有吃，但红军并不怕苦。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徐特立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毛泽东多次让马给徐老骑，但他坚持步行。他用许多事实说明中国人民是不怕苦、不怕死的，是可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他说过

*何进当时是湘雅医学院的学生。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校长。

去红军经历过那样多艰难险阻都没有被消灭，并且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今后到日军占领区去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也是可以取得胜利的。徐老这次演说给我很大的教育和很深的印象。过去国民党对共产党、红军的一些诬蔑宣传在我心目中冰释了。我开始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认为徐特立、毛泽东这些人都很有学问的人，他们不畏艰难困苦，带领红军从江西打到陕北，完全是为了抗日救国。我相信他们对于抗日是最坚决的，后来我又在教育会坪育英小学门口的广场上听了他的演说，湘雅医学院师生还请他到学校里来演讲过。

未几，李震勋对我说，现在很多青年到延安去投奔八路军参加抗战，我们去找一找徐特立，请他介绍我们去如何？我考虑了一番，这一去就要抛弃学业，远离家乡，还要吃苦，但经过思想斗争，还是下了决心去延安。我和李震勋找周博文同学谈我们的想法，他很支持我们，并说让我们先走，他随后就来，我们当天半夜去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找徐老，他正在写宣传抗战的文章，边写边和我们谈话。这样大的年纪，这么晚的时间，还在为宣传抗战辛勤工作，使我们非常感动。我们说想去延安参加抗战，徐老站起身说：“到延安去可以抗战，在长沙也可以抗战。日本侵略军可能很快就会打到长沙来，长沙军民就要做好坚壁清野的工作，做好这些工作也是为了抗战。”他正在写这方面的文章。我们又说想去延安学习政治。他说在长沙也可以学习政治。第一次没有谈出结果。过了两天我们又去，他同意了。第三次，我们去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拿了介绍信和路费。当我和李震勋要去延安的消息传开后，在湘雅护士学校借读的南京中央医院护士学校的四个学生要和我们一起去。我们又去对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说了，他们表示同意，又在介绍信上填上了四个人的名字，并增加了路费。

1938年11月5日，我和李震勋及四个护士学生乘火车北

上。杨济时教授通过学院战时服务团发动30多位同学举着横幅标语从学院把我们送到小吴门火车站。横幅上写着：“欢送何武坦、李震勋两同学北上抗日”。杨济时教授、欢送的同学和我俩在横幅下照了相。这张相片后来经同学们寄到延安我们手中，可惜遗失了。火车徐徐向北移动，我们向杨教授和同学们挥手告别。

抗战初期中央军校在长沙招生点滴

周建烈*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侵华，北平、天津、济南、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相继沦陷。各地大学生由平汉、浙赣两路撤退内地，大部分汇集在长沙，虽然成立了一所临时大学，仍不能收容全部流亡学生。此时，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在长沙以中央军校名义招收学生，胡指派驻在长沙的第7预备师师长曹日辉、副师长李奇中兼任正副总队长（曹、李均为黄埔第一期毕业），并选定长沙市丝茅冲广雅中学（现长沙市七中）为校址（该校因敌机轰炸已停课）。共招收男女学生500余人，于1938年元旦正式开学，后经过甄别考试，淘汰了一批，留下400多人，编为一个大队，以梁化中为大队长（后梁调往200师，由刘鹤铭继任）。下分三个中队，一、二中队为军事队，三中队为政治队（队长周晴，黄埔六期毕业）。课程安排是：每天军事术科4小时，学科4小时，学科以典、范、令（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令）为主。另外每周还有一次精神讲话，以“总理遗教”、“领袖言行”为主要内容。政治队还增设了“军事哲学”、“党派分析”、“民众组训”、“宣传技术”、“救护常识”、“敌情研究”等课程。但最受学生欢迎的是名人讲演。当时，长沙名人荟萃，被邀请来校讲演的名人很多，现在记得起姓名的有田汉、茅盾、孙伏园、向培良（中央戏剧学校校长）、蒋百里（陆军大学校长）、龚德

*周建烈1937年入中央军校长沙学生大队，1938年毕业于中央军校第七分校第15期。

柏(《救国日报》社长)等，他们的立场观点各不相同，讲话的精神都是勉励青年投入抗日救国的斗争。他们讲演的题目和内容，我曾在日记中作了详细记录，可惜日记于1941年在日军扫荡太行山战役中遗失(当时我在27军政治部工作)。

这批学生中，有女学生40多人，编为第三中队的一个区队。其中有北大校长傅斯年的侄女傅罗素，南洋归国华侨司徒怀、徐燕丽，长沙姑娘则有：戚在傅、谭苏、潘淑媛、柴端群、尹懿秀、粟燕萍(后来成为沈醉的妻子)等。这批学生都是高中毕业和大学肄业的学生，女生中年龄最大的是谭苏，将近30岁了，她曾和谢冰莹一起参加过北伐战争。最小的是粟燕萍，只有十七、八岁，与我同坐一张课桌。

1938年3月，我们由汪震、刘钊铭率领，从长沙出发，乘火车去西安中央军校第七分校。途经汉口，在大智门车站换车时，这批女生被戴笠向胡宗南全部要走，送到湖南临澧县军统办的“临澧训练班”受训，成为该班的骨干。

我们男生400多人继续前进，到西安南郊王曲镇后，被编入第七分校第十五期。当时由于各方面急需干部，经上级批准，第三中队于1938年8月提前毕业，分派到第七分校和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第四团(设在西安南郊张学良办的东北大学旧址内)及胡宗南的第34集团军总司令部当干部。后来在七分校担任校刊《王曲》主编的廖伯周，在战干四团担任团刊《战干》主编的姚珞，都是政治队毕业的学员。其他同学也大都担负重要工作，颇受胡宗南器重。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有三位政治队毕业的同学投奔了革命圣地延安，即赵克(原名赵普)、蒋朝淮、孟繁英。他们在“抗大”学习后，去到敌后工作。在山西长治战役中，赵克被国民党27军46师俘虏，一度在27军政治部担任剧本写作工作，后来日军大举扫荡太行山，在混战中，赵克逃回到了八

路军。60年代初期，我在报上看到毛主席视察天津时，由“市委书记赵克”陪同，不知道这位赵克是否就是他。

政治队的这批同学中，有的已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有的分布全国各地继续为国家出力；有的远去美国、南洋、西欧；还有的在1949年去了香港、澳门、台湾，如孔令昆同学就是去台的一个。他曾任台湾海军陆战队司令、警政署长，最近又出任台湾驻马来西亚吉隆坡远东贸易旅游中心主任。

怀念伤兵医院的护士杨双梅

李 勋*

1938年夏天，从各个战场转来湖南治疗的10余万伤员，分别送入设在各大、中、小城市的后方医院。我也是其中的一名伤员。

1938年5月21日，我在兰封罗王抗日战场负了重伤。5月底，由野战医院送到湘潭103后方医院治疗，这个医院有3,000多伤员，我是重伤员之一，住在城内文庙院本部。这个庙里，有100余名伤员，护士却只有6人，她们是战地服务团医疗队的姑娘，都只20岁左右。起初，她们走马灯似地忙个不停，每天要干10多个小时的工作，没有几天，她们有的瘦了，有的病倒了，但却毫无怨言。后来，她们采取三班轮值，仍忙得废寝忘食。有的伤员还不体恤她们，大小便叫她们，要东西吃叫她们，伤口痛了也叫她们，有时稍不如意，就发脾气。但她们从不生气，总是和颜悦色，温语安慰。

其中有位当领班的美丽而大方的姑娘，操着温柔清脆的京腔，她待伤员如兄弟，亲切诚恳，但态度端庄，不苟言笑，大家既对她很满意，又非常尊重她。她就是22岁的白衣战士杨双梅，大伙都叫她“杨小姐”。

6月初，我第一次手术后，取出一块弹片，在杨小姐她们的精心护理下，伤口很快愈合了，但不知为何，伤口的痛楚丝毫不减，左下腿反而渐渐红肿得发亮。一天，杨小姐为我换药，她小心翼翼地把伤口内的药棉纱布，一片一片地取出来，

* 今助毕业于中央军校第16期，1938年在前线负伤后被送往湘潭103后方医院治疗。

最后取不动了，她用钳子夹紫纱布说：“忍住痛！”就用力一扯，突然一股黑色脓水从伤口内射出，喷到她脸上，我觉得有股奇臭，而她却一点也不在乎，慢慢地用药棉擦了擦脸，仍仔细观察着伤口，还用手指在伤口周围按了按，留下了几个深深的指印，黑色脓水又大量涌了出来，我感到越按越痛，痛得我满头大汗，终于发出了叫声，她才不再按了。

停了一会儿，她说：“我用口吸。”我不敢相信自己的听觉，问她说什么？她重复说了一遍。我想：她这样一个高贵的小姐，怎能干这种脏事。莫非她是开玩笑来安慰我吧！于是我说：“这种又臭又脏的伤口怎能用口吸？我痛得这样凶，你还开玩笑！”我的话刚讲完，她便严肃地望着我，然后低下头，望着自己胸前的两排红字，我本能地顺着她的视线看去，那上面印着：“战地服务团医疗服务队”和“把你的痛苦分给我”。顿时，像有一股温泉涌进我的心窝，但我仍不愿让她吸，说道：“杨小姐，这太脏了，不能吸！”

“我不是小姐，是护士，怕脏，就不能干这行，你们性命都不顾，我还怕什么脏！你真像个孩子。”她平静地说。

她说完拿来了一个洁净的便盆和一只盛满凉开水的杯子，叫我躺好，咬住牙，忍住痛，然后蹲下身，把便盆移放膝前，左腿弯曲，紧靠床脚，右手端着杯子，左手用药棉布在我的伤口周围擦了两圈，再慢慢低下头，用双唇紧贴我的伤口边沿，重重地吮吸着，吸一次，漱一口，反复十余遍。起初，我觉得很痛，后来渐觉不痛了。便抬头看杨小姐，只见她衣襟湿透了，头上汗珠直冒，脸色苍白，忽然一阵恶心，呕吐起来，最后支撑不住，一屁股坐到地下，眼泪鼻涕直流。

这下惊动了许多伤员，大家争喊“杨小姐”！我也感动得直落泪，几位轻伤战友赶来扶起她。杨小姐站稳后，摇着头说：“不要紧，只要你们痛苦减轻了，我什么也不要緊。”说

着，为我细心地冲洗了伤口，换了药，又护理别的伤员去了。

很奇怪，打这以后，爱叫喊的伤员，好像被杨小姐的行为感动了，再不乱喊乱叫了，有的虽有痛苦，见杨小姐来了，马上就不哼了。这天有人建议：不要再叫她杨小姐了，应该去掉“小”字，叫她“杨姐”，这样显得更亲切一些。大家一致赞成。以后大家都亲切地叫她“杨姐”。

后来我们问起杨姐的身世，才知道她是北京丰台人，父母都是医生，现在第39后方医院救死扶伤，她有个弟弟叫杨继开，卢沟桥事变不久，从学校参军，在宋哲元部抗日阵亡，还有个18岁的妹妹叫杨重芬，随她一起参加了医疗队，最近她俩才由野战医院调来。

几天之后，院里为我动了第二次手术，取出了最后一块弹片，在杨姐的精心护理之下，伤口愈合很快，身体也渐渐康复，可以出院了。就在这时，上级决定让我入中央军校深造，并敦促我在7月底前往考试，我万分高兴。为了纪念这段难忘的伤员生活，我买了一个精致的笔记本，请杨姐她们题词留念，杨姐高兴地提起派克金笔，用娟秀的字体写了如下赠词：“祝愿你：苦练更大本领，消灭更多日寇，为千万死难同胞复仇，争取抗战早日胜利！医疗队杨双梅，民国廿七年七月。”

离院那天，杨姐和其他护士为我送行。我紧紧地握着杨姐的手，望着她胸前那8个大字“把你的痛苦分给我”，激动得淌下了热泪，她的眼晴也湿润了。

时光如流，这事已相隔近50年了！我每每忆及杨姐的爱国精神和崇高品德，内心就久久不能平静。

武汉撤退与长沙大火

刘访滨*

七七事变后，我受命为铁道部交通警察总局派驻粤汉铁路的警察署防空护路大队第1中队队长。由于上海、南京相继失陷，国民党政府首迁武汉，粤汉铁路便成为中南军事上的大动脉，军运频繁，任务繁重。日军日夜出动飞机向沿线城市、桥梁轮番轰炸，扰我后方。我队从4月起，即担负该路徐家棚站和路局所在地的地面防空警备任务。当时苏美飞机一同停在武汉机场，为配合我军作战，常截击来犯敌机，在空中激战中，互有损伤。日军慑于我地面高射炮火猛烈，不敢低飞，仓皇投弹后就掉头逃窜，但也常被我军飞机歼击，从空中坠毁，大快人心。

南京失守后，路局即择定全线中心的衡阳苗圃作为后撤基地。在10月武汉未沦陷前，即将器材、物资陆续安全转移到该处。待田家镇要塞失守后，路局即奉命南撤衡阳。我队官兵陆续押护车船离徐家棚南下岳阳、长沙等地，我中队担负最后一批撤退员工的安全保护任务。待一切撤退工作完毕后，才登轮南驶。

武汉未撤退前，曾传闻蒋介石提出了“焦土抗战”、“坚壁清野”的方针，打算在撤退前将武汉付之一炬，以免资敌。报传各工商团反对与俯顺舆情，故尔中断。

在此之前，鉴于敌机沿线跟踪疏散车船盘旋扫射，为避免敌机骚扰，乃绕道洪湖。于次日下午驶抵长江北岸的上车湾，

*刘访滨当时任粤汉铁路警察署防空护路大队第1中队队长。

转抵岳阳，再换车南撤。当时各小站铁路岔道开始拆卸南运，员工亦作撤退准备，迄抵长沙，约是10月下旬和11月上旬了。我们暂驻在浏城桥附近。

文夕前某日，有老友蒋旭（当时任长沙警备司令部某团第1营营长）来访，据云“敌如迫近长沙，准备纵火烧城，不为敌用。此是上峰决策，一切准备就绪，只待敌来”等语。此时城内已是人心惶惶，大家忙于疏散。

12日深夜，卫兵将我喊醒，说：“城里起火了。”我急奔车站值班室车站司令部问讯，均说刚与汨罗通话，尚安然无事。究竟因何突然起火，谁也不知。大家瞠目相视，惊慌万状。转回途中，火势更大，人们如潮水般地向浏阳门外奔跑。我不明情况，只好通知中队紧急集合，然后率部离城，随人流开赴小吴门外的陈家垅。天明后，城内火势更大，浓烟滚滚，轰隆之声，此起彼伏，辨不清是爆破声还是炮火声。沿途所见，扶老携幼，背箱抱被，行李到处乱丢，谁也不屑一顾，只看如何快些逃命。清晨，我中队即选定原湖南监狱处长唐贊宇的隔壁民房为驻地。唐家两层楼数十间房子，已为长沙车站司令部进驻，这两栋大宅，因为我军驻扎才幸未被毁。

13日凌晨，我急步进城打听虚实，先到火车站，员工均已逃之夭夭，只见车站内外到处是行李箱，成箱成捆的布匹、药材弃置月台，无人问津，再问路人，谁也不知为何起火，旋巡视附近的宝南街、水风井、中山路几条街道，火焰未熄，有的继续燃烧，店内谷物烧得啪啪作响，除三五成群的伤兵外，别无行人，此时一架飞机低飞过来，盘旋几圈后而去，是敌机还是我机，不曾识别。

大概在15日或16日，衡阳路局派警察署长史铭来料理善后之事，我又随他巡视各大街小巷，到处断壁残垣，满目凄凉。

我的母亲率我从军抗日

黄 天*

我的母亲，名叫周咏南，湖南省祁东县人，生于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卒于1966年。她是黄埔军校16期的毕业生，我也是16期毕业的，我母子二人，在抗战初期，同时报考黄埔军校（当时已改名为中央军校），为同期同学，以后又一起参加了抗日战争。

我母亲出身书香门第，9岁能写短文，11岁能依韵作诗，且爱音乐、绘画，还写得一手好颜体字，功夫到了“足以乱真”的程度。此外，她从小习拳学武，有一身过硬的功夫，是一个能文能武的妇女。

她19岁结婚，20岁生子，21岁丧夫，我父逝世时，我才9个月。母亲为我取名“化圣”，是取“大而化之之为圣，圣而化之之为神”的含义。从此我们母子二人，相依为命。

1927年，我7岁，开始上学读书。当时，大革命的浪潮震撼城乡，激励了我母亲参加社会活动的决心，她于1929年在祁阳檀山湾设立女子私塾，后又设馆于祁东元木冲，广招女弟子入学。入塾女生，最少时只有7人，最多时达20余人，由于她教学认真，馆规严格，赢得了社会的同情和女生家长的支持。

1934年，我母亲感到诗词歌赋、之乎者也，与时代格格不入，但自己对于新学又一无所知，故罢教考入衡阳含章女子中学，毕业后，改教小学。1937年受祁东白地市中心小学校长罗

*黄天与母亲周咏南于1938年冬一起报考中央军校，被双双录取，毕业后均参加了抗日战争。

普周的聘请，到该校执教。

1937年秋，我肄业于南京三民高级中学，适逢“七七”事变，全国人民奋起抗日。次年长沙大火，大批难民涌向祁阳，母亲见无数的寡母孤儿，离乡背井，俱是日军侵略所造成，认为“日寇不灭，难以家为”，立志投笔从戎，并号召学生共赴国难，她以身作则，率先躬行。是年冬，我高中毕业，母亲原打算为我完婚。可是我毕业后，她却令我停考大学，也不准完婚，而要我投笔从戎，实出我意料之外。我说：“国家规定，独子不从军”。她说：“日本并没有规定，不准屠杀寡妇孤儿”。我被深深感动了。

1938年冬，我们母子同时报考中央军校，报名时，衡阳招生处负责人、指导员田某对我母亲说：“你39岁了，超过了年龄近20岁，不能报考。”我母亲含着眼泪，指着我说：“他是我的独生子，9个月失去了父亲，我历尽千辛万苦，把他带大，难道我舍得让他一个人到血肉横飞的战场上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是教员，应以身作则，今日我们母子一起从军，同时报考，共赴国难，你难道忍心拒绝我的报国之志吗？”田指导员被感动了，同意被考，我们被录取了。在分队时，我分在16期2总队，受训地点在四川铜梁，学的是步兵；母亲分在16期女生总队，受训地点在江西于都，学战场救护。1940年1月，我们同时毕业。

在毕业典礼上，校长蒋介石以蒋厅爱字第256号嘉奖令嘉奖我们母子，嘉奖令说“母子从军同学，共赴国难，夙世楷模，殊堪嘉奖”。《救国日报》亦以《母子从军抗日》为题，作了报道，号召全国人民向我们学习。

母亲在军校学习时，还曾夺得三次劈刺冠军，受到奖励。

毕业后，母亲分配在第九战区所属的53军，任军政治部中尉干事，驻守津市；我分配在第六战区，驻湖北恩施。

母亲在53军工作时，不愿坐办公室，要求下连队、上战场，并向该军政治部主任黄安宇提出建议：一是将随军家属组成女兵连，参加抗战，以减轻部队的拖累，二是广泛招收流亡女青年，共同抗日。这两项建议，深得军长的嘉许，并下令实施。

1943年1月，女兵连正式成立，我母亲被任命为上尉连长，并进行军事训练。

1943年冬，常德会战爆发，日军以10万兵力，从华容县城、藕池口、沙市等地南犯，围攻常德，双方展开激战，我守军不支，常德于12月2日陷落。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急抽调4个军支援，于12月8日，收复常德，并先后克复南县、安乡、澧县、松滋、公安等县。

常德会战前，我在湖北前线，收到了母亲的一封信，信云：“孝先吾儿知悉，常德战事，一触即发，你我母子，现以身许国，勿以安危系念。母如马革裹尸，志所愿也，希继承吾保国之志，激励士卒，奋勇杀敌，是所至嘱。”会战结束后，始知我母率女兵连，参加了津市保卫战，在战斗中，英勇顽强，进行白刃战，腿负重伤，犹指挥女兵，抗击来犯之敌，后被抢救出阵地，送往129兵站医院治疗。

1944年母亲伤愈后，调任129兵站医院新闻室少校主任，从事伤兵的励志工作。

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我母认为报国之志已达，便作出了“解甲归农”的打算，毅然提出退伍的要求，愿回家乡哺育英才，别人认为“蠢”的事情，犹母却怡然自得，于1945年10月回乡，受白地市中心小学校长张雨生之聘，仍回该校任教。

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母亲极为不满。当时，我在国民党68军185师554团当连长，代替营长，被调到湖北房县、保康、

均县一带，追击“共军”，母亲函电再三，叮嘱不要参加内战，令我即速回家，我盲迷心窍，没有从命。

1947年10月，母亲带领我的妻子和小孩，赶到湖北广水，以哭代诉，硬逼我回家，并向554团马团长哭诉守节抚孤的痛苦和母子从军抗日的初衷，马团长深表同情，即送母亲至汉口。在汉口，母亲强迫我回家，我不听教诲，又去台湾，至青年军205师任作战科长。1948年冬调防北平，及至参加北平和平起义后，母亲始慰。1952年10月，我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转业回乡，在祁阳县水利局工作，母子始团聚一起，共享天伦之乐。

回忆衡山青年战时工作队

谭安猷*

从抗日战争爆发到1938年10月，我华北、华中大片国土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相继沦入敌手，武汉危在旦夕。日军采取迂回战略，进犯粤汉铁路，窥视湖南，省会长沙吃紧。此时，国民党政府把大本营迁到了南岳衡山，于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及其政治部纷纷南迁，沿途车马，络绎不绝，军政要人，云集衡岳。

这时，已搬至衡阳渣江的衡山师范，又酝酿西迁，该校党员刘国安与我和衡山县平教会在学校办合作社的向大鉴（向前）商量，决定不再随学校搬迁，毅然返回衡山家乡，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0月下旬，时值深秋，我们一行三人肩挑行李，一日就赶到衡阳市，翌日搭乘军车，直达衡山县城，当晚借宿文峰塔下罗家大屋。凌晨，刘国安奔赴观湘门，遇上敌机轰炸，其时，正逢赶集，人山人海，西门外拥挤不堪，人们猝不及防，慌忙逃避，全城居民和赶集的农民死伤不计其数。街道旁的房屋被炸塌，残垣断壁，硝烟四起，尸横遍野，血染湘江，惨不忍睹，全城7,000多人，除死亡者外都躲到乡下去了，入夜一片漆黑，空无一人，满目凄凉。第二天，敌机又轰炸南岳，恐怖笼罩着全县。

在此之前，我们曾与从延安回来的刘东安、康杰和在长高就读的彭彬生相约，如武汉吃紧，立即赶回衡山，商量对策。此时，刘东安等人如约从长沙赶到县城，睹此情景，无不义愤

* 谭安猷当时系衡山青年战时工作队成员，现为湖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

填膺，于是，大家齐集县政府，共商救国大计。

成立衡山青年战时工作队

为了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刘东安、向大鉴、刘国安、康杰、彭彬生和我6人一起来到县政府，当时县政府的人已逃到郊外躲避空袭，空无一人。我们就在那里发起成立衡山县青年战时工作队（简称青工队），草拟了章程，写了一个报告呈请备案。因找不到国民党县党部的负责人，就报县长孙伏园（开明人士）批准备案。

我们得到县政府批准后，旋即相约一些有志的青年来到石湾召开成立大会。事先，刘东安、向大鉴、刘国安、康杰、彭彬生和我6人在石湾小教桥边一棵大树下举行预备会议，首先，由向大鉴代表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宣布，从现在起成立衡山“民先”队的组织，到会的均被接收为“民先”队员，并推定向大鉴为衡山青年战时工作队队长。这时日已西斜，夜幕降临，我们一行又走到铁头岭刘重德家里，在那里已聚集有谭云龙等10多人。第二天在教叙学校召开成立大会，推选了队长和秘书、总务、组织、宣慰、训练、救护、征募等股股长。

青工队成立后，又返回衡山县城找到北门37号一座民房作为队部，开始活动时，没有经费，我们每个人都把本期在校退回的伙食杂费拿出来“共产”，每天在饭馆里，吃点萝卜白菜饭，偶而有人请吃一顿炒元宵，便算是开荤了。时值寒冬，天冷衣薄，就互相帮助，康杰曾把他穿的毛线衣给我穿了一个冬天，真是解衣衣人，情同手足，至今尤不能忘怀。我们的物质条件虽然很艰苦，但精神抖擞，斗志昂扬。

与此同时，党员刘国安很快就与中共衡山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党的负责人欧阳方深入青工队，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发

展了刘东安入党；并派邹得琛驻队加强领导，随后又发展了向大鉴、康杰、彭彬生和我入党，并建立了党支部。这样青工队以后就在党支部领导下积极开展各项抗日救亡活动了。

向群众报告战况

敌机轰炸衡山县城后，县政府搬迁郊外办公，衡山唯一的报纸《衡山通俗日报》停刊了，一时消息不通，人心惶惶，群众渴望知道前线战况，为了满足群众的要求，安定人心，我们不顾敌机轰炸的危险，坚持每天晚上从北门步行到南门外山花冲县政府守候收听广播战况。第二天凌晨，取得收音员复写的战报，再赶回北门队部，用废报纸分头抄写，然后到城内张贴。晚上，再到县政府用电话把战况传送到各个乡镇。半夜还得返回队部住宿，我们就是这样通宵达旦地奔忙着！工作着！

慰劳伤兵 救济难民

自队部设在北门外37号后，与社会人士的交往也就频繁了。最早与我们合作的是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他们有钱有粮，但人手不够，语言不通，我们除了传送战报外，就抽出人力来与他们一起去慰劳伤兵，救济难民。在河东火车站，经常有大批伤兵难民过境停留，急需后勤服务。队部派刘国安和我会同青年会服务部的几个人组成小组到火车站开展工作。我们在车站附近的农庄借来大铁锅，用土砖架灶煮稀饭和烧开水，每当满载着伤兵和难民的列车到站后，我们就送开水，供稀饭。同时，还向他们广播前线战况，对安定民心，鼓舞士气起了一定的作用。

城南小学搬到吴集后，学校驻扎了一个伤兵医院。有一个姓王的看护长常到我们队部来，我们也到他们那里去进行慰问，组织歌咏队到病房演唱抗战歌曲。同伤病员亲切交谈，为

他们代写书信，邮票和信笺都是我们募捐来的，每当写完信念给他们听时，伤病员总是握着我们的手，激动得热泪盈眶。

开办书店 传播抗战文化

衡山遭空袭后，书店停业，进步书刊无法发行。为了宣传抗战，传播进步思想，满足群众对文化的需要，我们在北门朝天街开办了一个书店，我曾被臥部派到衡阳从向愚开的书店里要了一批进步书刊运回衡山。书售出后再付书款。这样，既为青年开辟了阅览园地，宣传了抗战文化，满足了群众的求知欲望，也为青工队筹集到了一点经费。

设立救亡室 组织学习

为了提高队员的思想觉悟和工作能力，我们设立了救亡室，图书是队员们提供的，也有社会人士捐赠的，如《大众哲学》、《通俗经济学讲话》、《政治经济学教程》、《社会发展史》等。

图书主要供队员学习，也可以供社会人士借阅，我们在工作中实行自我教育，每天工作结束之后，还举行生活检讨会，互相开展批评，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我们每周举行一次时事座谈会，邀请社会人士参加，围绕“抗战的意义和前途”这一中心内容进行讨论。

组织歌咏队也是我们开展的一项活动。教师是从基督教青年会请来的，他们还供给歌曲教材，每天教唱一次。后来，我们队员中也有了会唱歌的，如邹美、雷洁等，她们还会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就由她们带领大家唱，同时还学习普通话。这就吸引了一些音乐爱好者来到我们的行列中。当时岳阳逃难来的两姐妹，小的叫阎渊，留着分头短发，男装打扮，走起路来挺着胸脯，一蹦一跳的，活象一个“假小子”，她们在听到我们唱

流亡三部曲中的“在松花江上”时，热泪直流，泣不成声，并积极要求参加青工队，后来她成为我们文艺演出队的一名活跃分子。

我们还成立了漫画组，第93师政治部干事王润林，能画漫画、写美术字，经常来帮助我们画壁报刊头和插图以及写标语等。我们几个队员就主动向他学习这方面的技巧，以后就上大街提着铁桶，装上土球或烟墨，用棕刷子在城内墙壁上写大标语，远近都能看见，十分醒目。

为了在游击战争中能向前线日军喊话，我们还从第93师请来了日语教官，每隔一天教我们上一次日语课，还教我们唱日语歌，以便对日宣传。

同国民党县党部的斗争

在中共衡山县委领导下，我们的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对群众的影响也愈来愈大，因而引起了国民党县党部的仇视，他们不断地对我们施加压力，妄图把青工队搞垮。在开始成立时，由于我们一时疏忽，在宣布衡山“民先”队成立时，混入了国民党极右分子周翠峰。事后发觉，便加强了警惕，但成立衡山“民先”队的机密已经泄露，无法挽回。他经常向国民党县党部书记丁香芹汇报，他们首先是不准我们备案，以此压制我们的活动，但由于已向县政府备了案，县党部也无可奈何，即派人跟踪侦察。县党部干事彭文富，千方百计来刺探我们的情况，他利用师生关系，经常到队部来，找我们拉扯，借以窥测方向，有时坐到深夜，赖着不走，就挤在一起睡了，我们开时事座谈会，彭也自动来参加，就这样围着我们转了一个星期，没有抓到什么把柄，只好作罢，不再来了。

当汪精卫发出“艳电”后，我们在县城墙上刷上了“打倒大汉奸汪精卫”的大幅标语，县党部却指使警察涂抹掉，我们

又继续写上了。

由于县长孙伏园的支持，我们青工队与国民党县党部抗衡了一段时间。到1939年春，县党部借口统一领导，要青工队合并到衡山县民众抗敌后援会，改名为“衡山县民众抗敌后援会战时青年工作队”。党支部审时度势，为了顾全大局，经请示衡山县委，在领导权不变的前提下，同意合并，于2月14日在县立女校召开队员大会，选举新的领导。除队长由抗敌后援会负责人兼任外，副队长为向大鉴，各股长仍是原班人马，只是增加了几个开明人士，如雷洁、刘重德等。这样，虽然更换了名称，但领导权仍在我手中。这时队部也从北门37号搬到了县立女校办公。

下乡组织民众训练工作

为了备战，各乡都成立了抗日自卫队，我们以县抗敌后援会的名义，派队员下乡去参加民众训练工作。我被派到白水桥参加民训工作，主要是做政治思想工作，宣传抗战的意义，坚定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心，鼓舞民众保家卫国的士气，还教他们唱抗战歌曲，如《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声讨汪兆铭》等，激励他们同仇敌忾，杀敌除奸。

赴各乡作巡回宣传演出

1940年春节快到了，我们想筹备一次大型的化装宣传活动，深入农村作巡回演出，我们的文艺宣传队有话剧、歌咏、宣慰等组。想过一段排练，准备了《放下你的鞭子》、《林光荣的牺牲》等几幕活报剧，以及《歌八百壮士》、《在太行山上》、《游击队歌》等抗战歌曲。2月下旬，我们开始出发。经白莲寺、杨林桥、夏铺、吴集到石湾再返回县城。我们每到一地，就出壁报、贴标语、画提画、演出活报剧、开展歌咏活

动。在演出前，还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战形势，这些活动深得群众欢迎。

分散农村教书 深入农民群众

丁香芹下令将青工队解散，中共衡山县委也认为需要改变一下斗争策略，就要求大部分队员到农村去当教师，以教书作掩护，分散下乡，深入农村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但当时教育当局却为难我们，说什么不是师范毕业的不能当教师，我们说那就和你们教员比一比，看谁的文化水平高，谁的抗战认识高。教育当局被迫举行教师考试，我们队员都名列前茅。但又要我们自己找学校。结果，刘东安到了谭氏正本学校；康杰到了丘田小学；刘国安、谷济兴（现名石定）和我三人到了吴集乡，乡长向梅卿比较开明，热情欢迎我们去，于是我们就分别在井冲、鹤形、塘塘三所彼此邻近的小学教书。白天上课，晚上集中自学和研究问题。星期天走访学生家长，深入农民群众，举办农民夜校，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刘国安和我准备发展党员，并筹建党的区委会，但因时间太短，成绩不大。一个月后我们就离开吴集到南岳游干班学习去了。

与此同时，队长向大鉴在县城印发《告全县民众书》，揭露国民党县党部无理解散青工队，压制抗日救亡活动的行径，大声疾呼“爱国无罪，抗日有功”，呼吁全县父老兄弟申张正义。《告全县民众书》用快邮代电形式向全县散发，队员王炳泽趁县城赶集之际，将《告全县民众书》散发给过往行人，激起群情愤慨，影响很大。消息传到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当时任教育长的汤恩伯闻之也感到问题严重，斥责丁香芹把青年逼到农村去是愚蠢行动，并派人到县城找队长向大鉴商谈青工队的善后事宜，亲口许诺要青工队员进游干班学习。至此，我们和国民党县党部的斗争告一段落。

在南岳游干班的日子里

刘东安*

1939年春，国共两党合作在南岳举办了一个游击干部训练班。中国共产党派叶剑英等参与了游干班的领导和教学工作，周恩来也前来作过题为《抗日战争的政略和战略问题》的演讲。我当时参加了第一期游干班的学习，现就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忆述如下。

南岳游干班筹建于1938年年底，1939年2月中旬开学。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游击干部训练班”，由国民党第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任主任，我党派叶剑英任副主任。后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训部长白崇禧以部队训练要归军训部领导为由，报请蒋介石批准改名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简称南岳游干班），由蒋介石兼主任，白崇禧、陈诚（军委会政治部主任）兼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国民党第54军军长陈烈任政治部主任。游干班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基本上由汤恩伯安排。1939年5月汤恩伯调离后，由李默庵接任政育长。我党中央除派叶剑英担任副教育长外，还派了李涛（少将）、边章伍（少将）、吴奚如（上校）、薛子正（上校）、李伯崇（上校）等担任教官，还派有几个机要、警卫人员。

我当时是在游干班第7队学习。这个队是1939年4月5日开课的，住在南岳山下何健公馆。第1、2、3、4、5、6队早在2月份就开学了，5月下旬即毕业。他们毕业后，我

*刘东安当时是南岳游干班第一期第7队学员，地下党支部书记。

们第7队便搬到南岳山上圣经学校继续学习，到7月份也毕业了。

游干班的第1、2、3队多是从部队抽调的营、团级干部，少数是战地文工团和不好安排的荣誉军人等。第4队是汤恩伯利用职权将第31集团军随营干训大队编成的。第5队为第31集团军的文工团，是抗战初期招收的青年男女学生。第6队大都是少校级以上荣誉军官。第8队是白崇禧从工兵学校调来的。每个队100多人，第一期8个队共1,000多人。

我所在的第7队共150多人，除了我们衡山青年战时工作队的四、五十人约占三分之一外，还有衡山县国民党县党部推荐的人，约占三分之一，其中有连长、警长等，有的年龄30多岁。除此，还有三分之一是老、病、残军官，战地文工团政工人员和外地进步青年等。

第7队队长是何凌霄（少将），队附是黄懋（上校），指导员是杨光寰（上校），助理员有夏志彬（少校）、傅仁（少校）。下辖3个区队：第1区队长刘飞鹏（中校），第2区队长是刘铁铮（少校），第3区队长是舒培之（少校）。每个区队下辖3个班。我先被编在一区队，后来改编过多次。

南岳游干班主要是学习游击战术、游击政工和群众工作方法，还有领袖言行、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党史、战时法律、经济、日本研究等课程。我队开学10多天后的4月18日上午，我们在南岳圣经学校礼堂里，听了周恩来同志的重要演讲。他是以国际问题讲师的名义来演讲的，题目是《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他精辟地分析了进行持久战和我必胜、敌必败的各种因素，深入浅出，讲得十分透彻。大家听后收获很大。4月19日上午，日本问题讲师鹿地亘讲了日本国内民众生活情况和反战情绪等。以后，胡愈之、梁寒操、白崇禧、陈诚等要人也来讲过课或讲过话。

大约在4月下旬，游干班全体学员又在圣经学校礼堂集合，听教育长、副教育长的讲话。汤恩伯先讲，大意是：友党派来叶剑英担任游干班的副教育长，帮助大家学习游击战争。打游击他们是专家，过去我们打过交道。他们几支枪，人也不多，这里打，那里打，我们老是扑空，老是被动。现在共同对付日本，我们要团结一致，学好游击战，在蒋委员长的统一指挥下，打败日军。

叶剑英副教育长接着说：我们现在在一起了，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能只靠一条战线，要有正面战场，还要有敌后战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敌后战场显得更为重要。我们要认真学习，把学到的东西运用到战场上去，打击敌人。

这次演讲，学员们都感到气氛很融洽，真正看到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新气象。

以后，叶剑英副教育长还给我们讲过几次课，主要讲游击概论、群众路线等。他给其他队讲课都是几个队在一块听，唯独给我们第7队是单独讲的。

叶剑英副教育长说：游击战就是教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起来反抗奴役、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武装斗争，这是压迫者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的。开始他们没有武器，用的是大刀、长矛，慢慢地从敌人手里夺取比较好比较多的武器弹药，来壮大自己。这种战争开始总是教强我弱，因此，不能死打硬拼，只能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办法。我们不愿做奴隶，不愿做亡国奴，我们要起来反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他接着说：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是从我们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逼出来的，没有谁教我们。日本鬼子来了，大家拿起武器和它干，敌人不来就拿起工具做工，拿起锄头种地，这就是游击战争。实际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民群众有了觉悟，敌

人一压迫，就起来干，就组织起游击队。我们游击队没有兵源问题，人人可以当兵，人人都愿意当兵，这叫武装自卫。因为这样，我们不愁供给，不愁没有武器。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所以只要有群众的地方，日本鬼子来了，我们都可以组织起来打游击。

最后，叶副教育长说：你们可要注意，没有人民群众拥护是打不成游击战的。要诚心诚意依靠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办事，要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要组织他们自己去解决问题。这样，群众才相信你，把你当做自己人，你才能活动在人民群众中间。没有群众基础的，没有群众拥护的武装，那不是游击队，那是别动队、特务队。

叶剑英副教育长的课讲得通俗易懂，大家听起来十分亲切。

5月间，在第1、2、3、4、5、6队毕业前夕，叶剑英副教育长指挥我们全体学员进行了一次野外军事演习。他身着黄呢军装，骑着一匹棕色马，在演习前给全体学员作了简短动员。他说：我们前段学习了游击战，今天是来检验我们学得怎么样的，大家要人自为战，都要认真去做，不能当儿戏。

我们第7队由李伯崇教官带队扮演敌军，从南岳下山后，经樟木桥到沙泉铺住了一晚，第二天到了衡山与湘潭交界的护湘关。我们队有个姓李的学员化装成当地老百姓，作为向导带着其他几个队爬山越岭，次日也到了护湘关，被假扮的敌人包围了，打了一阵子，最后，以一阵哈哈大笑结束了演习。

过了几天，在大操场上，叶剑英副教育长作了演习讲评。他肯定了实践演习是有收获的，但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他说：现在抗日战争进入了紧要时期，人民群众在遭受血腥屠杀，让我们大家在这里学习是不容易的，应当好好学习，学好本领为民族解放，为抗日战争出力。但有的人不严肃、不认

真，在演习中，稀稀拉拉，这样就对不起人民，你们要当做教训，要知道平时不严肃认真学习，实践中是会要付出血的代价的。

在游干班里，国共两党也是有斗争的。叶剑英同志一方面坚持团结抗日，同时对国民党的反共活动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记得是5月底的一个晚上，我们集合在圣经学校礼堂听演讲。先是汤恩伯教育长讲了抗日形势，最后他说：抗日战争很紧张，现在有的人不顾蒋委员长的统一指挥，只顾自己扩大势力，不打敌人，是“避安全之区，击无辜之民”。叶剑英副教育长听后即上台予以驳斥，严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忠实执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诺言的，我们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坚持团结抗日，反对分裂投降。现在确有一些摩擦专家，阴谋分裂抗日统一战线，破坏抗日运动，我们共产党是坚决反对的。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我们坚持抗战到底，说到做到，决不象有些人天天念阿弥陀佛，实际上男盗女娼，尽干坏事。

这次会议后，我们感到国共两党关系又有点紧张了，可能要出事的。

南岳游干班第一期第7队从4月5日开学，到7月15日结束，历时3个月，学习是紧张的，生活也很愉快。抗日歌声，每天不断。当时我们最爱唱的歌曲有《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歌》、《大刀进行曲》、《歌八百壮士》、《毕业歌》等，有时，我们还把《在太行山上》改唱为《在南岳山上》，大家唱起来，十分亲切，歌声增强了我们对抗战必胜的信心。

学习期间，各队都轮流到南岳山下做群众工作，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南岳镇还由游干班办了一个不脱产的妇女训练班，由旷小巽负责，有三、四十人参加，都是青年妇女。她们学唱抗日歌曲，还学战地救护。我党

还在南岳镇街头办了一家进步书店，出售抗日进步书籍，影响也很大。

游干班的学员毕业后，大部分分配到各战区抗日前线，我们第7队的学员，一部分分到九战区（长沙），一部分分到三战区（上饶）。

我们到三战区去的学员有五、六十人，由几部大卡车运送，经耒阳、攸县，在茶陵住了一晚，最后到了江西上饶，大多数同学投身到了抗日战争敌后游击战场。 （曾纪荣 整理）

回忆在南岳游干班 听叶剑英将军讲课

杨定一*

1939年春，国共合作在湖南南岳创办了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游干班第一期学员是从国共两党现役军人连以上团以下的军官中调派的。我当时是湖南祁阳抗日救亡队队长，由父亲杨一栗（又名杨若海，在游干班任教官）介绍，进入游干班第一期学习，编在第6队第1班。当时正在太湖执行游击任务的朝鲜爱国青年金世日也编在第6队。叶剑英将军在游干班任副教育长兼游击战术总教官，他身材魁伟，精神饱满。经常穿一套半旧灰军服和一双半旧长统马靴，他虽然也讲普通话，但总是带着广东话的尾音，他与同学们谈话，和蔼可亲，谈笑风生，没有半点架子。

游干班为了避免敌机空袭，利用南岳密林中山沟顺着山坡的斜度，挖成一排排梯形座位，成为一所天然野外课堂。

叶剑英将军对游击战术理论造诣很深。他讲课声音宏亮，同学们听课时，好象铁碰到磁似的被吸引住了，真是鸦雀无声。大家都聚精会神地侧耳静听和忙于作笔记。他说：“游击战与阵地战不同，游击战是在敌人后方进行的战斗，游击队就象神话小说封神榜中所说的，都是天兵天将，来无影去无踪，真是丈二和尚，叫敌人摸不着头脑。它不象正规军那样，在各

* 定一当时是湖南祁阳抗日救亡队队长，1939年春入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学习。

方面都有补给，我们是自力更生的队伍，正象游击队歌词唱的那样：‘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他又说：“游击战是只有攻击没有防守的战斗，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们总的战术是：化整为零，变零为整。如果战斗对我们不利，我们就把整个的队伍化为若干三五成群的麻雀队，散布在四面八方，使敌人找不到我们的目标，以保全我们的战斗实力。如果战斗有利，我们就把分散的麻雀队集中起来，成为一支强有力的攻击队伍，一举歼灭敌人。这里有三个基本原则。这三个原则都很重要。大家一定要掌握好，运用好。一是敌人小于我时，就要吞并它，使敌人成为我们最好的运输队和后勤队。二是敌人等于我时，就要各个击破它。三是敌人大于我时，就要牵制它，配合我主力军来消灭它。”当时有人提问：“在军力上敌众我寡，在武器上敌优我劣，怎能把敌人牵制住呢？”叶剑英将军胸有成竹地笑着说：“我们在农村经常可以看到，一个五、六岁的娃娃，能把一头大水牛乖乖地牵着走。大水牛比五、六岁的娃娃要大多倍，为什么牛能听小娃娃的指挥呢？问题很简单，只要我们抓住它的弱点，牛就会自然而然地听指挥。牛虽大，但鼻子是它的弱点，只要把绳子拴在它的鼻孔里，它就会乖乖地听指挥。我们对强大的敌人也是这样，只要抓住它的弱点，敌人也同样跟着我们转。‘声东击西，是牵制敌人的一条法宝，所谓‘声东击西’在军事上叫做‘佯攻’。我们把主力军埋伏在西方，却在东方虚张声势，扬言要攻击敌人，使敌人把西方的军力调往东方，待敌人在西方的军力薄弱了，这时我们再猛攻西方，然后我们又能转移到南方或北方，使敌人防不胜防。如果碰上狡猾的敌人，按兵不动，我们的麻雀群就从四面八方攻击，扰乱敌人，挫伤其战斗意志，配合我主力军来消灭它。这样也和小娃 娃牵水牛一

样，敌人会跟着我们跑的。总的来说，我们国家是一个地大人多、山高林密、山回路远、地形复杂的国家。有开展游击战的有利条件，任何来犯的敌人，它只能占领我们的‘点’和‘线’却占领不了我们的‘面’，敌人的四面八方随时都有受我们攻击的危险，最后胜利必然是属于我们的。”

以上这些精湛的游击理论，叶剑英将军讲得十分生动，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几段经历

雷 敢*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卢沟桥事变”的六年，我先后在天津和北平的两所中学任教。下面叙述其间见闻。

“九一八”到“七七”事变见闻

当时，日本为配合军事、政治侵略，同时进行经济、文化的侵略。他们高喊“日中经济提携”、“日中经济共荣”等口号，实行经济侵略。“满铁”在天津设立“兴中公司”，假借“开发华北经济”名义，进行掠夺，从此华北的铁路、矿山、工商贸易、财政金融，大部份被日本垄断资本所控制。

日本通过武装走私，大量倾销日货，破坏我国海关制度，让浪人和汉奸，集结在北戴河一带港口，进行走私活动。北平、天津街头地摊上，充斥日本的走私丝绸、布匹，商贩叫卖，噪声盈耳。其他如卷烟、火柴、面粉等商品，也都涌入中国商场，损害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这才引起了英美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震动和反对。最令人惊心动魄的，还是日本推行的鸦片烟毒化政策。浪人和奸徒在平津街头小巷，到处设立鸦片、白面（海洛英）馆。那时，我在天津河北区居住。

* 雷敢现年86岁，抗日战争时期在北京、天津、长沙等地担任中学和大学教师，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而流离迁徙。解放后任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天晚上，偶然到租界逛逛夜市，只见货摊林立，陈列的尽是鸦片烟，以及烟枪、烟灯之类的用品，使我大为吃惊！又一次，我在北平，去访问原来住过的几家公寓，发现都成了鸦片烟馆。大学生寄住的地方，而今出入的尽是烟鬼、毒贩了。原来相识的一、二青年，已经染上了吸毒的恶习。一次游中央公园，居然看见有人用空了头部的纸烟，盛上白面，朝空像高射炮似的当众吸食，其人面色惨白，宛如死人。平津一带吸白面者日多，政府设立了戒毒所，把吸毒者送入强迫戒毒。有的瘾发，犹如大病，痛苦不堪，躺在地上打滚，甚至逃出复吸，虽如以重刑而不能制止。这些惨状，真是触目惊心。日本帝国主义不仅要亡我们的国家，还要灭我们的种族！

日本在内蒙古西部，建立了傀儡政权——“蒙古自治政府”。该“政府”的经济部次长、日本人沼野不二，曾强迫老百姓，扩大鸦片种植面积，借以牟利和毒害中国人民。近年日本爱知县的江口教授，公开发表“沼野资料”，证明日本侵华战争，无异第二次鸦片战争。

日本军人耀武扬威，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有时故意在租界马路上打球、阻碍交通，致使公私汽车被迫停在街头，莫可奈何。文化特务进入平津学校后，对学生进行所谓“文化测验”。意在毒化学生思想，并准备制定进行长期文化统治的方案。1936年4月，一批日本人到北平女二中要求对该校学生进行思想文化测验，学校被迫停课；由他们散发事先印好的题目，我们只得依从。其中有一个特务甚至企图潜入学生宿舍进行活动。有一次，一个日本特务，进入北平民国大学，声称要会见代校长刘彦。因为刘彦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早期留学生，以著有《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而闻名。那个特务以此威胁刘彦先生，最后还向他进行勒索。有的浪人闯入北平图书馆，毁坏图书，胡搅蛮缠，捣乱秩序。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的。那时，凡属爱

国家爱民族的人，莫不痛心疾首，感于亡国灭种之无日，同仇敌忾之心与日俱增。

当日本人高唱“日中经济提携”之际，我任教的天津扶轮中学的学生群起反对。一次，我被邀在大会上发言，加以鼓励。演讲词刊载在《扶轮周刊》上，学校当局唯恐触怒日本及其走卒，勒令周刊停止发行。日本所倡的“经济提携”，得到汉奸殷汝耕、殷同之流的响应。殷同于此时窃取了北宁铁路局长职位，控制着扶轮中学的经济来源。学生闻讯，激于义愤，掀起了反对压制抗日爱国运动的风潮。事为南京铁道部所知，来电说：“风潮完全由历史教员雷敢一人所煽动，应即解聘。”我只得送家属南下回老家，自己留在北平，另谋工作。当我们离开学校时，小儿普文才7岁，正在上小学。他的同学看见他坐在载有行李的黄包车上，行色匆匆，就问他：“雷普文，你到那儿去呀？”我听了心肠欲裂。第一次尝到了爱国“有罪”的滋味，使儿子也不能安心上学了！

在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人民大众抗日要求愈益增长之际，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战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获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

在南方，先有震旦大学校长、百岁老人马相伯，到处演讲呼号。继有沈钧儒、李公仆、邹韬奋等“七君子”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开展救亡运动。在北方有北京大学教授马叙伦、许德珩等为首领导的抗日宣传活动，他们呼吁破除唯武器论的迷信，提出以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埋葬敌人。其中刘侃元、张申府两教授一度被宋哲元逮捕入狱。经群众奔走呼号，又得冯玉祥将军营救，始获出狱。

同年12月9日，北平一些大中学校学生近万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示威游行，聚集在新华门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

遭到军警镇压。我任教的北平女二中学生，原来被学校关在紧闭的大门之内，不许外出参加游行。当游行大队到达宣武门大街时，学生闻声群起响应，夺门而出，参加游行。其中有毛德贞、翁燕娟（翁文灏之女），年仅十一、七岁，或被大刀砍伤手臂或被棍棒打伤肋骨。这是我亲见的一例。接着，全市学生举行总罢课，并酝酿在一周后举行一次更大的斗争。不久发生西安事变，但由于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共党实现第二次合作，举国一致抗日打下了基础。

这时，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人刘少奇，早已进入北平，加强了对地下党员和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领导。从而推动了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各校爱国师生，群起参加救亡运动。他们或集会演讲，或举行座谈，或签名倡议，或游行示威，声势浩大。我记得有一次，由北京大学等校学生发起，在中法大学大礼堂，召开演讲大会。会上由杨秀峰、雷敢、黄松龄发言。杨、黄等都是地下党员，执行了党的正确指示。又一次，由学联发起组织各校学生，在钓鱼台广场上举行游击战演习。我被邀参加，并就地讲了游击战在战争中的作用，和历史上革命游击战取得胜利的事例。其时，战争形势，日益紧迫，有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之势。

从沦陷后的北平逃出经过

1937年7月初，我在北大图书馆阅报室阅报，忽然看到日文版的《北平新闻》报导：“7月7日，日中两国军队，在卢沟桥发生激烈冲突，战争爆发。”我大为震惊，急忙回寓。翌日，北平各报始发出号外，发布了这一消息。接着，北平上空连日有致机用机关枪扫射居民。那时，我住在伯父家，一家人习惯于和平安定生活，没有战时经验，一时慌张不知所措。只好把棉被堆在桌上，人躲在下面，以避从敌机上射下的枪弹。

其时，城中一切消息断绝，居民预感大祸临头。而社会秩序如常，只是新添了少数乞丐，似乎是逃入城中避难的。街头显出静寂可怕的气氛。

7月29日，北平驻军被迫撤离或缴械，并无战斗。次日满街张贴了《大日本皇军入城军司令部告示》，略云：“凡有刺探军情，破坏电线，阻碍交通……者，一律军法从事。”火车站改由配带“东洋刀”的日本兵巡逻、检查。平汉铁路已不通车。我家住湖南，不能长期留居北平，决计由天津绕道南下。在离开多年安居乐业的北平前夕，我独自一人到北海公园，和它作最后的惜别。当时夕阳西下，照得湖水火红。风景不殊，而山河变色。昔日男女老少联袂嬉游，热闹非常的园中，而今寂寥无人，鸦雀无声，显得凄凄惨惨。出园门时，徘徊良久不忍离去。瞻念民族国家前途，不禁百感交集，忧虑重重！念及古人“何日更重游”的诗句，更觉伤感。

北平沦陷后二十多日，我和天津扶轮中学一位同事结伴南归。先由北平赴天津。当进入车站时，日本军警对乘客挨个搜身检查，审视像貌，察验手纹，凡检怀疑为职业军人或游击队员的，就有被扣留的危险。我们两人都是文弱书生模样，双目近视，背脊微弯，幸未被怀疑，而得放行、登车。车上乘客拥挤。有两个日本浪人，或盘膝而坐，或横身而卧，白眼横眉，旁若无人，人亦不敢近前。往日北宁铁路平津段，秩序井然，车次正点。乘客只要泡一杯茶，慢慢喝完，即可到达。而今敌军在每一个车站的屋顶之上，搭一瞭望台，日夜驻守。客车每到一站，必停车等待检查。因此走了一整天，傍晚才抵达天津。

天津是我工作多年之地，如今满目凄凉，面貌全非了！我们好不容易找了一家刚刚恢复营业的旅店。室内用门板架着几个床铺，床上一无蚊帐，二无垫褥，蚊虫终夜绕梁而鸣，使人不

能合眼，附近驻扎的尽是日本军人，音乐歌舞，喧嚣达旦。旅店掌柜关照，夜间倘若日军入店查询，必须立即起床应付。因此终夜提心吊胆，哪敢入眠？

那时津浦路北段已不通车，我只得由大沽口乘海轮沿海南下。当时日本租界禁止中国人进入，只能乘驳船经过沽河上岸，进入公共租界（收回的原奥租界），然后才能到大沽口搭海轮。这只驳船上，有约20来个乘客，在航行途中，两岸到处设有日军据点。他们一招手示意，本船就得立刻靠岸，接受检查。检查后，行不到一里，对岸又招手示意停船。这样船行不到几里，忽东忽西靠岸受检查多次。最后在公共租界上岸时，我个人受了比较严格的搜查盘问。原来我穿的是一双取去冰刀的旧溜冰鞋，因此被怀疑鞋子里面藏有秘密文件。我本来能说几句日语，想用日语加以解释。转念一想，这样做将被发现为通日语的“人才”，有被扣留强迫作帮凶的危险。我只得打手势应付一番。经检查后，脱身而去。我雇一辆黄包车，携一口皮箱，进入公共租界。入口处，站有西人和华人双岗巡警，命令停车检查。凡携带行李的，不得进入租界。但华人巡警似乎有些同情，意欲放行，故意问：“箱子里没有东西吧？”我答：“没有。”他叫一声“走”！我才松了一口气。车子进入租界，我投奔友人朱非白家。这块地方已是中国的地界，心情顿时安定下来。夜间可以收听到南京电台广播的新闻。次日我购好英商太古公司开往青岛的海轮船票。上船后，船主并不把乘客当作客人对待，只顾装载堆积如山的货物，并无客舱与座位，让乘客们各自寻觅容身之处。我和同伴在堆集的煤油箱上，铺开了一席之地，权且休息。船抵烟台，苦中作乐，上岸一游，但见市上开设着一些酒吧间、咖啡馆，专供英美军舰上的水兵们消遣。游毕登船，继续开航。船抵胶州湾，只见一艘高耸入云的日本航空母舰，停泊在海面上。这是往年我在青

岛避暑时不曾见过的。青岛是随时可以被占领的，因此市面萧条，毫无生气。我们没有逗留，即时乘胶济路车，到达济南，住入省立第一中学。济南也毫无备战的迹象，可以想见，南京政府是没有抗战决心的。在济南，我遇到天津扶轮中学的杨老师。他是本地人，很安闲自在地准备在家乡重操旧业。他见我们风尘仆仆，担心我们盘缠不足，出于一片好心解囊相助。此时，中共地下党组织设置了“南下青年接待站”，组织青年过集体生活，每日进行军事训练和时事政治学习。其中有一个我在北平女二中的学生、民先队成员白士珍。她是早已沦陷的河北蓟县（今属天津市）人。我和她长谈了抗战形势。她认为抗战将是长期的，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必将在战争中更加壮大，劝我不必南下，留在北方参加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战。我因老父及妻子都在南方家乡，心存苟安，一时下不了为国献身的决心，没有听从她的劝说，错过了参加革命队伍的机会。

我由津浦铁路南下，到达了南京。当时，“八·一三”上海抗战已爆发。可是沿途冷冷清清，看不出有发动群众，举国一致备战的气氛。只在经过徐州时，看见几辆载重汽车，象是军用汽车。此情此景，不免令人为抗战前途担忧。南京局势紧张，夜闻灯火不明，路无行人，电话不通。政府达官贵人，有的早已远走高飞，有的正在作西迁武汉、转移重庆的准备。我离开南京到达武汉时，武汉三镇安谧如恒。两月后，我由武昌到了长沙。长沙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日益成为南下西迁的各界人士荟萃之地，抗日救亡和统一战线的宣传、组织活动在这里比较活跃。

在浏阳县从政的经历

1937年秋冬之际，平、津、宁、沪的许多中共党员、各界爱国民主人士，以及政府官员，纷纷来到了长沙。一日，我和同

乡师友徐庆誉、张以藩诸人，同到蓉园，会见了省主席何键。他们之间，夙有交情。徐庆誉在和何键谈话中，表示愿回本县浏阳任县长。何当即允诺。徐对何介绍说我是北平的大学教授，也愿回浏阳一行，帮同接收县政。何笑着说：“你是在组织省政府了。”过了几天，徐果然被发表为浏阳县长。

徐组织县政府的工作班子，邀我同去。当时我本不愿去。经徐和其他朋友劝说，考虑到北平民国大学尚未开学，正有闲暇，又因为我一向是教政治学科的，只有一点书本知识，没有接触过实际政治工作，而县政府为基层政治组织，可以接触一些实际。因此，也就答应与他们一道作还乡之行。

徐在长沙物色的科长、秘书，都是一些老政界人员，很少新人物。当我们准备动身赴浏阳时，浏阳县商会驻省办事处，就出面设宴欢迎我们。原来那时浏阳县商会在县城发行了纸币，在国家“法币”贬值，物价上涨之际，地方货币在社会上流行弊端很多，急待取缔。所以他们想在事先拉拢县府官员以保留其发行的纸币的权利，从中牟利。这是我对旧官场第一个不好的印象，由此认识到当时的政治，基本上还是为地主、资本家服务的。

那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实现，八路军将在长沙设办事处，正是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候。因此，我向徐县长建议，到县后，首先要实行几项新的政策：一、洗刷县境内各处墙上不适时的旧标语和各种宣传品。二、释放政治犯，特别是“剿共”时期关押的共产党人。三、改革乡镇政权机构，改善人民生活，加强抗战宣传教育，发动全民抗战。徐漫然应诺。到县后，新县长会晤了当地的绅士，又照例办理了县府的各项交接手续，并未和原任县长见面。所谓交接，也是公文案卷的交接而已。这次县政府的改组，我看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省政府没有更新，县长的更换，不过是一个县的统治权利的转移，换汤不换药而已。原任县长毫无思想准备，悻悻而去。

前任移交下来的在押人犯，约近百人，罪名各异，有各种刑事犯，也有政治犯。当时县长徐庆誉、科长张明达、承审员赵子芬和我等商量决定同去视察一下监狱。我们到了那里，只见房屋狭窄而潮湿，环境恶劣不堪，数十人挤在一间房内。房间里无床铺桌椅，犯人都睡在铺于地下的木板上，一些人因生病在呻吟。监狱并无院落，也无劳动场所，和大城市的模范监狱相比太悬殊。犯人整天被锁在牢房里，并不定时放风，让他们呼吸新鲜空气。点名时，有几个大汉站起来慷慨陈词，意谓当此全面抗战时候，要求放他们出狱，参加对日作战，为国家效忠出力。有的诉说狱中非人的生活，要求改善。后来，我建议应趁此时，首先释放政治犯，并说明这是抗战时期实行国共合作、改革政治所必须做的。

于是次日先行提审二名女犯，由徐县长主审，承审员赵子芬陪审，我作记录。得知二人都是在1930年3月初工农红军第5军自井冈山重返湘鄂赣边区时参加革命的。她们年纪很轻，个子矮小瘦弱，是东乡古港、蒋埠一带的人，红军曾在古港歼灭过几个挨户团。又在蒋埠豆田村成立过县苏维埃政府，由谭启龙任主席。她们诉说：“那时我们年纪小，没有干什么重要工作，只帮红军做过饭、洗过衣，不料被捕坐了牢，至今7年还没有审讯过。请求立即释放。”审毕，主审员说：“如果释放你们，你们有什么要求和打算？”她们回答说：“打算回老家，但是县城里没有亲戚朋友，路费无着，要请政府解决。”审完后仍将二人收监，大家退堂协议，决定释放她们。事后，大家开玩笑说：“雷先生极力主张释放政治犯，现在遇到了困难问题，要募捐路费，请雷先生解囊相助吧。”

目击日机轰炸岳麓山湖大情形

“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北平、上海、南京文教界

的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纷纷来湘，其中有谭丕模、张天翼、翦伯赞、萧敬颂等。10月间，湖南老教育家、革命前辈徐特立，由延安来到长沙，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在共产党的影响下，人民抗日团体风起云涌地出现。随后就汇合组成了“湖南人民抗敌后援会”。一时，长沙成了抗战后方的一个重镇。也为敌人所侧目。

1938年4月10日，是星期天。此时正是绿柳才黄，“开花已满枝，流莺复在树”的时节。长沙市居民红男绿女，三五成群，联袂来岳麓山郊游。

那日，我和兄弟天壮偕子侄辈青年学生五、六人，乘小划子渡过湘江，沿江边小道，来到岳麓山。途中着警察制服者不少，料想是武警假日郊游。青年们一路歌唱嬉戏，不觉到了蔡锷墓。忽然听到远处群机飞翔声响。举头遥望，但见大批飞机，从东南方向飞来，三架为一小队，三小队成一大队，共三大队，计27架。我知道这是日本飞机来长沙肆虐。方庆身在麓山，幸免一场虚惊。渐见群机循湘江上空偏西向岳麓山飞来，我们这才警惕起来，散入林中，各谋藏身之计。我伏在一棵大树蔸下。飞机临顶之际，忽然轰隆之声大作，我以为是高射炮射击之声，那知正是日机轰炸湖大！约十多分钟后，轰炸声停息，群机向山后逸去，我探身而出，准备下山。不料敌机在左家垅清华学校一带投弹后，又调头飞来，再一次轰炸湖大，然后才缓缓飞去。我们下山后，但见湖大图书馆中弹着火燃烧。图书馆前面落一弹，把地面炸成直径约十米，深七八米的一口塘似的窟窿，山上昆涛亭附近亦落弹伤人，四面哭声盈耳。湖大校长皮宗石和一些职工正忙于救火，或救死扶伤。夕阳西下，我们循来时原路而归。同路见一青年，手持一炸弹残片，说是一弹落在身旁，幸而无恙，爬起来拾得弹片，携归作为纪念品。反之，和我们一道游山的陈姓青年，抵家后，忽然身感不适，彻夜不能

安眠，以后病势愈来愈重。

这是日机对湖大的第一次轰炸（学校西迁辰溪后，还9次遭受过轰炸，也是对长沙的第二次轰炸。第一次是1937年11月21日，敌机4架在小吴门附近投弹6枚，炸死炸伤群众300百余人。由于毫无防空设备，事先连警报也没有放，故死伤惨重。此次湖大学生黎圭、曾友松，工人陈玉清三人遇难。教职员和学生，受伤者数十人。居民及游人死伤的较多。图书馆被夷为平地，仅留四根水泥柱，直到近年才被拆除掉。藏书除事先搬出百余箱外，其余百分之九十以上，均付之一炬，共计焚毁64·000余册。科学馆炸毁三分之一，所藏仪器药品，损失殆尽。学生宿舍第1、第5两栋，中弹倒塌。

当被炸后，我在现场亲耳听到有人说：“图书馆藏有武器。”这是汉奸造谣，替侵略者张目！

事后湖大出版了纪念特刊。学生自治会发了快邮代电，国际通讯工作团，用英、法、德、日、俄诸文字，作了国际宣传报道，使世界人民愈益同情我们的抗战。

我在民国大学的同事、中文系教授刘善泽，在岳麓山前牌楼口，建有一栋楼房，轰炸事件发生后，朋友们纷纷向他问候。他是湘中著名诗人，赋《答友人》七律二首：

人外初无迹可逃，
劣营岩屋背江皋。
四时扫叶余黄卷，
两度开花到碧桃。
蓦地风轮空自转，
飞天劫火漫相遭。
寻知淮海金汤险，
来抵山栖结构牢。

（其二）

狼头随处起烽烟，
牝谷投虚幸得全。
变色客来谈虎市，
忘机吾过放鸢天。
心空能捍阴阳寇，
耳寂何忧霹雳弦。
稍喜园林春尚在，
东风翻作海棠颠。

盖先生多年奉佛，内心修养极深，炼得心空耳寂，故能赋出此诗，纪之作为佳话。

第二次长沙会战后在长沙东乡的见闻

第二次长沙会战后，日军自长沙、浏阳县境撤退后，我从宁乡民国大学出发，经由长沙东乡回浏阳西乡老家省视。这一带是敌人刚刚蹂躏过的地方，因此沿途见闻很多。首先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日军用的是潮水般的行军方式，分路朝着一个方向平行并进。他们并不一定沿大道而行，凡有捷径可走就在田中新辟道路，因此道旁田土中，到处被踏成光滑的蹊径。但见沿途到处是遗弃的樱花牌、梭标牌香烟盒，道旁房屋多被破坏烧毁。日军进入民家焚毁家具，专拣新的、珍贵的东西下手，捣毁最多的是神龛、漆柜、衣箱之类的东西。他们杀牛、宰猪，只割腿部之肉，其余弃去。破坏磁器、瓦器，如瓮缸之类，一律捅破其底部，使之成为废物。凡瓮瓶中盛有腌菜酱豉之类的食品，就在其中大小便。日军还常掳掠青少年，驱其奴役。据我所知，邻里青年被捕去的为数不少，其中一部分从此失踪，杳无音信，或死在路上，也有被送至日本致苦力的。我家同里张姓人家，先后有二子被捕未归。有些乘隙逃跑的，敌人故意佯为不觉，任其跑去，待跑去约百数十米后，便

开枪射击，借以练习枪法。偶尔有逃回家中的。但一般回家后即发生病症，终于不治而死！我有一侄，年仅12岁多，在浏阳普迹家中被掳，被带到江西庐山。此子机智过人，到处想方设法，如在沿途写字条，写粉笔字、放口信，通知其家人。家人追踪寻觅，幸而脱险归家。到家后即起病，经大力医治方得转危为安，实为不幸中之大幸。敌军掳掠人佚，强迫服役，对年轻体壮者反令挑轻担，而强迫年老体弱者挑重担。浏阳女诗人黎兑卿写有《灰墨琐痕》诗40首，记录了日军在浏阳奸淫掳掠的惨况。其第一首序诗云：“一生九死百无聊，铁骑长驱万马骄，莫怪近来诗思涩，吟魂惊散不曾招。”又一首云：“强迫高龄负重趋，头颅击破血模糊，百斤百岁双重压，倒曳横拖出里门。”写的便是掳佚的实况。至于强奸残害妇女的兽行，更是日军的家常便饭。多少妇女一听说日本人来了，即先毁妆、剃发、污面，或临深渊、悬崖而坐，准备临危时自尽，以免于受糟蹋。《灰墨琐痕》诗云：“门外喧呼吏捉人，室中惊避各潜身，把笺痴问池中水，可是阿侬毕命辰？”

日军经过的地方，如果不驻马休歇，则受害较轻。我家住在一个极偏僻的小山冲中，冲口路上平时很少有人通行。这次竟也有敌军经过，幸而没有停留，仅有一兵入室，取一而盆盛米去饲马，余无损失。而敌军停歇或宿营之处，附近必遭浩劫。当时政府执行消极抗战政策，始终不敢发动群众起来抗击敌人。我在路旁与居民谈话时，他们慨叹地说：“日本兵经过时，老百姓如果躲在道旁山林中，出而截击队尾，是最好的机会，他们一定无法招架。”无奈当权者，惧怕人民拿起武器，所以老百姓除偶有勇士自发地组织起来杀敌者外，一般都如一盘散沙，只有各自逃散求生。日军惯于利用汉奸，组织维持会，代为统治。他们要老百姓称军官为“太清”（大人），士兵为“西山”（先生）。老百姓不了解日语的原意，只好照样称呼，以

求饶恕。敌军有恃无恐，有时不免麻痹大意，把枪支架在门外，自己坐在屋里吃喝玩乐。老百姓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命财产，有时也奋起杀敌。这种事例是屡见不鲜的。浏阳普迹就发生过这样一件可歌可泣的壮举：一次，有一小队日军约近20人，牵着一匹白马，走在大道上巡逻，被一位姓黎的和一位名叫“庚驼子”的当地农民窥见，他们断定这队人马是孤军深入，来回巡逻，虚张声势，并无后援，可以智取，便约集村中30余人，准备好刀枪矛剑，乘敌军架枪门外，进入民家饮酒之际，突然包围民舍，燃放火炮，大呼杀敌。敌人仓皇跑出，门外勇士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有的敌人跳窗逃跑，也被事先站在窗外守候的人，斩杀殆尽。其中一人乘隙脱逃。群众恐其逃归报信，跟踪追寻，终于在浏阳河岸下，筒车水坝旁找出，当即将其击毙，全部斩草除根。这回人民的抗日游击战，获得彻底胜利，自己一无伤亡。此事轰动了普迹一带，真是大快人心！我这次回乡，一路经过的地方，耳闻目睹敌人暴行，真是怵目惊心。当时一心悬念着家中亲人的遭遇，没有多去打听消息，了解情况。古诗所谓“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正是我当时心情的写照。

日军陷长沙后的逃难生活

1944年5月，日军大举进攻湖南，6月8日长沙陷落，当时我和王覲、张天翼等，都在宁乡陶家湾民国大学教书，因为信息闭塞，对抗战形势，若明若暗。学校听说长沙紧急，仓卒停课疏散，以原从北平南下的教职员为基本队伍向安化山区转移。

这所私立大学以贫穷见称，这时发不出疏教费，而我们这些人都无积蓄，大家只有变卖衣服细软充作路费，附近居民连日争相购置，有个人对我说：“你身上这件衣，卖给我吧？”5月初，我们离开陶家湾，向西移动，路上难民不少，间有小

队军人，军容不整，一路掳夫抓人。我们亲见夫役中有不堪虐待投塘自尽者。途中遗弃死马、残物，比比皆是。我们一行赖学校送来的一点钱粮、物资为生，向安化山区行进，日行不过二三十里。我到达桥头河后，就离开了队伍，因为我有朋友在距桥头河不远的蓝田镇，我决计在他那里暂住。

到蓝田后，我去找妙高峰中学同乡杨序宣老师，他是一个诚挚朴质、能急人之难的人。一见之下，果然热诚待我，给与许多照顾。这时，我的大儿子也从衡山明德中学逃到了蓝田，被失学青年招训所收容。其时，我的生活自顾不暇，见面之下第一句话就说：“现在父子不能相保，只有各奔前途，自谋生存。”我们此刻都不知大难伊于胡底，而经济困难急如燃眉，瞻念前途，不免忧心如焚。幸有民大学生李天爵闻讯，送些钱来相济。生活始得粗安，青年学生无家可归者，群聚蓝田，人数愈来愈多，以致无处可以收容。不久发生痢疾传染，据说是日本人施放的病菌，患者越来越多。不久我也染上了，饮食医药都成问题，正所谓“屋漏又遭连夜雨”。初时由招训所一名公医治疗，但药物奇缺，只有一点止泻药，多服则便秘，反而增加痛苦；不得已改服泻药，每日泻数十次，渐感难于支持，只能卧床不起，用破布和草纸缠身，任其拉在身上。幸遇民大学生介绍大麓中学校医黄鹤年，用中药为我治疗，方才见效，连服数剂，即能起床。在此期间，致人倘若向蓝田进逼，我无行动能力，必死无疑。幸亏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我一病50余日始出房门，见野外农田已收获了。病后衣被皆破烂不堪，替我洗衣被的妇人说：“看了先生的被服都要下泪。”我的儿子则转徙流落到贵州去了。

我病渐愈，决计继续往西逃难。我有一刘姓学生，其父是一个旧军官，家住新化锡矿山。我事先和他通信，说明拟往他家避难，他回信同意。我雇一肩舆，略携行李并入门礼物，前

往锡矿山，当时我已囊空如洗，以为一到刘家，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行至上灯时分，到达锡矿山刘公馆，但见西式门楼颇为华丽。按电铃后，里面走出二人，后面随一狼犬。他们和我等三人隔着铁栅门谈话，并不开门相迎。他们说：“主人全家逃难他去，仅留我们看守房屋。”我们三人长途跋涉了一日已很疲倦，要求开门，让我们进去再说。进屋后，发现人去楼空，只有堆积的家具。留守人员说：“主人并没有给我们钱粮，晚饭无法招待，被帐一无所有，留宿更有困难。”我是旧家子弟出身，平生未曾遭此困厄，计不知所出。还是轿工有些见识，他们提醒我说：“看这情况，这里是没法子可想了，只有另设他法。”于是我们同到守屋人自家住处，先休息一下，再从长计议。但见他家房屋破烂，空无所有。附近几个青年学生，听说来了老师，一片好心，送茶送水。这时，我们找到一家小旅店。店中女掌柜正在念佛，连忙站起欢迎我们，问煮多少米的饭，吃什么菜？我答道：“多煮点饭，搞些肉。”并说明是到刘师长家作客的，因主人不在，故来投宿。老太婆口念“阿弥陀佛”不迭，表示同情。我们就在店里歇宿下来。

早起吃过饭，我决计继续前进到新化县投奔另一民大学生刘湘英家，要求轿工继续送我。他们两人经验丰富，认为如果又投不着亲友，困难愈增，不肯前往。我把所携准备馈赠刘家的糕点酒食之类，折算作为轿钱，勉强足数，打发二人去了。我和店主老太婆商议：所欠食宿费，暂时无法付给，愿将随身行李衣被，留在店中作抵押，等到新化手中活动后再来赎取。老太婆念声“阿弥陀佛”，说：“你只管去吧，不必抵押。我替你找一个挑夫，回来时带回欠款就是了。”我这才发现念佛者果然是个善心的人！她替我雇了一个14岁左右的小伙子。由锡矿山到新化县城约60余里，途中要吃一餐午饭，这又成了问题。我要小孩回家同家里要点午餐钱。小孩去了，回来对我说：

“妈妈说没有钱，我就带了一点饭菜来。”我这才壮了一点胆子。小孩挑着行李，随我直奔新化县城。我大病之后，尚未完全恢复，只有勉强迈着艰难的步伐赶路。到新化要经过两座高山，我奋力攀登，约在黄昏时分，挨到了县城刘家合伙开设的一家商店，而刘湘英却不在店里。我一时又心慌了，幸而片刻之后刘湘英来到，师生相见甚欢。翌日，他为我付给了小孩的工钱和欠旅店的食宿费，我就在他家暂住下来。

经此过度劳累之后，我的病有复发之势，尤其是双腿疼痛。卧床休息几日后，才渐恢复。刘湘英的妻子很贤慧，十分照顾我的生活。住了十多天，我顾念刘湘英是娘边之子，不便过久打扰，于是告辞，离此搭船赴资江河滨小镇朗塘另一学生刘楚凡家。刚刚上船，民大学生吴政本闻讯，赶到船上，邀我到他家作客，我欣然同意。他家住在新化东岭西塘，离城十余里，他家是个富裕的农户，雇有长工及牧童，果园、菜园、鱼池、柴山都有，出产自给有余。我本可在此多住一些日子，不幸腹泻之症复发，且又新添感冒。吴政本的父亲是一位看书郎中，热心替我开方检药，可是治疗并无效果，且有加剧之势。于是我又决心离去，按原定计划前往朗塘刘家。

刘楚凡兄弟二人合开离店，雇有店员帮工多人。我在他家住下了，此时病尚未痊愈，便写信向蓝田妙高峰中学黄鹤年医生求医，不久寄来药方，连服数剂，霍然而愈。

在这里我收到了辰溪湖南大学的聘书。原来我在妙高峰中学时，和湖大经济系主任、老友周德伟通过信。聘书是寄到妙高峰中学的，居然转到了朗塘。我即告别刘家前往辰溪。当离别时，刘楚凡送给我全套新制的衣帽鞋袜，师生感情笃厚，于此可见。

10月底，我抵达辰溪湖大，友人周德伟已离此赴重庆财政部工作去了，由法学院丁洪范院长接待。原来1938年冬，湖大建

临时校舍于县城对河龙头垴山上，校舍由一栋栋的小木房组成。教室、办公室、宿舍概用鱼鳞板钉成。教授宿舍窄狭不堪，仅容一桌、一小床。陶渊明《归去来辞》所谓“容膝易安”的情景，今日才体会到。工资一半为实物米一石，一半为法币。实物所值，超过法币部分。这和当时私立中学教员每月所得七八石米者，相去甚远。

当时湖大文科教授有李剑农、杨树达、黄子通，理科教授有杨卓新、何之泰、熊正理、唐艺青诸人，大家艰苦卓绝，守死教育岗位，培养人才，而不离去，令人钦佩！

这个时期，抗战形势开始好转。辰溪公路上已出现援华美军，他们乘坐吉普车驰骋道上。街上和附近乡村，也有美军出现。他们支床悬帐，露宿野外，有时到龙头垴湖大操场来打篮球，或上街购买水烟袋、旱烟袋、毛笔之类的东西，和老百姓尚能相安无事。

辰溪有日军俘虏，数十人囚于一室。我们去观看时，告以在欧洲德、意法西斯已无条件投降。他们惊讶，海阔不已，但仍有不肯低头认输之态。他们向我们乞讨香烟吸，一人抽吐，多人吸气。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步步侵略我国，占领我大部领土，我国几濒于亡。多年来，我朝思暮想，何日才能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恢复国土。今日居然亲眼看到日本无条件投降，此乃平生最大的快慰！当日辰溪天空群机飞翔，鞭炮喧天，军民尽情欢庆胜利！

湖大宣布10月在岳麓山原址复员开学。我乘机返回浏阳和家人团聚。路过长沙时，见一些日本俘虏，有在扫街道的，有在湘江岸边扛运器材的，都由美国军官指挥监督。多年来，老百姓习惯于叫日军军官做“太清”（大人），叫士兵做“西山”

（先生）。这时有老百姓故意揶揄他们说：“太清，你扫街呀！”日本人羞愧地答道：“没有法子呀！”可见中国老百姓一贯待人宽厚，有不念旧恶的胸怀。

我在南京失陷后的经历

徐述泗*

自从上海沦陷以后，敌人诱降不成，便疯狂向南京进攻。1937年12月8日南京攻防战开始，我连担任光华门外红毛山的防御。初战不利，撤守光华门，敌气球整天在天空侦察，我军阵地和一切防御设施，都被侦查，屡遭摧毁。晚上敌人坦克几度冲进城门洞，但都被我们用手榴弹炸毁。我连的伤亡也很大，第1排排长阵亡，第2排排长负伤，士兵伤亡更多。有一次开饭时，就被敌机炸死10余人，10日下午，我连换防中山门，并进行整补，接着又接防和平门。

敌人的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对我阵地的攻击异常猛烈。加上紫金山不守，敌人居高临下，对我连威胁极大。

12日午后5时左右，我连开始撤退，在中山路上只见人马如流水一般向挹江门涌去，我连队伍显得有点零乱。当退到挹江门时，城门半掩半开，四周枪声断续，城楼上督战队（36师）起初还不让退，大概是还未接到命令，后来制止不住也就听之任之了。这时夜色朦胧，死尸遍地，令人胆颤心惊。大江对岸的船只统统被汉奸焚毁，唯见火势熊熊，浓烟滚滚。江边无数的军民只好涉水而渡，下关江面宽达3公里，数九寒天，水流湍急，他们多被巨浪卷走，很少有达到彼岸的。一些不会涉水的人便扎了木排横渡，但到江心，多遭灭顶，只剩下一些木

*徐述泗系湖南澧县人，当时是南京守城部队某部的士兵。

板在江面飘荡。眼见我连过江的希望十分渺茫，但是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渴死江中，所以我和几个同事，还是解下绑腿，扎了一个木排，希望能够渡过江去。谁知人一上去木头就往下沉，无济于事，只好仍然爬上岸来。于是，我连决定再回城内去与敌人拚个死活。

我们回到挹江大门时，天已大亮，刚进城门就听见城楼上的36师一个同志在喊：“同志们，不要走，我们这里还有一挺重机枪。我们要与南京共存亡、同敌人拚个你死我活。”声如洪钟，慷慨激昂。我们每个人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立即参与了这个自愿组合的战斗行列。这时敌人已从其他城门大批进入城内，我们背腹受敌，弹尽援绝，如不采取紧急措施，就会全体覆没。我们决定分散隐蔽，以图东山再起。只是36师那位同志因掩护我们而壮烈牺牲了。

当我们转移到一个防空洞时，只见一队敌兵正沿城墙向挹江门走去，一个汉奸手持太阳旗走在敌兵前头，边走边喊道：“不要乱打枪了，缴枪不杀，皇军优待。”

眼看敌人已开始清扫战场，我们不能在防空洞中呆下去了。大家决定：先把武器埋起来，再找便衣化装，出去找点吃的喝的。我们把武器埋藏后，便跑到附近一家民房楼上，翻箱倒匣，各自选了一套便衣换上。另外又拿了几件换洗衣服和几床棉被，向鼓楼方向走去。

早在南京保卫战前夕，南京国际人士和万国红十字会征得中日双方同意，在市内划了一个难民区，约定中国军队不得在此设防，日军也不得向此进攻。这个难民区便成了我们临时避难的地方。当我们走进难民区，但见街上布满敌宪兵，街道两边架着自动步枪，凡是他们认为可疑的人，或者见了敌人而面色失常的人，统统抓起用汽车运到江东门外屠杀。当时我们找到一家理发店理了发，才逃避了敌人的视线，侥幸地过了这一关。

接着，我们在金陵大学农学院找了一间草房，摊开被子睡下。但惊魂未定，久久不能入睡。第二天，红十字会给我们每人发了一盒米饭。吃的、住的，算是暂时解决了。可是随时都有被敌人抓走的危险，所以我们总是胆颤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这时日军出了一个公告：凡是难民，不分男女老幼，都要到指定的地点进行登记，领取所谓“安居证”。如果一星期以后还未登记，一经查出，便要抓走。我们为了暂时的安全，便于次日清晨前去登记。登记处岗警林立，四周架有自动步枪。参加登记的人都集结在一块，先是一个日军军官唧唧咕咕讲了一通，很少人听得懂。接着有一个汉奸翻译道：“你们中间有被抽来当兵的，或是被拉夫来的，这些人都站出来，愿工作的给工作，要回家的给路费。”话音刚落，便有一批幼稚可怜的同胞站了出来，结果全被军用汽车运到江东门外枪杀了。没有站出去的人，五个一排挨次走到一张长条桌前去领“安居证”。桌旁坐有几个敌宪兵，问清你的姓名年龄以后，认为没有可疑之处，便发给你一个盖有“中岛”字样小图章的所谓“安居证”（中岛是敌军的一个师团长的名字），如果对你有怀疑，便会被抓走。

不几日，南京傀儡组织终于出现了。全市划分为七个区。我们被强迫到市大街小巷去收检尸体，然后埋在一个个大坑内。每个坑起码有百十来具。目睹同胞死后惨状，我内心十分悲痛。以后我便在城内炸油饼卖。

由于鬼子失踪的事件不断发生，以及市内副食品紧缺，当局让一些“危险份子”出去，也由城外运进一部份生活资料。因此，城门有时大开，只要你出示“安居证”，便可以进进出出。我们蛰居城中，好比井底之蛙，与外界完全隔绝，只想设法逃出去。不久，我们发现一处地方可以渡江逃离南京，便联络过去的一些同事，通过敌人的数道关卡，最后脱离了敌人的魔掌。算是劫后余生。

王亚南教授同我们一道上前线

李楷實*

抗战爆发时，我是一个热血青年，决心以身报国。1937年秋，我考入湖南军事干部学校。6个月后，被分配在长沙警备司令部当副官。当唐生明将军来接任长沙警备副司令时，我不想在后方工作，便和同学汤汉业去找刚从安徽前线回湖南整训的第73军军长王东原将军，要求上前线抗日。他满口答应下来，我便留在军部工作。1938年春节刚过，我们就跟着王军长从长沙出发去皖南。

我们这一行人中有三位新来军部的高级参议，他们是王亚南、胡伊默、张健甫。启程时，王教授和王军长坐小车，其他两位和我们坐大车。汽车行至江西高安附近，小车翻倒在路旁的沟里。车坏了，但人都没有受伤。大家虚惊一场后，都挤进我们的大车里继续赶路。

旅途中，我们和这三位高参都熟悉了，王教授还亲切地叫我“小李”。我们一路经南昌、景德镇、祁门、屯溪、黄山、太平，抵达泾县军部以后，王军长带着他们到第15师汪之斌部和第105师刘多荃部去巡视和演讲。王教授等人在各部队慷慨激昂地宣传抗战到底和抗战必胜的道理。接着，宣城、泾县前线的村村户户出现了大幅标语：“保卫祖国”，“保卫家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等等。后来全军上下又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105

*李楷實当时在长沙警备司令部当副官，后到第73军军部工作。

师的东北同胞每当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时，都流下了热泪。过去我对东北军没有接触过，不甚了解，错误地认为他们没有坚持守土抗战，就把我国的东北三省丢了。自从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发动“西安事变”，以兵谏促使蒋介石抗日后，才对他们有了较好的印象。特别是我这次到泾县以后，亲眼见到他们爱国热情高涨，体格魁伟，军风军纪整肃，一种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在我们军部驻地的村子里，许多小孩因战乱不能上学，王教授和王军长便叫杨浩祥和我当先生，给孩子们上课。经副官长杨敏先批准，我们买来了课本、纸张、笔墨，办起了一所临时小学。每天在丛林中上课，直到我们军部离开时，才移交给当地热情办学的人。

以后，我军调到湖北蕲春担任长江田家镇要塞守备，王亚南和胡伊默等就留在武汉。不久武汉会战开始，日军攻破马当要塞，直犯湖口，军部人员紧急乘火轮赶到湖口一带指挥作战。我军第77师在流斯桥给了进犯湖口之敌以重创。陈奇乳（湖南湘乡人）团长在此役中为国壮烈捐躯。

不久，王东原升任34军团长，派我担任军团部的机要收发工作。有一天下午，我接到王教授自重庆发来的信，信中说：如今浴血抗战已经一年多，以后是战是降，重庆政府还在十字路口徘徊。如果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向日本屈膝投降，必将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我急忙将此信送给王东原军团长、郑再新参谋长和武泉远参谋处长等人过目，并把信的内容告诉了我的几位好友。大家听了纷纷表示：“如果他们投降，我们上山当‘土匪’也要抗战到底。”过了不久，果然发生了汪精卫叛国投敌的事件。

西安行营被炸目击记

程 杰*

抗日战争前期，程潜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后调升西安行营主任。当时我担任行营警卫连连长兼便衣卫士排排长。1938年3月7日，行营被日机轰炸，程潜和僚属100余人被封闭在防空洞中，造成了严重伤亡。现将被炸经过及抢救情形叙述如下。

被 炸 经 过

行营机构有：办公厅、政治部、参谋、总务等8个处（警卫团除外），僚属共计900余人。办公厅、机要处、总务处随程潜驻在东厅门高级中学内，其他各处均设在别的街道上。东厅门高级中学，靠近西边城墙，占地面积相当大，在学校后院运动场下边筑有互相连接的东、西、北三个防空洞。每个洞口进出口，里面都修建了几个能坐人的房间，附近开有通气孔。洞深约15米，是中校防空联络参谋俞滨东负责修建的。防空洞的进出口，各有一个开在办公室内，专供程潜及高级幕僚使用。

自行营成立之日起，敌机经常飞来西安骚扰，不过平时只是侦察并未投弹，到3月7日，敌人好象已找到目标，于是进行轮番轰炸。当时我连在行营附近担任警卫任务。这天清晨我带着全连官兵，出城到西郊大雁塔附近训练，下午4时许回驻地用晚餐。正在开饭的时候，空袭警报发出了，我令士兵立即全副武装，接着就听到紧急警报，我即率领全连官兵向城墙脚下奔

*程杰当时任西安行营警卫连连长兼便衣卫士排排长。

跑，跑到离驻地约300米的一个花圃里散开卧倒。几分钟后，只见从东北方向飞来6架敌机，排成梯形，尾部放出白烟，到了行营上空，立即开始投弹，轰隆之声震耳欲聋，大部分炸弹炸中行营。当时浓烟滚滚，砖头瓦片向我们飞打过来。这6架敌机飞走后，紧接着又飞来了6架，在行营上空再次投弹轰炸。

抢救情形

等敌机远离后，我集合全连令各班清点人数，并无伤亡。正准备带队回驻地时，忽然行营传令兵跑来向我报告说：“行营的防空洞被炸垮了，程主任、晏参谋长等100余人均封闭在洞内出不来，请快去抢救。”我立即率队跑向行营，到了大门口，只见防空联络参谋俞滨东站在那里，面色苍白，垂头丧气，急切地对我说：“三个洞口均被炸封闭，洞里的人出不来，我是由气孔挣扎着爬出来的，现在洞上面已着火，气孔不能通风，要急速派兵运水灭火，将洞口挖开，并用风箱送气。”我照他的要求，派三个排分头负责，火速行动。这时警团卫的营长舒自治也带队赶到，他叫我连专门担任抢救程潜所在的西洞口的人员。这个洞口并未炸垮，而是被倒塌的房屋树木堵塞了，有一个小孔还能通气进去。我连官兵奋力挖掘，约十几分钟即将洞口挖开，我随即派4名士兵下去，但他们中途退回说：“头昏受不了。”于是我召集班长以上人员共同想办法，大家提议：将面巾浸湿掩住口鼻，向洞内泼水降温，再用风箱分阶梯向洞内输气。我考虑这办法可行，便吩咐照办。然后我带了4名士兵亲自下去，到洞底后，首先看见便衣卫士袁国光倒卧在地下，但还活着，稍前又见侍从副官傅振凯和程主任靠着洞壁倒在一起，侍从秘书罗容光也在旁边，他们4个人

都已昏迷不醒。但口中还有哼声。我再用手电向前照看，还有很多人躺在地上均已昏死。我急忙跑出洞口向大家喊道：“程主任他们都昏倒在洞内，赶紧下来抬他们出来，程主任就在洞口，要镇静，别忙乱。”于是大家鱼贯下洞，按顺序抬人，首先抬袁国光，接着抬傅振凯，抬程主任时，是由8个士兵面对面手扣手托着出来的。由于洞内泼了水，程主任满身泥土。抬出后已昏迷，不省人事，立即由王首之医生进行紧急抢救，我派便衣卫士和武装士兵现场警戒，除医护人员外，任何人不许接近。继程主任后抬出来的是罗容光，他还能爬动。再以后从洞深处抬出来的，就都死去了。

晏参谋长的夫人和其他许多家属均闻讯赶到现场，一看抬出的尽是死人，都放声大哭，状极悲惨，没多久，北洞口也被挖通，从里面抬出来的人，均昏迷不醒，但都没有死，一些家属才停止哭泣，各自寻找自己的亲人。晏参谋长也是从北洞内抬出来的，当即被抬到气孔下作临时急救，看情况没有什么危险。只有东洞口一时无法挖通，我派人由北洞进入东洞搜查，结果东洞中空无一人，大概是都跑到北边洞里来了。

抬出来的人，伤的被送往医院，死的停放在大礼堂，忙乱了两个钟头后，抢救工作才算告一段落。程潜躺在行军床上，被抬到没有被炸的会客厅里休息，晏参谋长在气孔下经过抢救，神志已渐清醒，按了晏夫人的要求，被送回私邸治疗。

程潜的夫人郭翼青和副参谋长张谞行的夫人，都到城郊躲警报去了，黄昏时才回行营，所以她们不知道被炸的情况。程夫人在大门口一见到我就问：“领公现在那里，情况怎么样？”我对她说：“稍微受惊，医生让他老人家安静休息，不要惊扰，暂时任何人都不能进见。”她坚持要去看看，我请示病床的值班人、办公厅主任熊守一，熊又叫我去问医生，然后经医生许可，才准程夫人进去探查。当时她克制住激动的心

情，轻轻地坐在行军床旁边，注目凝视着程主任。她同熊守一坐在程潜身旁，直到晚上10点钟左右，看到程潜鼾声大作，才放下心来。

张谞行副参谋长不幸闷死在洞中，尸体抬出后停放在大礼堂中。当时怕他的夫人受刺激太大，就对她说：“副参谋长受震，有点昏迷，医生正在治疗不能惊扰，请夫人先回去休息。”这样才把她送走。

行营被炸及人员伤亡情况，几小时后即电报重庆，并通知了陕西军政当局，随即陕西省主席蒋鼎文，中央军校第七分校主任胡宗南都到行营看望，并安慰了程潜夫人及死者家属。西安市当晚宣布戒严，封锁消息。住在行营外面的秘书长方叔章、军训处长唐俊德等人都来行营与办公厅主任熊守一洽商善后事宜。

程潜酣睡到午夜才醒，睁眼看见夫人郭翼青坐在旁边，便问郭说：“我这是住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让我睡在这里？”郭把行营被炸的情况说出后，他才明白。程潜这时神智已清楚，提出要回公馆去休息。但医生检查后，认为不能坐汽车，以免受震动，我们就用行军床把他抬回了公馆，第二天起床后，他的健康完全恢复了。他很关心晏参谋长及其他伤亡人员的情况，侍从副官王太光向他作了详细汇报。接着他问及李国良中将，我回答他说：“已经死了。”于是他就把李的情况告诉了我们：“此人在北伐时期就跟着我，昨天才由重庆飞抵西安，住在旅馆里，刚到行营来见我就遇到警报，想不到他进防空洞后竟遭惨祸。这个人很有才干，是来接任军训处长的，真是功业未成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接着又问侍从副官傅振凯及他的二女婿郑尔康如何。我说：“他二人神经受了震动，都送到医院去了。”后来这两个人终于因伤势过重，虽经治疗保住了生命，但都丧失了正常智力，一直由程潜养活着他们。

第二天中午，晏参谋长来看程主任，各自叙述了洞中受炸

的情景。程主任说：“我刚下到洞底，上面就中了弹，这时东边洞里的人向北边洞里跑，西洞由于东头的门未开，东洞的人才未能跑过来。一时洞内秩序非常紊乱，只听张副参谋长喊他们镇静，不要乱跑。稍停，里面就有人说闷得受不了，没多久一个一个地都昏倒在地，我幸亏在洞口，又过了一阵子，我身边的几个人也都倒下去了，搭帮救得快，时间稍长一点，恐怕也难保活命。”晏参谋长说：“我在北洞，气孔尚能进点气，所以北洞的人，都保住了生命。程连长派专人扶我到气孔下，又送了水给我喝，虽然出洞迟一点，却恢复得较快，现在已经完全正常了。”后来两人又谈到这次轰炸是不是有汉奸指示目标，不然为何炸弹投得这么准？

经调查，死的人都是躲在西洞的，因西洞靠近房屋，房屋被炸垮后倒在洞上面着了火，以至全洞内缺氧，里面的人被窒息而死。程主任幸亏在洞口，多少还能得到点空气。张谓行副参谋长就是因为呆在里面而死亡的。

善 后 处 理

在这次被炸事件中，共有64人死难，其中有：中将军国良、少将副参谋长张谓行、少将参谋处长赵翔之，其余都是校、尉级军官，校级比尉级多，因为西洞是供高级幕僚用的。死者一律安葬在西城外25公里处的翠华山烈士墓地，墓地前立有牌坊，横额是“为国捐躯”四个大字。两旁华表上有对联：“六十四人齐殒命，三月七日最伤心”。死难人员一律报军事委员会批准为“抗日死难烈士”。

受伤的人员多半都在北洞，救出后均送进医院，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大多数恢复了健康。也有伤势比较重的，虽保全了生命，但却留下后遗症，象少将军政处长陈又新、少将军运处长陈广忠，大脑都被震坏，虽经长期治疗，一直没有恢复正常。又

如上校机要秘书罗容光、中校秘书郑尔康、少校侍从副官傅振凯等都变成了白痴。还有震聋耳朵的，如军需马培荪等。对死难烈士家属，清准从优发给抚恤金及回家路费，派专人分别护送她们回原籍。对因被炸而造成精神失常人员，也都作了适当安置，妥善养了起来。如陈广忠、罗容光、傅振凯等湖南籍军官，就一直由程潜供养。解放后，程还把陈广忠、罗容光安排为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程主任、晏参谋长对于这次抢救有功的人员分别发了奖，对有特殊贡献的几个人还报军委会授了勋，我就被晋升为少校连长，并获得奖金300元。

湖广大捷的片断回忆

陈扬汉*

湖广大捷（湖广系指皖西之太湖，鄂东之广济），是抗日战争中的重要战役之一，是国共亲密合作和五、六战区各部队全体官兵以及当地群众协同作战取得的成果，也是中外著名的歼灭战之一。1938年6月至7月间，我第26集团军所辖之第41师，第48师和第199师等战斗部队，在合肥、舒城等地一再失利之后，日军第6师团从中央突破，沿潜（山）太（湖）公路向鄂东急进，企图一举攻克武汉，迫使蒋介石接受和谈，情况十分紧急。我五、六两战区（第六战区原称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是陈诚）立即采取措施，重新调整部署，决定以第18军、第31军、第48军、第50军、第84军、第87军（缺第199师）等部队，集中黄梅、广济、宿松、太湖一带占领阵地，以逸待劳，堵击入侵之敌。以第41师、第48师和第199师等部，进入霍山、岳西一带山区，沿潜太公路北线分区分段担任侧击，以迟滞敌人西进速度。

日军第6师团一支先遣部队（由一个步兵旅团，一个炮兵联队，一个骑兵大队组成）于6月下旬，侵入湖广地区，企图向武汉进犯。日军后续部队，尚停留在安庆一带。当时我在第89军（军长刘膺古、副军长陈孔达）第199师（师长罗树甲、副师长陈步云）任挺进支队长，参加了这次战役。

第199师辖573旅（旅长方既平），574旅（旅长刘爱山）由于5月间在合肥战役中受挫，6月又在与日争夺大蜀山中失

*陈扬汉是湖南人，当时任第89军第199师挺进支队队长。

利，接着攻舒城四昼夜未克。全师奉令转移到岳西靠近潜山一带山区担任侧击，并限期收复潜山县城，阻止敌军西进。我挺进支队受命夺取潜太公路上的战略要点——渡埠，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我当即选定暗冲和蒋家大山一带作为根据地，积极构筑纵深野战工事，俾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与此同时，挑选支队所属精干的营长、连长、排长、班长数十人组成侦察队，利用夜间，亲自率领深入渡埠四周，了解敌情和地形，侦知敌人经常昼出夜伏，白天三五成群，到处抢劫财物，强奸妇女，宰杀猪羊，杀人放火，无所不为。日军还无耻地编成了顺口溜：“走的高矮低（指山路），吃的牛肉鸡，烧的背时屋，杀的蠢东西。”到了夜晚，则龟缩在渡埠一隅，戒备森严，不许外人接近。

我侦察队经过几天的行动，并得到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获悉驻渡埠敌军只有步兵400至500人，主要是为西进敌军维持交通，提供军用物资和生活物资。日军以胜利者自居；因此驻渡埠敌人，除在各驻所和街口派有卫兵和哨兵外，只在南郊一座小山上和皖河公路大桥西岸，各驻有一支小部队，其他地方均无哨所哨兵。此外在渡埠附近各公路口、要点，均设有障碍物和陷井，我侦察队在搜索中多次遭到敌人有计划的夜间射击。

7月2日晚，我支队得到师长的指示，要我们进行夜袭，同时给我支队增派两个连，于当晚10时前达到蒋家大山，负责阵地守备。晚8时许，我令通讯排、工兵连于拂晓前破坏渡埠以东沿公路的电线和公路各险处工事，并扑灭敌人行进路标——烟火堆，其次命令进攻渡埠的各营、连，利用星光，疏散前进，以避开敌人设置的各种障碍物和夜间水平射击。在渡埠北端原指定的地点集中兵力火力，对敌采取突然袭击。并令机枪、迫击炮营用火力封锁西街口和公路大桥，我则率主力从东街口突入。随着一阵冲锋号，手榴弹、轻重机枪、迫击炮齐鸣，杀声

这天，敌人从睡梦中惊醒，慌忙应战，他们利用商店柜台、墙壁等作掩护，顽强抗拒，双方开展了一场惨烈的白刃战。我支队官兵是经过挑选的，绝大多数接受过三年以上军事训练，不但掌握了投弹技巧，同时对武术、刺枪术，均有一定基础，加上士气激昂，杀敌心切，大家都意识到是在为保卫祖国领土而战，有的身负重伤，犹坚持战斗，视死如归。经过反复搏斗，于3日拂晓攻克渡埠。残敌从稻田里向南郊溃退。是役缴获三八式步枪160余支、轻机枪11挺、汽油300余桶，其他军用物资和生活物资甚多。当时天已大明，我即令各部向东、西、南三方面警戒，对逃敌未予穷追。因为我深知敌人的后续部队正在陆陆续续日夜不停地向鄂东前进，恐遭不测。当即决定用缴获的汽油若干桶，烧毁皖河公路大桥，瞬息间火光冲天，一条长约100余米的木质大桥全被烧塌，这就将日军第6师团分割为东西两部分，造成侵入湖广之敌，首尾脱节，孤立无援，为湖广大捷创造了有利条件。

任务完成后，我即用电话报告师长，师长高兴地说：“很好，很好。”并要我立即转告全体官兵，每人奖给猪肉、鲜鱼各一斤，并勉以继续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相机扩大战果。还派距渡埠仅5公里之方既平旅长赶到渡埠，代表师长表示祝贺，他亲切地对我说：“你们为保卫大武汉创造了有利条件。”随即架设电台，用师长的名义向军长刘膺古、第26集团军总司令徐源泉、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及军事委员会某厅长，发出占领渡埠的捷报。这一胜利，鼓舞了各友军围歼侵入湖广一带敌人的斗志。后来李宗仁来电嘉奖我支队“敏勇果敢”，军事委员会还给我颁发了一枚“华胄荣誉奖章”和一张奖状。

当日上午8时半，敌侦察机一架，从安庆方向飞来，在渡埠上空绕了10多个圈子后即离去，10时许，敌战斗机两架、轰炸机一架，飞到渡埠上空反复侦察投弹，并用机枪扫射。由于支

队无高射炮，只得采取消极防空，我命令部队不得暴露目标，免遭损失。不料敌机越飞越低，越炸越凶，我才命令以轻重机枪组成对空火网，对准敌机射击。一架敌机被击中，机身失去平衡，歪斜地向东飞去了。

午后，日军驻高河埠的一支机械化部队，计有坦克11辆，大卡车70余辆，满载武装日军，沿潜太公路向渡埠急进，很远就听得到轰轰隆隆的车辆声，还可看见尘土高扬形成的一片黄色浓雾，同时枪炮（小钢炮）齐鸣，来势凶猛，向渡埠反扑。我即令各营、连向蒋家大山转移，以避其锋。由于皖河公路大桥已被我军破坏，敌人望河兴叹，无法前进，不但达不到支援窜入湖广敌人的目的，同时也失去了机动部队的优势。几十辆大卡车和十余辆坦克，被迫停在渡埠以东的公路上，如一条长龙。敌军侧面完全暴露在我军猛烈的炮火之下。

我支队主力利用蒋家大山既设阵地，对准停在公路上的敌车队猛击，敌伤亡惨重。敌人虽从安庆方面多次派来飞机助战，但它不敢低飞俯冲；从高河埠一带派来的榴弹炮队，停留在远距离外，盲目地向蒋家大山一线射击，也没有起到支援作用。一直战斗到黄昏，敌军才被迫后撤，我军以弱胜强，战果辉煌。接着我军再度占领渡埠。但伤亡的敌人，大多数被敌车队运走，并将贮存渡埠的物资运走了一部分。我支队虽有较坚固的工事掩护，亦伤亡官兵100余人，估计敌人伤亡人数要比我军多好几倍，因为在清扫战场时，发现敌人停在的公路上以及道旁水田里，到处都是血迹血水，对这一胜利，军民莫不称快。当晚11时，五战区来电话表扬了我们，并鼓励我们进一步狠狠地打击敌人。

7月4日，我师主力收复潜山，歼敌五、六百人。即以县城为据点，继续向太湖一带挺进，协同友军围歼日军第31旅团，经过反复突击与迂回战斗，取得较大的战果。各地友军先后收

复桐城、宿松。歼敌3,000余人。9月初，黄梅、广济亦相继克复，日军第36旅团被歼。从7月初至9月初共歼敌近万人，缴获步枪6,000余支，轻重机枪约300挺，榴弹炮50余门，其他军用物资和生活物资甚多。我支队坚守渡埠，多次利用夜间袭击敌人，曾一再粉碎企图偷渡皖河之敌。但日军总是每天凌晨、中午、夜幕、午夜分4次用大炮轰击我军阵地，每次最少二、三十发，有时多达百余发，连续几十天，从未间断过。开始我认为敌人是怕我军突然袭击，以后才知道敌人是在掩护海军从水路进攻我军。

湖广会战胜利后，我支队于9月初才随师部开赴鄂东归还87军建制。与此同时，日军海军从水路进攻，不久马当要塞失守，敌舰沿长江直逼九江，威胁武汉，以故湖广大捷之后，我军又陷入被动局面。

我所知道的抗战初期河内刺汪行动

王方南*

1938年12月18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借口去成都参加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会议，从重庆乘飞机出走，路经成都转飞昆明逃往河内，随即于29日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公开向日本投降。这份“艳电”，首先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香港特派员林柏生主办的香港《南华日报》上发表。据后来曾经担任过汪伪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郭秀峰说：“艳电”的文稿，当时是由陈公博、周佛海从河内带往香港交与林柏生的。

“艳电”发表后，汪精卫的投降活动便表面化了。蒋介石对此十分恼怒，当即命令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派人去河内行刺汪精卫，趁汪尚未离开河内去南京之前把他除掉。戴笠是以香港作为指挥中心进行这次暗杀的。当时我是军统局香港区的助理书记，对于这次暗杀行动的部署情况有所了解。

建立河内据点

戴笠是最能秉承“领袖”旨意和体念“领袖”苦心的，对蒋介石唯命是从。他接到命令后，深知事关重大，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完成任务。他首先考虑到的是，军统在河内虽然派有人员，但力量薄弱，担负不起刺汪重任，急需另调一批人员潜入河内，专门执行这项任务。因此必须在河内建立一个隐蔽的工作据点，以便进行活动。越南当时是法国的殖民地，国民党政

*王方南系湖南人，当时任军统局香港区助理书记，戴笠在香港指挥这次行动时，王即在场，对此事有所了解。

府在河内设有一个总领事馆，总领事是许念曾。军统原派有一个名叫方炳西的人在该领事馆担任秘书。据方炳西说，戴笠为了利用该领事馆作为掩护，曾秘密去过河内一次，他对许念曾封官许愿，极力拉拢，答应事成后给许以高官职位。许念曾为了升官发财，也乐于巴结戴笠而甘愿为蒋介石效力（后来许念曾被戴笠推荐一度出任驻埃及公使）。于是河内总领事馆便成为戴笠刺汪的活动据点。军统派往河内的人员得以在该领事馆的掩护下顺利开展活动，并且还设有电台，作为通讯联络的工具。

设立香港指挥中心

戴笠是一个非常机警的人。他感到这次奉命刺杀汪精卫，任务十分艰巨，必须谨慎从事，周密部署，不能有半点差错，而且非亲自出马不可。但他觉得如果自己前去河内部署指挥，逗留时间长了，容易引起外界的注意，一旦被人发觉，事情反易败露，有负使命。所以，他决定不去河内，而把指挥中心设在香港。这是因为：首先，香港是一个自由港，人员可以随时进出，不受签证等项手续的限制。其次，香港距离河内不远，乘坐海轮一个昼夜即可到达。而且香港交通四通八达，水路有船与上海、天津、广州、澳门以及海外各地通航。空运有班机直飞重庆，人员调遣，极为方便。再次，军统局在香港原已设有一个区，人员和其他方面的配备均较齐全，可以随时调用。由于香港具有上述这些有利条件，戴笠便于1939年1月中旬，从重庆秘密飞到香港，随行的有他的亲信秘书毛万里（系毛人凤的胞弟，浙江江山人，与戴笠是同乡）。

戴笠到港后，立即与军统局香港区区长王新衡研究刺汪办法，积极进行部署。他的行动十分秘密。戴笠在香港原置有洋房一幢，但他却不长住在此，而另在香港、九龙分别租有公寓轮流居住。香港区在高街6号设有一个联络站，我当时居住在

此。戴笠将秘书毛万里安排在此办公，也住在这里。戴笠还经常在此会见工作人员，多在夜间进行。香港区还设有电台两座，戴笠指定报务人员日夜值班，专门与河内、重庆保持通讯联系，并调有亲信译电员王绍谦、季若恂负责译电工作，所有往来文电，须由他亲自处理。这样，戴笠在香港的指挥中心就宣告组成了。以后，戴笠就住在香港亲自指挥部署刺汪行动，直到4月河内刺汪事件发生后才返回重庆。这年春节，他都是在香港和我们一起度过的。

人 员 调 遣

戴笠是靠暗杀起家的，在办理行动案件方面，有不少经验。但由于这次刺汪案件特别重要，非同寻常，戴笠格外郑重其事，决定挑选一批精干人员前往河内。军统局有一个素为戴笠所赏识的人叫余乐醒，一向主持训练工作，曾先后担任过军统局杭州、临澧等训练班的副主任。此人曾在法国勤工俭学，能讲法语，而且熟悉情报业务，通晓爆破术和毒药制造，人亦精明干练，办事负责。戴笠认为派余前去最为适合。于是在他离开重庆来香港之前，便决定派余乐醒带领几个行动人员先去河内进行侦察，伺机行动。

戴笠来到香港后，觉得在行动方面还须增派一些得力人员，以便集中力量采取行动，便把原军统局北平区区长陈恭澍调到香港，要他前去河内会同余乐醒直接指挥这次行动。听说陈以前曾参加过暗杀张敬尧的行动，在暗杀方面也有些经验。接着戴笠又把军统重庆武术训练班的教官唐英杰和跟随他多年的警卫员王鲁翘两人从重庆调来香港。唐从小学习武术，据说有飞檐走壁的功夫。王是军统局杭州训练班的学生，身强力壮，枪法很准，是戴笠亲自选中的贴身警卫。另外，戴笠还从上海调来两个行动人员。这些人员到达香港后，戴笠一一接见，勉励他们

竭力为“领袖”尽忠效命，事成之后，定予重用。随后，这批人便由陈恭澍率领从香港乘坐海轮前往河内。至此，军统派往河内的人员，先后已达10余人之多。

武 器 运 送

河内当时处在法国殖民主义统治之下，想在那里一下子找到一批枪支很不容易，即使用钱购买，一时也买不到很多，枪支问题不解决，刺汪就无从动手。唯一的办法只有从外面运送进来。当时抗战刚刚爆发，尽管敌人对我实行了封锁，但是滇越铁路因为是法国人经营的，尚能通行无阻，我国需要输入的物资和军火，可以通过这条国际通道经河内运到昆明；而我国需要输出的物资，也可以从昆明运往河内，销往海外（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法国在日本的压力下，曾一度将这条铁路关闭）。同时还有滇缅公路的运输，也是以昆明为起（终）点的。所以昆明便成为我国当时对外交通运输的枢纽和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在昆明设立了一个西南运输处，专门负责办理这方面的运输业务。

西南运输处在香港设有一个分支机构，其名称为交通部西南运输处香港监运科，由军统局控制。这个科的科长，由军统局香港区区长王新衡兼任，其内部主要负责人均为军统分子。它的任务是负责监运从香港进口的物资和军火，着重监运由滇越铁路经河内运到昆明的物资和军火。由于有这种业务上的便利，戴笠即要王新衡派人从香港运送一批手枪去河内，于是武器问题便解决了。这就为刺汪行动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刺汪未成却误杀曹仲鸣

人员和武器问题解决以后，已是1939年的3月了，戴笠唯恐汪精卫离开河内前往南京，内心十分焦急。他几次去电河

内，催促余乐醒、陈恭澍争取时间，早日动手。经过余、陈的精心策划和安排，最后决定于3月20日晚，对汪采取行动。这次行动，是由王鲁翹亲自执行的，他于事后从河内逃回香港，戴笠在高街6号接见了他，当时我也在旁，亲耳听到王鲁翹把这次行动经过向戴笠作了汇报，王所谈的大致如下。

余乐醒、陈恭澍等到达河内后，经过多方侦查，得知汪精卫住在哥伦路25号。他们便设法在汪的住宅对面租到一栋楼房，派人日夜观察汪寓动静，知道汪精卫住在2楼的一间房子里。他们原打算派人强行冲入汪寓行刺，但四周筑有围墙，而且法国还派有越南巡捕保护，门禁严紧，无法进入。他们又准备乘汪外出之际在马路上拦车阻击，而汪又深居简出，没有机会下手。最后由于时间紧迫，又没有别的良策，只好决定采取于夜间乘其不备越墙进去偷袭的办法。于是在3月20日晚上，由余乐醒、陈恭澍指定王鲁翹、唐英杰两人具体执行这次行动，王担任射手，唐负责掩护，另外还派有5至6个行动人员在汪宅墙外负责接应。上述人员便各自携带手枪，王、唐两人还带有电筒和利斧，分头行动。但当王、唐两人翻入墙内时，一只狼狗猛扑过来，他们当即开枪将狗击毙。有个巡捕发现后向他们开枪射击，但被王、唐强烈的火力压服。就在这个时候，王鲁翹在唐英杰的掩护下，疾步登上二楼，直奔汪精卫的卧室，只见房门紧闭，他便举起斧头将房门劈开一个洞口，用手电筒往房内一照，发现有一男人躲在床下，但看不见头部，以为这就是汪精卫，当即对准他连发3弹，将其打死。王见目的已经达到，便赶快下楼与唐英杰一同越墙逃出，安全返回，向余乐醒和陈恭澍报告情况，大家都以为大功告成了。但等到第二天早晨看报，才知道被打死的不是汪精卫，而是他的高级秘书曾仲鸣。

戴笠听完汇报后，虽然因这次没有杀死汪精卫而心有不甘，深感失望，但对王鲁翹等的忠勇行为还是表示赞赏，慰勉

有加。接着，陈恭澍和唐英杰也从河内逃到香港，余乐醒则仍返回重庆去了。在这次行动中，有几个行动人员被越南巡捕当场逮捕，由法方以扰乱社会治安罪为由判处有期徒刑8年，一直关押在河内监狱，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被释放回国。至于曾仲鸣的死因是这样的：那天恰巧曾的妻子方君璧从香港来到河内，汪精卫临时将原来住的那间大一点的房子让与曾仲鸣夫妇住，自己搬到另外一间房子里去了。这样曾仲鸣就成了替死鬼。

这次暗杀汪精卫的行动，自始至终都是戴笠亲自布置、亲自指挥的。他为此付出了不少的精力和代价，也对此抱有很大的希望。但是没有成功，他感到十分苦恼。据毛万里告诉我，戴笠之所以如此不安，是因为心存恐惧，生怕没有完成任务，蒋介石要处罚他。毛当时好言安慰他，劝他不要害怕，因为这并不是不执行命令，只不过是匆忙中一时的失误而已。后来戴笠去重庆复命时，蒋介石果然没有处分他，以后也照样信任他。

再度追刺汪精卫

汪精卫这次虽然侥幸免于一死，但精神上却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的投降活动也更加积极了。在日本人的怂恿和护送下，他于4月中旬从河内秘密乘船到了上海，与日本人策划筹备组织伪政府的事宜。戴笠得知这一消息后，又立即派遣陈恭澍率领王鲁翘和唐英杰跟踪赶往上海，继续行刺。

陈、王、唐到达上海后，曾与军统局上海区区长王天木共同研究行刺办法，并积极进行部署，伺机采取行动。但由于汪精卫住在租界内，防范十分严密，一时难以下手。而汪伪政权的筹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已逐步接近完成，汪精卫不久便从上海前往南京。因此，陈恭澍他们在上海刺杀汪精卫的计划也没有实现。汪去南京后，暗杀工作更加困难，戴笠便没有再派人前往行刺了。

攻克密支那

黄福安*

密支那是缅甸东北部的重要城市，位于伊洛瓦底江上游，是中印、滇缅公路必经之地，也是仰光至南木加铁路干线的重镇，与我国云南边陲的腾冲毗连。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又猖狂地向东南亚地区侵略扩张，气焰十分嚣张。1942年春，国民党当局应英方请求即派第5军军长杜聿明率第22师（师长廖耀湘）、第38师（师长孙立人）、第200师（师长戴安澜），与第6军和第66军组成远征军入缅配合英军作战。但由于配合失调，我军失利，随即转移到南渡地区之南劳展开激战，第200师师长戴安澜负伤后死亡，第38师副师长齐学启被俘后在仰光遇害。

日军占领密支那后，设立了南北两个飞机场，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和防线，企图死守。

飞印入缅

1943年4月，我新1军第50师由云南空运到印度汀江机场，换乘卡车到离机场40英里处的一个无人区扎营，停留了约10天，领取了武器和军用品，如地图、望远镜、指南针（官兵每人一个）等。团长以上军官，还学习了陆空联络、步炮协同、森林作战等；士兵则练习操作自动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小炮等。

我们行军通过了野人山，这是原始森林，杳无人烟，也无去路，我第150团派第2营为前卫，第4连为尖兵连（当时我任

*黄福安系湖南人，当时任新1军第50师第150团营长。

连长），搜索开路。我连在森林里仅靠地图和指北针，朝着敌人所在的方向前进，森林里的草木比人还高，拌脚刺手，行走十分艰难，一天难走15公里。三天后，携带的口粮吃完了，就靠空投食品维生，还为此开辟了投掷场。当时英军负责攻打孟拱，走另一条路，美军独立团则尾随我们一步步地前进。我们在野人山的林海里走了20多天，没见到一个当地居民，更没见到过一间房屋，只偶然碰到一些野兽，如虎、豹、豺狼、猴、野马、大象、巨蟒等。

首战告捷

当我们到达密支那附近时，决定给敌人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团长黄春城（邵阳人，黄埔六期毕业）下达了对敌作战命令：第3营攻北飞机场（美军独立团攻南飞机场），第2营（营长谭云生，湘乡人，中央军校武冈二分校军官队三期毕业），攻火车站，由我连具体承担。通过侦察地形，我要求营迫击炮排进入阵地，在火力掩护下，我即命第1排为左翼，第2排为右翼，向敌袭击。第3排为预备队。我率小枪班、指挥班也迅即赶往前沿阵地。战斗开始后，敌人依靠坚固的防御工事构成的严密火力向我反击，不到30分钟，第1排排长侯占云阵亡。我即命令排附傅运生（益阳人）代理，继续攻击前进。距火车站半公里时，第2排排长匡运华又不幸阵亡。我便命令第4班班长何任成升代，继续战斗，并即电话请求师山炮部队和团迫击炮连以猛烈火力向火车站及密城压制。同时以我连重迫击炮猛烈轰击敌阵地，这样一来，战斗进展才加快。这时，我预备队一举攻入敌阵地，占领了火车站，歼灭了残敌，于是，首战告捷。随着我第3营也攻下了北飞机场，美军攻南飞机场时，日军不战而退。火车站被我军攻占后，我连的攻击任务已经完成。黄昏时，营长派第5连来接防。我连官兵早晨上火线时，共有

148名，现在已只剩下48人了，官佐只我（也负轻伤）和特务长仅存。

密城激战

我连撤下后，即为营预备队，在伊洛瓦底江畔，对密城严密监视。第3营攻下北飞机场，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撤下后作为团预备队。当晚敌人因白天失败，对我团进行了两次反扑，双方发生了激烈战斗。翌日拂晓，敌约两个中队的兵力，向我营占领的阵地反扑，但被我优势兵力打退。这时我第2营正面也出现敌人，团长随即命令我营攻击，第5连即进入战斗，一小时后，连长匡邦英（双峰县人）阵亡，两个排长也负了重伤，全连伤亡很大。营长即命该连排长黄景初代理，继续战斗。这时，我从望远镜中发现敌人利用屋顶和大树架设机枪，企图阻击我营前进。我即选出狙击手5名参战，并火速通知第5连并报告营长，建议全营成立狙击手组，每人配望远镜，对当面屋顶、树上严密搜索，各个击破妨碍我们前进的目标。可是第1营攻击任务尚未完成，团长就命令我第2营第5连趁黄昏时撤下火线，全团遂停止攻击。于是在原地构筑工事，与敌形成对峙局面。为此团长黄春城被撤职，由副团长钟合高（湘乡人，黄埔六期毕业）升任。翌晨，日军由仰光派来战斗机3架向我占领的北飞机场投弹、扫射，炸毁山炮两门和部份跑道（我军随即修复）。这天，新接任的钟团长命令我们攻击前进，但即将到达指定地点时，又命令我们撤回，结果一些阵地得而复失。此事后被师部指挥所和盟军前进指挥部知道，第50师师长潘裕昆即将钟免了职，任命英勇善战的我第2营营长谭云生为第150团团长，我也递升为第2营营长。我团奉命继续向密支那城攻击。

血战缅人寺

密支那的守敌，原是日军精锐的坂垣师团，以后该师团虽调防，但兵力却增加了许多。我军攻击部队原先只有第150团，后增加了新1军第30师第90团。我们凭借装备优势，稳扎稳打地攻击前进，战斗进展较慢。当我营攻击到缅人寺附近时，我命令各连占领该寺。缅人寺是密城的制高点，寺院雄巍，菩萨都用赤金制成，我们要攻取密城，必先攻下缅人寺。在进攻中，寺内日军组织反抗，但全部被歼灭，遗尸200余具。

我营接着前进，逐渐进攻到中印公路与铁路的交汇处，距密城已只2公里了，于是对敌军缩小包围圈。日军发觉后，开始抵抗，战况一时很紧张，团、营都没有预备队了。第3营营长是刚从师部调来的参谋，复姓欧阳（耒阳人），在当天攻击中就阵亡了。第1营营长李洪清（湘乡人）夜间爬在战壕上面用日语对日军劝降，不幸被敌人击中，饮弹身亡。盟军总部派来的陆军联络官、住在团部的卡乐孔上校，因他儿子在日本作战时牺牲，他来我营阵地时大喊大骂，也被敌机枪射死。黎明，潘师长和谭团长都亲来我营阵地视察。命我派一个连，攻击缅人寺前缘的交叉马路口，我即命令第5连在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的火力掩护下，开始攻击，越打越激烈，敌人凭借用钢筋水泥构筑的坚固地堡，顽固抵抗，我们就用重迫击炮猛烈轰击，在摧毁敌人阵地之后，我第5连即冲入敌阵，残敌约百余，拼死顽抗，双方展开了肉搏战。数分钟后，我第5连连长黄景初（慈利人）阵亡，全连遂撤下火线，清点人数时已伤亡20余人，但敌伤亡更重，接着我营又连攻了七次，最后终于胜利攻克。缅人寺一带遂无战事。

摧毁敌地堡

过了几天，新6军第14师第42团的一个营来支援我们，归

潘师长指挥，潘师长即命其向敌攻击，并电话通知我将敌情详细向该营介绍。可是，这个营长很骄傲，瞧不起我这个当兵出身的，根本不理睬我，结果该营刚出击不到一个小时，三个连长就有两个负伤、一个阵亡，副营长也牺牲了，营长自己也负了重伤。全营上阵时400多人，下来只剩100余人了。我们只好利用工事，步步为营地向敌推进，最后，敌我接触距离仅隔一条马路了，敌人投过来的手榴弹，我们的士兵有时还可捡起来再扔过去。我将此情况报告师长。翌日即奉电令，要我营做好空中联络准备，我军飞机将对敌阵地进行轰炸。但经过三天轮番轰炸，敌阵地还是没有被全部摧毁，我们又用山炮和重迫击炮轰击。由于天上、地上的火力互相配合，敌人的三个坚固的碉堡终于被彻底摧毁，守敌也悉数被歼。这就为最后攻克密支那奠定了基础。

攻 克 密 城

团长和师长得知胜利消息后，即下令夺取密城，这时密城敌人的力量已十分薄弱。团长命令我营组织渗透（尖刀）部队，选出50名勇敢的士兵，每人端一挺冲锋枪、拿四个手榴弹，由第4连连长李握（桃江人）率领，沿伊洛瓦底江边缘一段凹地，迂回于城北，潜到敌人心脏指挥中心附近。拂晓前，在我猛烈炮火掩护下，渗透部队顺利到达城北，迅速攻占了华侨街，旋遇100余敌人反扑，我渗透部队一部分即由北向南攻击，在南北夹击下，10余分钟后，大部分敌人被击毙，少数逃跑，还活捉了13人，也多是负了伤的。于是我营部队开始占领全城。入城后，但见断壁残垣；连土也被炸翻了三尺，地上到处都是人马尸体、烂炮断枪、破烂军服等。在清扫战场中，还清理出大佐军刀一把、少佐军刀两把、大尉军刀三把、中少尉军刀各三把。据俘虏口供，在我强大炮火攻击下，密城

守敌几千人大多被炸死，只有少数逃跑了。

在孟拱整训

密支那被攻下后，我营即开往孟拱整训，补充了一批从国内空运来的青年。新1军军长郑洞国（石门人，黄埔一期毕业）指定我营演习攻克密支那实战经过。新6军军长廖耀湘率第22师和第14师营长以上的指挥官前来观摩，给予我营很大的荣誉和鼓励，我们也参观学习了第22师的训练。

不久，第50师师长潘裕昆（醴陵人，黄埔四期毕业）以我英勇善战，任命我为师加强营营长，除本营兵力外，再配以一个山炮连、一个辎重兵连、一个迫击炮连，还将第1营的第3连和无线电班、通信排等，拨归我营，兵力总计1,400余人。接着我营便接受了攻击南劳的任务。

在南劳痛歼日军

南劳是缅甸南渡地区的一个小村庄，只有五、六户人家，当时搜索无敌情，其右侧是丘陵地区，途中有座山是我军必经之地，在半山腰处，即与敌军接上了火，我命令第4连连长李握从右翼迂回敌后，协助第5连正面攻击。迫击炮进入阵地后，以猛烈炮火对敌阵轰击，不到15分钟，敌人便被打退，我们乘胜追击。不久，又遇阻敌，冲出100余人向我反扑，但都经我营击退。战罢，我命第6连开辟投掷场，以待空运补充粮食和弹药。但发现左侧有个制高点，我即派配属的第3连迅速占领，以利空投。该连刚出发，制高点上的敌人，便以猛烈火力作掩护俯冲下来。但该连官兵奋勇攻击，毫不退缩，在我炮火配合下，只用了20分钟，就攻下了这个山头，缴获敌重机枪1挺，步枪10余枝和一批弹药等，敌死亡20余人。

翌日，接师部命令，要我营向正面之敌进攻。但因遍山楠

竹，地形十分复杂，敌又居高临下，顽固抵抗，我营连攻三次无效。我要美军联络官（随营派遣）用报话机要求派飞机援助，10分钟后就由密支那飞来战斗机6架，先3架对敌阵地投掷汽油弹，随后3架投掷燃烧弹，顿时遍山起火，烈焰熊熊，我营即乘势冲上敌阵地，将尚未炸死的敌人全部歼灭。至此，我营在缅甸的对日作战任务基本完成，不久即开往腊戍整训。

我在印缅参加对日作战的回忆

胡英杰*

1942年3月1日，我自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8期毕业，重返部队，编在中国远征军第1军新30师步兵第88团任代理团长，进入缅甸作战。当时，抗战已到了最艰苦时期，全国港口尽失，盟国援助物资全赖由印度汀江经喜马拉雅山高峰空运昆明。因此，我军只得找野果充饥，砍下芭蕉树拧出汁液解渴，部队即以此度日。

在山中几经摸索，行行复行行，我团正待与喀钦的部队接头，忽遇日军114联队的阻击，我即令童庆年的第3营作断后攻击。其他部队按原计划超越前进，向密支那重要据点大营房进攻。当攻抵离大营房约30米的一处高地附近，正拟继续前进以便一举攻占敌军基地时，友军第150团于车站附近受挫，美军指挥官麦利将军突然令我团转至适当地点采取守势，暂不前进。我表示异议，说：“我中国军队奉命抗日，只许前进，决不后退。”麦利将军才未坚持。

在以后79天的雨季阵地战中，我团借小高地作掩护，稳扎稳打，避免冒进，以求减少牺牲，每天前进多则100米至200米，少则几十米，有时甚至寸步不前。即使这样，还是有20名军官、500余名士兵牺牲。

1943年，中国驻印军在印度兰姆加成立总指挥部，总指挥由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兼任，美军白特诺将军任参

*胡英杰系湖南衡阳人，当时在中国远征军第1军新编第30师第88团代理团长。现居海外。

谋长，我军温鸣剑将军任副参谋长。

为确保中印缅公路畅通，盟军以我88团为主干，与第150团和喀钦部队的一个团，组成中美混合奇袭支队，由麦利将军指挥。我88团作为先头部队，从孟关出发经瓦鲁班入山，途经8,000英尺高的野人山原始森林，完全无路可循，又不见天日，只有靠当地人引路和工兵开路，才能前进。

我们部队的给养除了每人携带3天的干粮之外，其余食品均赖空投。原始森林既密且高，飞机在上空难见目标，即使预测到目标，我们在密茂的森林下面，仍无法取得空投的物资。官兵所携带的干粮多系牛肉、巧克力、口香糖、饼干之类，大家都不愿意吃，只有在饥饿难忍时才不得不吃一点。当时部队中负过伤的官兵约有830多人，很多官兵负过两、三次伤，其中100多人负伤达四、五次之多，空运到印度治疗后，立即又归队参加战斗。当时我们支队除了极少数勤务人员外，都是战斗人员，个个都能英勇作战。幸亏我军炮兵占优势，又掌握了制空权，致使敌机无法活动；并且部队补给也有保证，因此能持续作战，达到歼敌的目的。这次战役正值缅北雨季，官兵昼夜在泥泞地上行军、枪林弹雨中战斗，时间之长，战况之惨，伤亡之重，恐怕在世界战史上也是罕见的。

密支那之役后，我团又经整训、改编，再度踏上征板。当时，中印公路能迅速通车，应归功于卡的克战役的胜利。这是印缅战场关键的一次战役。

战前，日军将中缅边境的部队集结于畹町、芒市、南坎、腊戌等地区，企图进行殊死战斗，以阻挠中国驻印军与国内军队会师，一举击溃我军，从而恢复两军的对峙局面。文小山将军（副军长）找我研究了敌我形势后，命令我亲往敌我对峙的左翼地带观察地形。我将观察结果通过唐浩公将军（师长）报告了孙立人军长。孙军长遂命令我率第88团的第1营（营长黄

云先）、第2营（营长刘顺齐），以及师炮兵第3连（连长罗学万）第1排，另配属工兵、通信、运输、卫生等人员；组成特种部队，开赴前线。为避免日军居高临下察觉我军行动，我军行进时严禁火花和喧哗，休息时（在道路两旁的森林里）也必须保持肃静。拂晓时分，我命令以排为单位，隔若干时间、距离，分段跃进，不让敌人觉察我军的实力。然后命令各战斗单位进入攻击准备位置。

翌日拂晓，我发出出击命令，首先集中炮兵火力向敌阵地轰击，然后派出步兵，四、五人为一组，带着六〇迫击炮、轻机枪、冲锋枪、手榴弹，攻击前进，仅数小时即占领指定目标的小高地，竟无一人伤亡。同时，又以自动火器封锁通向南坎、畹町方面中印公路上的各个要点，阻止日军循原路撤退，若不是当时第89团所属第7连封锁右翼另一条小路失利，致使一部分日军逃逸出去，我军战果可能更大一些。

这一战役取得胜利消息传开，中外欢呼，其中尤以利多、兰姆加两地最为轰动。各国记者竞相来我团采访。我们分别以日本军官指挥刀、太阳旗、“武运长久”的背带、战地照片等战利品相赠。据说在利多的日本军刀卖到300到400美元一把，太阳旗也要值200美元，都是买去做纪念品的。我在成都、重庆、昆明、利多、加尔各答、兰姆加等地的朋友纷纷来电祝贺。这次战役以后，我第88团迅速由工兵架桥渡过瑞丽桥，协同本师第90团作战，很快占领了南坎东南各山头的重要据点。进入南坎后，我团又将史速威（中印）公路打道，与国内滇西的宋希濂、黄杰部队会师于芒市。没有多久，我驻印军新1军军长孙立人将军与远征军总司令卫立煌将军，又召集部分滇西和印、缅部队在芒市进行大会师。

回忆反攻滇缅的龙陵之战

王卓超*

1944年夏，我驻滇远征军，为了配合驻印度的中国军队打通中印公路，进行了一次反攻滇缅的战斗。当时我任宋希濂将军的第11集团军第71军第87师第259团副团长，参加了这次战役。

五 月 渡 泸

反攻前，第71军驻在保山，担任怒江东岸防务。第259团则担负大黑渡、火石地等渡口的守备任务。这时，日军战场遍及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兵力分散不足，在滇缅战场取守势。他们仅扼守惠通桥西岸的松山，阻止我军利用公路渡江，余者死守龙陵、腾冲等据点以待时机。

“五月渡泸，深入不毛”。我军恰于这个季节，步诸葛亮当年远征之路，进入了崇山峻岭、人烟稀少、多民族杂居（有的还过着原始生活）的滇西边陲。沿途我们看到诸葛亮题词的“哑泉”等古迹，深受鼓舞。

怒江古称泸水，奔腾咆哮在横断山脉的峡谷中。两岸悬崖峭壁，几百里长的江面只有几个渡口可以摆渡，仅有几只木船，需要有经验的老艄公掌舵才能渡江。第87师主力在大黑渡渡江，我259团为先头团。开始渡江时，困难重重，十分缓慢，尔后运来一些橡皮艇才解决问题，但仍有少数橡皮艇被冲走撞翻。

首 攻 龙 陵

龙陵是滇西一个小县城，四面环山，滇缅公路（中印公路

*王卓超系湖南人，当时任第71军第87师第259团副团长。

之一段）沿县城南侧通至芒市。第71军渡江后，以一部配合友军攻松山，第87师则主攻龙陵。当时驻龙陵的日军约1,000余人，配有山炮两门，龟缩在县城边缘和后山上。首攻龙陵，259团在公路右侧，261团在公路左侧，齐头并进。论兵力、装备（当时71军已装美械），我均优于敌人，但日军以武士道精神，凭永久工事死守，我军几经冲击均未奏效。我曾到宝塔山第2营督战，该营一个排英勇冲进城区，全部壮烈牺牲了。这时已近黄昏，左翼团也无进展，均奉命在原地待命。以后几天，又进行多次攻击，也未获战果。这时，美军顾问团（当时第71军团以上均有美军顾问团或联络组）建议，待天气放晴，调美空军助战，以减少伤亡，我87师即撤离前沿阵地待命。

首攻龙陵，第259团第2营营长黎烈成和第3营营长廖某均负伤，连、排长及士兵伤亡三分之一；第261团团长虞某、副团长李振邦也负伤，战斗之激烈可想而知。

日 军 反 击

在87师待命攻击时，日军分由腾冲、芒市各抽掉一部分兵力（约1,000余人）进行反击，企图解除龙陵的困境，相机打通龙陵、松山之间的交通线。这时我师前线部队的位置是：第259团在公路左侧，第260团在公路右侧，并筑有野战工事，十分坚固。但部队连日攻击有些疲惫，又有些轻敌，疏于警戒，敌人采取突然袭击、两翼迂回的战术，对我进攻，开始时我军有些慌乱，放弃了部分阵地。这时，我适在第1营指挥所的草棚里，该营也遭到左侧背敌人的突然袭击，传令兵、通讯兵一死一伤，唯我幸免。我当即严令第1营坚守阵地，并派营预备队堵击侧背敌人，同时，以电话报告团长聂率淮（湘西人）、师长张绍勋，建议堵住正面公路之敌；并以师预备队进行反迂回，围歼进攻的日军。但另两个团的主官均欠镇静，争先撤离

团指挥所，一时少数日军沿公路逼近我军师部。这时师长张绍勋对敌情判断失误，不知日军已无大规模反击的能力，既未严令两团长坚守阵地，积极部署反击，反而向军长钟彬、总司令宋希濂告急求退，张的电话恰为副军长陈明仁将军听到，陈严斥张绍勋：如撤退，即军法从事，张绍勋于愧惧中举枪自杀（子弹贯通肺部未死）。张自杀之际，我仍在第1营，并指挥团预备队第3营奋力堵击，局势渐得控制。右翼第260团在第261团增援后也已稳住，一小时后，日军便逃回龙陵。

攻克龙陵

在敌人反攻后的一段时期里，部队携带的粮食已用尽，而松山尚未攻下，公路不通，阴雨连绵，空投又不便，部队开始吃稀饭、苦荞，以后又吃芭蕉野果，有时整天饿着，生活十分艰苦，但士气依然旺盛；与此同时，团的美军联络组的官兵（10余人），不吃当地的水，要空军优先空投食用水和罐头、香烟等，否则就撤走，他们还任意丢弃行李装备，有的连钢盔、卡宾枪也不要了。相比之下，一美军少校感动地对我说：“中国士兵顶好！”

8月初雨季已过，我空军已能出动，第87师奉命再攻龙陵。这时驻龙陵日军已把防区扩展，占领了附近高地，前沿阵地与我军对峙。我第259团为师的左翼攻击团，在开始攻击敌前沿阵地时，便遭到日军猛烈的抵抗。

据守前沿阵地的日军，仅为一个加强小队，我以一营的兵力攻击一天，未能奏效。第二天盟军空军助战，又以密集炮火轮番轰击，日军伤亡殆尽，我军才攻上去。最后只剩一个负伤日军曹长，还顽固抵抗。被我生俘后，他挣扎着跪在地上，面向东北方向连连叩头，口中还念念有词，事后知道他是向天皇谢罪。当我审问他时，他拒不回答并要求把他枪毙。可见当

时日军中武士道之毒是何等之深。

我259团攻占敌前沿阵地后，又与日军逐山争夺近半月后，才逼近龙陵县城，但又遭到日军更猛烈的阻击，这是我师一次极为壮烈的攻坚战。

日军约有两个分队，死守龙陵南侧的高地，其山势险要，不易攻取。我259团和第261团（当时每团人数均不到一半）在空军的助战下，轮番攻击几天均无进展。师部立即决定，组织100名决死队员于黄昏后进行突袭，并以我259团第1营为续攻部队。攻击前，继任师长黄炎、副师长谢淑周（均系湖南人）和我的黄埔同期同队同乡好友、师参谋长王多年（现任台湾国民党“总统府”顾问）均临第一线督战。我也进至第1营攻击准备位置。这时天色已暗，但我攻击部队尚未吃上晚饭。有位士兵对我说：“副团长，让我们当个饱死鬼吧！”我马上命令团部后勤人员想方设法做一顿饭送上来给他们吃了。

不多久，前方传来捷报，决死队突击成功了，他们冲进敌人的阵地后，与敌展开了英勇的肉搏战。我第1营迅速紧跟上去，经半夜的短兵相接的激战，全歼敌守军，攻占了日军在龙陵的最后一个高山阵地。这次战斗，决死队员全部壮烈牺牲。我第1营也伤亡惨重。决死队长是黄埔六期毕业的，当时也很不得志，只是师部的中校附员，但当祖国需要时，他不计一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令人敬佩。遗憾的是，我只记得他是湖南人，姓名却记不起了。

接着，我259团乘胜进攻龙陵县城，在1平方多公里的城区内，又与日军展开逐屋争夺的巷战，第1营营长陈秉利（山东人）和副营长潭良（广西人）均壮烈殉国。残敌挣扎半月后逃往芒市，沦陷了两年多的龙陵又重见天日。

这次战斗后，我和继任的261团团长张有琪各获一枚一级云麾勋章。

湖南抗战大事记

钟启河

1937年

7月

- 9日 长沙报纸以大量篇幅报道卢沟桥事变，并散发号外，呼吁抗御外侮。群众闻悉，奔走相告，义愤填膺。随后，长沙各校学生组织大批募捐团，募捐物资，慰劳前线。
- △ 长沙铁路工人成立“慰劳前方将士办事处”，通电粤汉铁路工人捐薪援助。一时慰勉29军将士，援助抗日前线的活动遍及各界。
- 上旬 省主席何键，国民党中央驻湘特派员宋群，教育厅长朱经农，财政厅长尹任先，省政府委员黄士衡、曹典球等先后赴庐山，参加蒋介石召集的谈话会。中旬返长。
- 15日 省政府以“扰乱视听，殊有违中央镇静人心之至意”，迫令长沙各报不得散发日军进逼华北的号外；以“捐款慰劳前方将士，应由政府拟定整个计划”，不准学生和各界进行募捐活动。
- 18日 湖南省民众国术俱乐部、省民众常识指导委员会等9团体在又一村国术俱乐部成立“长沙抗敌后援会”。
- 中旬 省党部、省国医公会、长沙市学生援助前方将士委员会、省民众国术俱乐部、省农会、长沙邮务工会、省民众常识指导会等团体及第14师师长霍揆彰以下全体官兵，电慰第29军及卢沟桥前方将士，并先后两次汇寄前

存募捐余款 4,000 元。第29军司令部复电省党部，对各界慰问电表示“谢忱”。

△ 中共湘鄂赣省委派出代表与国民党军委会武汉行营代表、第50师、国民党平江县党政方面代表谈判，达成部分协议，决定将湘鄂赣边区红军改名为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队。

24日 长沙市人民抗敌后援会扩大参加单位，改称为“湖南人民抗敌后援会”，号召全省人民团结一致，抵抗日军侵略。

29日 湖南学生援助前方将士委员会所属各学校开始募款劳军。

△ 湖南公路员工抗敌后援会成立，电慰第29军将士。

31日 衡阳人民抗敌后援会筹委会成立。

△ 省国术馆民众国术训练班妇女组40余人请缨抗日。南岳新老圣帝殿、南台寺、祝圣寺所有僧侣集议，聘请国术专家，教练武术，俟练习纯熟，即请缨杀敌。

下旬 平津各高等学校一批学生来长沙，组织留湘同学会，宣传抗日。

8月

1日 何键离长沙去南京出席国防会议。14日返长。

4日 湖南人民抗敌后援会召开第二次常委会，聘胡元倓等17人为募集特别专员，通电国民党中央，要求正式对日宣战。

△ 军政部电省政府转饬各县，协助南京防空学校、中央税警总团、第60师在湘各县招募新兵。

5日 日驻湘领事高井末产及“势多”舰长吉见信一率日侨70余人，离湘返国。行前，要求省政府印具封条将日领事馆、同仁医院及小西门一带商店封存。

- 6日 长沙市小吴门楚社酒家经理谭十思舍商从戎，要求北上担任军事运输工作。
- 7日 省政府布告保护日侨遗留财产。
- 8日 “湖南妇女抗敌后援会”、“长沙市商人抗敌后援会”成立。
△ 第16师师长章亮基调任第4路军参谋长。
- 10日 长沙县人民抗敌后援会成立。
- 15日 湖南人民抗敌后援会征募部确定各界征募捐款办法：商人限一月内缴足20万元；农、工、学生每月捐一角；妇女界则动员捐献结婚戒指等细软物。
- 16日 国民政府发行救国公债5亿元。
△ 何键电蒋介石，建议《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在湘暂缓施行。
△ 湖南人民抗敌后援会奉令改称“湖南人民抗敌总会”。
△ 省政府宣布：《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湖南省可略变通执行。
- 19日 省保安司令何键下令：为适应防空需要，市内白色墙壁均须刷黑。
△ 李默庵出任第14军军长，率部赴前线。
- 20日 长沙市李文玉、周半、余太华三金店店主、经理及店员工友合捐1万元，交抗敌后援会转前方将士。
△ 中共湘鄂赣省委派刘玉堂、黄耀南到武汉行营，在董必武的领导下与国民党谈判。8月29日达成协议，湘鄂赣抗日统一战线建立。
△ 长沙市新闻记者抗敌后援会成立。
- 23日 铁道部为督修湘黔、湘桂铁路，于衡阳设办事处，王国华为主任。
- 26日 驻宁乡的第15师王东原部奉令出发抗日，何键赴宁乡向

该师官兵训话。

- 27日 何键对记者宣布：“八一三”抗战爆发后，第4路军配备前线作战及陆续奉调离湘的部队已有6个师、2个独立旅，湖南现役军人在100万以上。
- △ 湖南妇女抗敌后援会奉令改称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湖南分会。
- △ 省国术馆为普及民众国术，预备将来杀敌，在长沙市成立15个区、组训练场，每组指派教官数人，免费训练民众，本日开始招生。
- △ 湖南省非常时期财政委员会成立。
- 本月 自中旬起，全省大雨倾盆，兼旬不息。湘南、湘西山洪暴发，湘、资、沅、澧四水同时猛涨，洞庭湖宣泄不及，堤垸多数溃决，全省30余县严重受灾，灾民流亡各地，沿门乞讨。

9月

- 3日 省保安二团扩编为旅，即日自南岳开赴前线。
- △ 蒋介石核准在临澧成立特种警察训练班，戴笠任主任，余乐醒为副主任。
- 5日 衡阳人民敢死挺进队130人（其中女性40名），在队长蒋兴和率领下，今日开赴抗日前线。
- 7日 平、津回湘同学会195人具呈教育部请求救济并解决学业问题。
- △ 旅沪湘绅熊希龄电何键、尹任先速拨款救济旅沪湘籍难民。
- △ 省国术馆教授王家桢女士决定招募女青年100名组成女子大刀队，受训一个月，开赴前线杀敌。
- 月初 湘西苗民在凤凰县起义，组织“湘西革屯抗日救国军”

提出“抗租、抗日、倾何（何键）”口号。9月8日攻陷乾城（今吉首），接着永绥（今花垣）、保靖、古丈、永顺各县苗民纷纷响应，声势浩大，在国民党军队高压之下，内部分化瓦解，起义军于12月失败。

- △ 北平中国大学教授、中共党员吕振羽由平辗转回湘，与在长的中共党员取得联系，联络平、津、沪等地回湘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 △ 宋子文电何键：救国公债湖南至少须派销1,000万元，何键复电遵令劝募。
- 14日 新宁县在乡军官刘泽南组织敢死队200人，本日起随附。
- △ 著名女作家谢冰莹率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20余人今晨随第4路军专车去汉转上海前线。
- 中旬 南岳全体和尚编成大刀队10个大队，省国术馆派尹光、刘占元两人为教官，教授各项刀术。
- 22日 湖南抗敌后援会通令各县分会，从速募集布鞋、布袜各10万双慰劳前线。
- 26日 在沪作战的第16师师长彭松龄电何键报告该师与日军激战获胜，荣获战区司令长官特赏，但该师伤亡近千人。
- △ 省学生援助前方将士抗敌委员会改称省学生抗敌后援会。随后组织农村服务团，赴湘东、湘南、湘北、湘西等地区，开展抗日宣传和组织发动工作。
- 29日 湖南人民抗敌后援会第10次常会通过《慰劳来长就医抗敌负伤官兵办法》。
- △ 省政府派员携大批慰问品赴沪慰劳第4路军将士。

10月

- 1日 长沙市义勇队成立，队长何元文，教育主任王伟能，政训主任彭中藩。

- 4日** 刘慕棠（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第6期女生队毕业）率第二批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60余人，赴上海前线。
- △ 省立第一女子职业学校全体师生于4、5、6日，每日节食一餐，以所节之费，慰劳前方将士。
- 5日** 湖南人民抗敌后援会派李人初护送军用大、小铁锹各1,500件，大、小十字镐各1,500件，共6,000件至武汉，请武汉行营转运南京。
- △ 长沙县各乡、区僧、尼及皈依佛教人士为谋抗日救国，在仓后街上林寺集会，成立“中国佛教会长沙县分会”。
- △ 华声玄等主编的《民族呼声》在长沙创刊。
- △ 广西省军政负责人兼第5路军总司令李宗仁及国民党中央委员黄绍竑一行9人，由桂林抵长。李对中央社记者说：“暴日无理侵略，吾人只有实行焦土抗战。”晚6时，李氏一行赴汉转南京。
- 12日** 第77师师长罗霖擅自撤退，国民政府下令军事委员会应依法惩办。
- 13日** 第一批抗敌负伤将士到达常德，受到第二区专员兼县长王季雄等数百人欢迎。
- 14日** 第19师李觉部参加淞沪会战，下午击退日军进攻。
- 17日** 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成立，选举吕振羽、陈润泉、田汉、张天翼、皮宗石、廖伯华、李仲融等23人为理事。
- △ 第16师师长彭松龄电报何键：蒋介石对该师此次参加抗战均能完成任务，极为满意。
- 18日** 省政府派科员邹仲融、参议傅烈等护送省抗敌后援会募款30,000元，布鞋30,000双，棉背心15,000件，毛巾10,000条，药品32箱至南京，交军委会。军政部长何应钦及蒋介石先后接见傅、邹两人。

- △ 第19师师长李觉电报何键：该师秦庆武团17日在葛家牌楼阵地与日军激战，全团自团长以下1,400余人全部壮烈牺牲。
- 19日** 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举行第一次理事会，选举吕振羽、李仲融、廖伯华、陈润泉为常务理事，决定设立研究、宣传、组织、总务四部，创办会刊《抗战文化》，组织讲演队、歌咏队、街头剧团，壁报团、慰劳队、难民指导委员会、读书会、时事座谈会、战时常识训练班等，动员人民抗战。
- 21日** 第19师师长李觉电报何键该师在前线奋勇抗战，保守阵地，获上级奖赏4,000元。
- 22日** 国民政府给陆军中将刘兴加陆军上将衔。
- △ 第28军军长陶广电报何键：21日晚克上海葛家牌楼及黄村塘以南阵地，歼敌无数。
- 23日** 长沙市50余校学生，编成1,295个小队，分别进行宣传、劝募、慰劳活动。
- △ 独立第32旅旅长兼湖南省会警备司令胡达，升任预备第11师师长。
- 25日** 何键在纪念周会上宣称：一、此次沪战，我湖南军队出力很多，其勇敢与牺牲壮烈精神，已深得政府当局的嘉许；二、伤员来湘的已有20,000人左右；三、伤员慰劳费，每兵1元，每士2元，每官5元。
- △ 长沙临时大学今日开学。校址设韭菜园圣经学校、涵德女校及附近49标营房。临大共设文、理、工、法商四个学院，17个系。全校有学生1,452人（其中北大学生342人，清华学生631人，南开学生147人）。蒋梦龄任总务长，梅贻琦任教务长，张伯苓任建设长。
- 26日** 省伤兵管理处成立，负责管理在湘伤兵，省保安处长刘

膺吉兼任处长。

- △ 李宗仁、白崇禧电省政府：桂军前在湘招募7,000人，今须再募1,500人，祈予协助。何键电令湘南各县协助。至此，各省来湘招募单位达50余个，所募人数已逾10万。
- △ 湖南陆军干部同学会会长何键，副会长刘建绪，派员赴各医院慰劳第4路军负伤将士，致送慰劳金，校官每名30元，尉官20元，士兵5元。
- △ 军事委员会任命刘建绪为上海战区右翼军总司令。
- △ 第15师旅长张毅中在沪刘行与日激战，因疲劳过度多次晕倒在战壕，本日去世。

31日 北平私立民国大学，从开封迁长沙。

- △ 新任长沙警备司令罗树甲、副司令吴子健今日就职。第11预备师师长胡达，奉命率部开赴前线。

秋季 从平、津、沪回湘的学生为推动抗日救亡活动，纷纷创办各种抗日救亡刊物。有肖敬顿、曹国枢主编的《前进》（半月刊）、率声亥主编的《民族呼声》（半月刊，同年冬，以上两刊合并为《联合旬刊》）。杨隆誉、黎澍主编的《火线下》、潘开茨主编的《大众日报》等。

11月

- 16日 南京国民政府各机关开始向重庆、汉口、长沙等地迁移。
- △ 第77师重新委定旅团长如下：第230旅旅长刘履德，第231旅旅长蒋汉桂，第459团团长乐志原，第460团团长陈奇乳，第461团团长宾楚善。
- 20日 国民党政府下令改组湖南省政府。原省主席何键调任内政部长。张治中任省主席。

- 23日** 湖南省政府成立“民众抗日自卫团”，张治中兼任团长。
△ 湖南工人抗敌会农村宣传团，本日派8队出发赴长沙四乡宣传。
- 24日** 日机4架第1次侵袭长沙，在小吴门、火车站一带投弹6枚，死伤民众300余人。
- 27日** 张治中通电各方宣布就职。
- 下旬** 陈毅受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托，向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传达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
- △ 妇慰会湖南分会奉令改为“湖南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张治中夫人洪希厚为主任（由其女张素我代），陈洁为副主任，中共有李颖生、曹国智等10余人参加“妇委会”工作，并建立了党支部。
- △ 第62师367团团长张空逸（醴陵人）在上海青浦阵亡。
- △ 全国度量衡局移湘办公。
- △ 北平师大劳作专修科迁长沙开学。
- 本月** 伤兵源源运到长沙，长沙各商号、旅馆几乎全被占住。伤兵没有得到适当收容，致使街头巷尾，伤兵三五成群，横冲直撞，滋事案件，日数十起。省会50万市民惶恐不安。
- △ 中共湘赣临时省委改中共湘赣边特委，谭余保为书记，领导湘赣边和湘南部分地区的党组织。

12月

- 1日** 张治中提出“廉、正、勇、勤”四字为“省训”。
- △ 张治中发表告全省伤兵书，向伤员约法三章：守纪律、不扰民、安心调养。
- 月初** 唐山交大迁湘潭开学。

- 6日 教育部长王世杰，次长段锡朋抵长，在省教育厅设办事处。
△ 张治中兼任湖南省保安司令。
- 9日 徐特立、王凌波受中共中央委派，分别以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高级参议、驻湘办事处代表和办事处上校主任身份，在长沙建立八路军驻湘办事处。
- 上旬 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员生陆续抵湘，在校址未确定以前，暂在省党部办公。
△ 中央日报奉命迁湘，在福星街73号筹设办事处。
△ 中共湖北省工委派任作民回长沙。任作民以中共湘江特委为基础成立中共湖南特委。特委整顿了长沙铜官、湘阴樟树港和益阳等地党的组织，并派人到常德、湘潭、浏阳等地开展救亡工作。
- 13日 省政府设立“湖南省民众训练指导处”，张治中兼处长，赖琏任副处长。对全省民众（男子18—40岁，女子16—35岁）分期训练2个月，每日上课2小时。要求在1938年7月完成。训练内容有：军事训练，精神训练，生产训练，编组训练。
- 16日 徐特立应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邀请，在长沙银宫电影院作国际和国内政治形势的演讲。
- 18日 湖南人民抗敌后援会改组，由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指派宾步程、方克刚、邓文仪、黄佩石、易书竹、杨宇宙、谢祖尧、贺醒汉、魏云千、罗教铎、毛飞等11人为常委。
- 19日 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成立。选举覃振为会长，吕振羽、翦伯赞、谭丕模、黄一欧、刘岳厚、陈大榕等17人为理事。
- 20日 湖南省民训干部训练班开学，聘胡次威、朱经农、晏阳初分任主任、指导员。调集中学以上教职员，大、中

(高中)学生3358人入学，受短期训练(约半个月)后，分赴各地组训民众。

中旬 湖南省政府设湘西绥靖处，任命徐权为处长。

22日 第78军干部训练总部开始在湘招考军官300名，学兵1,000名。

23日 省政府成立“湖南战时设计委员会”，成员除省政协委员和列席省政府会议人员外，另聘地方“绅耆”及云集湖南的国内知名人士赵恒锡、胡元倓等55人为委员。

△ 10月25日于南翔、新泾桥之役殉职的第53师317团营长周凤翔(新化人)灵柩运抵长沙。

25日 徐特立应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邀请，在银官电影院作“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演讲。

28日 复旦、大厦大学第一联合步行宣传团抵湘，开展宣传，以唤起民众。

下旬 中国航空建设协会迁衡阳办公。

本月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高文华、郭光洲、邹克之、欧阳奔程(欧阳方)、白云(王铁铮)、涂国林、张竹如等从延安出发来湖南工作，次年1月12日，高文华等抵达长沙。

△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湘鄂赣省委改为特委，涂正坤任书记，罗梓铭任组织部长，傅秋涛等为常委，直属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

1938年

1月

1日 南京《中央日报》迁长沙出版。

6日 《东方杂志》迁长沙出版。

16日 中共湖南省工委成立，高文华任书记，任作民为组织委

- 员，郭光洲为宣传委员。
- 22日 省政府公布张治中治湘两大方案：《湖南省政府施政纲要》和《湖南省组训民众，改进政治，加强抗日自卫力量方案》。
- 25日 中共湖南省工委为扩大抗日宣传，创办《观察日报》，黎澍任总编辑。
- 28日 由田汉、廖沫沙创办并主编的《抗战日报》在长沙出版。
- 本月 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傅秋涛为支队副司令兼一团团长，在平江嘉义经过短期整训后，于2月3日出发，开赴抗日前线。留守人员在嘉义设立“新四军平江通讯处”，主任黄耀南。
- △ 中共中央派王涛从延安到湘南，先后与周礼、李林、谷子元、谢竹峰等取得联系，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并设立新四军驻郴州通讯处，王涛任主任。
- 本月 省政府为适应“战时军事需要”，筹设全省无线电通讯网。

2月

- 1日 长沙民治书局开始出售《毛泽东自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的第八路军》等书籍。
- △ 省政府第八次常会通过“成立抗日自卫军总司令部，统一全省自卫组织”议案，张治中通令各地抗敌自卫组织一律撤销。
- 6日 省抗敌总会聘田汉、茅盾、徐特立、王次青、左舜生、曾约农等组成宣传委员会。
- △ 郭沫若来长沙，邀田汉任政治部第三厅第六处处长。

- 月初** 中共湖南省工委与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商定：省工委的秘密工作与“八办”的公开工作严格分开，省工委负责党的组织发展、干部调配和领导抗日团体工作，“八办”主要做上层统战工作，同时配合省工委开展其他工作。
- 17日** 省文抗会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根据国民党省党部意见，增选国民党党员为理事。
- 20日** 长沙临时大学开始迁滇。
- 26日** 长沙市商界知名人士徐天钧、丁子钦、曹商隐等发起筹组“省会各界救济难民协进会”，任务为举办难民工厂，发放小本贷款，介绍职业等。
- 本月** 湘赣边红军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一支队一大队，共500多人，大队长段焕竟，政委刘培善，中旬从莲花龙上出发，开赴抗日前线。

3月

- 2日** 省政府第十一次常会决定：一、撤销湘西绥靖处，设立沅陵行署，任陈渠珍为主任。二、通过行政干部学校校务委员会名单，除省府委员兼校务委员外，聘胡元倓、陈润霖、晏阳初、黄少谷、刘咏尧为兼校务委员，晏阳初兼教授部主任，赖琏兼指导部主任。
- 3日** 前押解来湘的第77师师长罗霖，在沪战太平桥阵地贻误戎机，但事后尚能收复阵地，将功补过，被宣告无罪。
- 10日** 省国术馆创办的“抗战图书馆”于又一村俱乐部开馆。
- 13日** 美国进步新闻记者史沫特莱今日由汉口来长沙，为八路军和西北民众游击队募集经费。
- 22日** 来湘伤员，截至本日止已逾4万，治疗痊愈，重返部队的约1万人。
- △ 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兼郴县县长黄少谷捐款100元资助

第73后方医院办伤员俱乐部。

- 29日 张治中召集湘西有屯土县代表会议。达成“废屯升科，革屯军受编抗日”的协议。龙云飞受编为省保安新编第1旅旅长。

4月

- 1日 湖南地方行政干部学校开学。
- 10日 日机27架轰炸湖南大学等校区，死38人，伤70余人。湖大图书馆全部被毁，科学馆毁去三分之二。
- 11日 宋希濂出任新编荣誉第1师师长。
- 12日 湖南抗敌总会汇款2万元，慰劳第五战区将士。
- 13日 国民党常德市党部以所谓“贩卖违禁反动书报”为名，查封金城、新知、大上海、自力四进步书店，抢走店内宣传抗日的书刊。
- 22日 历时一周的长沙市兵役宣传周，本日结束。其中《木兰从军》、《班超投笔》两剧，引人注目。
- △ 省会警察局局长李先教辞职，由文重孚继任。
- 25日 中央军校长沙分校开学，蒋介石函寄“训词”，张治中以军校校务委员兼分校校长资格主持开学典礼并作题为“黄埔历史与国民革命”的演讲。
- △ 蒋介石下令：抗战期间全国各机关每日办公时间，应增为10小时以上。省政府规定自5月1日起实行。
- 26日 省处理敌产委员会通过处理敌产办法。分为清点、拍卖、拨交三种。
- 29日 应张治中邀请，汪精卫来湘，随行有陈璧君、王懋功、陈春圃等，汪在湖南地方行政学校和中央军校长沙分校作了演讲。5月1日返汉。

5月

- 2日 湖南抗敌总会决定向全省各界征募衣裤10万套。
- 5日 第200师参加台儿庄战役战利品运长展览。
- 6日 负伤官兵两批计2,300余名，由汉口运来长沙。
- 9日 湖南民众抗日自卫总团成立。
- 10日 湖南民众抗日自卫总团军事参议会成立，聘赵恒惕为议长。
- 17日 前迁湘潭之唐山交大，近因北平交大并入，人数激增，校舍不敷，迁湘乡杨家滩上课。
- 18日 国民党当局和通讯社误报第20军军长谭道源在苏北殉职。
△ 长沙市警察局公布，上月末长沙市人口为511,131人。
- 26日 在鲁西菏泽殉职的第23师师长李必蕃灵柩由汉口运到长沙。随后举行公祭。
- 27日 全国赈济会决定，在武汉的6万难民转运来湘。
- 下旬 张治中更换全省33个县长。
- 本月 中共湖南省委调整领导成员，书记高文华，组织兼军事部长聂洪钩，统战部长任作民，民运部长郭光洲，宣传部长谭丕模。
△ 因战事关系，长沙水系轮船撤来长沙达66艘，撤来常德达16艘。
△ 由于张治中执行了比较开明的政策，在中共湖南省工委和八路军驻湘办事处领导发动下，湖南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出现高潮。

6月

- 3日 各县武术界人士900余人组成的第19集团军特别挺进大

- 队，由张向武率领，今日从长沙出发开赴抗日前线。
- 7日 负伤将士1,120名，由武汉运来长沙。
- 8日 驻武汉国民政府机关开始撤退，党、政机关迁重庆，军事机关迁湖南。
- 10日 负伤将士840名由武汉运到长沙。
- 13日 负伤官兵1,400余名由武汉运来长沙。
- △ 荣誉第1师由副师长陈瑞珂、参谋长顾藻裕率领从长沙开赴前线。
- 14日 蒋介石下令编组第九战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仍兼武汉卫戍司令），辖薛岳第一兵团和张发奎第二兵团，负责长江南岸的防卫。
- 16日 负伤官兵2,200名由汉口运来长沙。
- 21日 第52师在师长李韫珩率领下，由长沙开赴前线。
- 下旬 全国难民救济会决定分发难民2,000名来湘。

7月

- 2日 省难民救济委员会成立，尹任先、余籍传、陶履谦、朱经农、陈国钧等为常委。
- 7日 为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湖南抗敌总会决定在省会举行献金运动，全市设献金台5个，至9日共收献金96,087元。
- 上旬 中共湖南省工委改称中共湖南省委。
- 17日 武汉至沦陷前夕，迁湘工厂达53家。
- 21日 徐特立在《观察日报》发表《保卫湖南以及武汉的基本问题》，号召实行全民战争。
- 27日 张治中再次更换25个县长。
- △ 薛岳电张治中要求各专、县于要地修筑工事，以备将来作战之用。

月末 经动员疏散，长沙市人口下降为457,897人。

8月

- 1日** 杜聿明就任湘潭警备司令。
- 3日** 国民党中央赈济委员会在长沙、衡阳设难民运送配置委员会。
- 9日** 张治中下令增设郴县、岳阳两警备司令部，由陆瑞荣、魏镇藩分任司令。
- 13日** 中共湖南省委发表《保卫湖南宣言》，提出了保卫湖南的六项措施。并通过湖南大学进步团体“明日社”联络工、商、农各界及各党派团体5,000多人举行了“八·一三”一周年示威大会。
- 17日** 日机18架狂炸长沙，投弹120余枚，被炸20余处，炸毁民房300余栋，死伤平民800余人。
- 25日** 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兼黔阳县县长席楚霖调任长沙市市长。
- △ 日机再次轰炸长沙。
- 31日** 日机18架在株洲南北火车站投弹100余枚，炸死30余人，炸伤40余人。

9月

- 上旬** 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代表徐特立，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高文华赴延安，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 15日** 《中央日报》自长沙迁重庆出版，长沙版继续发行。
- △ 为培养抗战人才，中共湖南省委创办的武冈塘田战时讲学院成立，聘覃振任院长，吕振羽任副院长，先后有250名青年来院学习。
- 30日** 省民众抗战统一委员会成立，张治中、覃振、徐特立、

任作民、翦伯赞、杨东莼等64人为委员，张治中、覃振、徐特立等19人为常委。

10月

- 月初**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各机关陆续迁湘。政治部迁南岳文庙，第三厅部分人员驻长沙荷花池。
- 12日** 湖南大学开始迁辰溪。
- 16日** 日机4批38架轰炸株洲。
- 17日** 日机106架轰炸株洲。
- 中旬** 叶剑英来长沙，向中共湖南省委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并同省委、湘鄂赣特委一起研究了当前形势。
△ 粤汉铁路管理局迁衡阳。
- △ 日机连续轰炸长沙、衡阳等地。
- 23日** 铁道运输司令部迁衡阳办公。
- 27日** 周恩来、叶剑英到达长沙。
- 29日** 蒋介石在长沙召集部分高级将领商讨军事。
- 30日** 郭沫若、胡愈之到达长沙。
- 本月** 在中共党员刘东安、刘国安等推动下，衡山青年战时工作队成立。
△ 张学良被移禁沅陵城郊凤凰山。

11月

- 1日** 省政府决定迁沅陵，长沙市政府迁邵阳，并动员市民疏散。
- 3日** 蒋介石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
- 月初** 由于破坏武汉三镇的计划未予实施，“焦土抗战”的口号风靡一时。
- 5日** 蒋介石在南岳召开高级军政人员会议，研究即将召开的

南岳军事会议的议程和内容。

- 6日 周恩来在长沙青年会礼堂向湖南各抗日救亡团体讲演《抗日第二阶段我们的任务》。7日晚通过电台向全省发表广播讲话。
- 7日 蒋介石在长沙蓉园召开军政人员会议，指示要实行“坚壁清野”，如长沙不守，即付之一炬。
- 8日 日机狂炸长沙、衡阳。
- 上旬 中共湖南省委、长沙市委负责人在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开会，研究撤退方案，周恩来、叶剑英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省委和八路军办事处分别迁邵阳和沅陵。
- 9日 中共湖南省委机关、《观察日报》社、文抗会迁邵阳。
- 10日 日机狂炸浏阳，全城大火，居民死伤千余人。
- 12日 省会文化团体在长沙师范学校举行孙中山诞辰72周年纪念大会，周恩来在会上讲话，强调必须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 △ 国民党军将岳阳城区部分繁华区域烧毁后向南败退，岳阳沦陷。
- △ 第九战区前进指挥部由平江迁长沙南门外。
- 13日 凌晨2时，长沙全城起火。大火燃烧三昼夜，全城房屋焚毁十之八、九，烧死市民及病伤员甚多，二、三十万居民无家可归。
- 14日 周恩来在南岳面见蒋介石，要求严惩纵火主犯，发放救济灾民款项，陈诚（驻长沙南门外）电蒋介石要求蒋亲赴长沙，从严处理大火案件。
- 16日 蒋介石由南岳到长沙。
- △ 周恩来由衡阳返长沙，要求衡阳的第三厅各演剧队和抗宣队，连夜赶来长沙救灾善后。深夜，演剧1、2、8、9和抗宣队在田汉、洪琛率领下赶到长沙。

- 18日 郭沫若、冯乃超又带一批队员到达长沙进行救灾宣传。
△ 蒋介石下令进行高等军法会审，惩办大火肇事人员。
- 19日 国民党中央宣部及政治部发表《长沙大火经过“真相”》声称：“长沙大火实为地方军警误信流言，自卫民众激于义愤造成。”
- 20日 长沙市火灾临时救济委员会成立，尹任先为主主任，田汉、席楚霖为副主任，决定发放救济费50万元。
△ 军事委员会军事法庭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省会警察局局长文重孚以“辱职殃民”罪判处死刑。
- 23日 中共党员王礼中、毛特夫等组织的湘乡抗敌后援会战时工作团成立，深入农村开展抗日宣传和救亡运动。
- 25日 军令部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第三、九战区高级将领200余人出席，周恩来、叶剑英参加了会议。会议历时4天，蒋介石作了多次讲话，提出“宣传重于作战，政治重于军事”的观点。会议还通过了整军方案。
- 本月 原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部分工作人员，在衡阳建立八路军办事处。

12月

- 1日 蒋介石由衡阳去桂林。
- 25日 由中共党员孙伟、黄力丁等组织的长沙育英儿童抗敌工作团成立，直属中共湖南省委领导。次年1月赴湘潭、湘乡、邵阳、衡阳、衡山、岳阳等地巡回演出，宣传抗日。
- 本月 中共湖南省委将岳阳县划给湘鄂赣特委领导，特委积极建立抗日武装力量，在岳阳建立了两支游击队，共千余人。
△ 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由衡阳经桂林去重庆。

冬季 常德、石门、沅陵、慈利、大庸、辰溪等县，因机关、工厂内迁和难民流入，人口分别比战前猛增3至4倍，如津市由战前2万人猛增至10万人。

1939年

1月

- 5日** 中共湖南省委在邵阳设立宣传分站和文化服务处，随后，又在株洲、衡阳等地成立了文化服务分处，在湘中各县设立了60余所文化宣传机构，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 上旬** 湖南各县市纷纷召开声讨汪精卫叛国投敌与肃清汉奸大会。
- 15日** 张治中电行政院请辞湖南省主席职务。
- 21日** 国民政府改组湖南省政府：免张治中职，任命薛岳、陶履谦、杨锦仲、朱经农、余籍传、李扬敬、谭道源、仇鳌、刘兴为省政府委员，薛岳为省主席。
- 24日**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国民政府军委会在南岳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兼任主任，白崇禧、陈诚兼任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
- 本月** 在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徐特立、高文华以及参加全国青年工作会议的于刚、陶永金分途回到湖南。

2月

- 1日** 薛岳就任省政府主席。上任后，即暗中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迫使一些进步文化人士离湘，各种进步抗日团体先后被解散，不少进步报刊被迫停刊。

月初 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在八路军驻邵阳通讯处召开。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博古（秦邦宪）出席了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批判统战工作中的右倾错误，总结省委前段工作。会议选举高文华、徐特立、任作民、聂洪钧、郭光洲、王涛、蔡书彬等为新的省委委员，高文华为书记。

19日 长沙发生空战，击落日机8架。

23日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第一期开学。游干班于1939年下半年迁永州，旋迁祁阳，不久再迁江西，1940年6月复迁祁阳。

3月

20日 新长沙市设计委员会在新军路开始办公，余籍传任主任委员。

21日 国货陈列馆临时商场开始营业。

26日 邵阳妇女战时服务团成立。

27日 邵阳县抗日自卫团所辖谢国春、王根源、谢光薰等几支游击队，奉令编入第93师，开赴前线。

4月

1日 永州警备司令部成立，荣誉第1师师长郑洞国兼司令。

18日 周恩来视察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向学员作了《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的报告。

△ 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观察日报》在邵阳被国民党县党部以“未经登记”，予以查封。

23日 武冈塘田战时讲学院被国民党顽固派用武力强行解散。

月底 周恩来在衡阳召集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会议，作了关于《转变党的组织形式与群众工作方式》的指示。

5月

- 20日 省政府迁永阳。
26日 内政部长何键改任军事委员会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

6月

- 1日 国民政府经济部在浙江金华召开湘、粤、桂、鄂、赣、闽六省交通会议，决定实行六省联运，以活跃战时经济。
7日 第九战区克复忠防（今属临湘），日军退驻桃林。
10日 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迁永阳办公。
12日 驻平江的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派兵包围嘉义新四军办事处，杀害涂正坤、罗梓铭等全体工作人员，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随后在平江、浏阳、修水、铜鼓等县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群众。
16日 《抗战日报》被迫停刊。
23日 日机39架分6批先后侵入常德上空，投弹500余枚，城内外六处起火。

7月

- 1日 重庆、沅陵间长途电话线接通。
28日 长沙市、县佛教会约集市、县各寺庵主持商讨参加战时工作。
下旬 中共湖南省委分批撤退暴露了的党员干部去延安或新四军，党的工作由半公开状态完全转入秘密状态。

8月

- 13日 《开明日报》在茶陵创刊，刘岳厚任社长，黎澍任总编辑。
△ 湘北伪军胡安烈部反正，毙敌140余人。

9月

- 7日 湖南抗敌总会主任委员伍仲衡辞职，仇硕夫继任。
- 8日 省政府通令各地方政府军警交通机关，为防止康复伤、病兵逃亡，如发现有身着伤服而无医院外出证明者一律扣送原医院或当地伤管处惩治。
- 14日 日军为配合汪精卫筹建伪政权活动，打击国民党重点兵团，达到以战迫降的目的，驻武汉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纠集10余万兵力，在海、空军的配合下，分由赣北、鄂南、湘北三路进犯长沙。湘北日军9月18日开始攻击，23日强渡新墙河，26日强渡汨罗江，30日，到达长沙外围金井、上杉市、青山市、桥头驿等处。因后路被我军切断，各部受我军侧击、伏击，10月1日开始撤退，4日退过汨罗江，8日，日军全部退回新墙河北岸，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

10月

- 6日 蒋介石电贺湘北大捷，并向参战部队颁发奖金15万元。
- 月初 为防止日军进攻湘西，军事委员会决定成立第六战区，陈诚兼司令长官，遂辞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职。
- 9日 下午5点，在衡阳下长街银花电影院空坪，举行全省庆祝湘北大捷大会。吴逸志报告作战经过。
- 10日 军委会任命薛岳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 29日 蒋介石召开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检讨南昌会战和第一次长沙会战。针对欧战爆发，蒋介石声称：“我们抗战的进程已达到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阶段。”11月5日结束。
- 28日 纽约华昌公司总经理李国钦捐美金10万元，慰劳湘北前

线将士。

本月 八路军驻湘办事处被迫由邵阳迁衡阳，11月9日，又被迫迁湘潭，13日再由湘潭迁长沙白沙岭。

11月

11日 湖南广播电台开始正式播音。

12日 何应钦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作军事报告，称：“最近湘北会战，即得力于民众之协助，故收效最宏。”

22日 日军第6师团（稻叶师团）翻译郑逢友、易斌生，维持会代表丘以发、熊荣华击毙日军4名哨兵，夺得轻机枪1挺、步枪3枝归来，薛岳予以奖赏。

12月

12日 第九战区冬季攻势开始。关麟征率第15集团军攻击通城、岳阳间的日军第6师团。

下旬 宁乡县组成志愿兵4连（每连160人），开赴前线。

本月 中共湖南省委由邵阳迁衡阳。

1940年

1月

5日 省伤兵管理处处长赵凌霄报告该处一年来工作概况：截至本月，全省有院、所110个（收容所35，兵站医院20，陆军医院3，后方医院40，休养院3，手术组3，伤残教养院3，临时残伤病教养院3），原有住院伤病官兵59,772名，新收伤病官兵59,136名，治愈归队者61,703名，现尚有住院伤病官兵36,233名。

7日 驻湘英舰全体员兵奉令回国。

- 9日 省政府规定：查禁敌货为县长重要考绩。
- 18日 省会各界开会庆祝“粤北大捷”，省政府拨款2万元慰劳粤北将士。

2月

- 5日 长沙工人抗敌后援会举行成立大会，决定发动工友于9日到医院送礼劳军，发动理发工友，为负伤将士服务。
- 21日 蒋介石在郴州召开军事检讨会，白崇禧、陈诚、张发奎、余汉谋、薛岳、商震等参加。
- 24日 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工作人员撤往广西桂林，徐特立、王凌波仍留湖南工作。
- 本月 中共湖南省委机关由衡阳迁往湘潭。省委召开会议，决定从省委至县委，均减为三人。省委由高文华、王涛、聂洪钧三人组成。

3月

- 10日 因长沙大火而停刊的湖南《大公报》复刊。
- 30日 省会各界2万余人举行讨逆锄奸大会，决议集资5万元于南岳塑铸汪逆夫妇铁像，并开除周佛海省籍。

4月

- 5日 长沙各界举行民族扫墓节，赴岳麓山公祭黄、蔡、焦、陈四先烈，并举行抗战伤、病死亡将士公墓揭幕典礼。
- 6日 岳阳日军反战官兵纵火焚毁车站附近粮弹仓库，燃烧达两昼夜，损失在300万元以上。
- 15日 长沙县长田蔚蒸、湘潭县长王纶，因贪污舞弊，被第九战区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 22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湖南工作的指示》，指出：

湖南党所处的政治环境必然向更坏的方向逆转，湖南党的工作的总方针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坚决撤退已经暴露的各级干部，停止在农民中发展党员。

- 4月 中共湖南省委派县级干部三人到国民党第70军李觉部游击训练班工作。

5月

- 1日 我游击队于上月23日深夜在岳阳东望城岭埋设地雷，24日晨，日军池田少将率兵一队乘装甲专车驶过，触雷爆炸，车飞轨外，池田负重伤，今日毙命。
14日 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团第二分团（华南分团）一行15人，在团长陈忠宪率领下，由重庆来湘，慰劳驻湘部队。

6月

- 5日 中华全国公教进行会总监督、前南京区主教于斌，由衡阳乘轮来长沙，日内赴前线向驻军献旗。
8日 于斌主教在长沙带领全市教友500余人举行弥撒礼，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
9日 长沙市大生汗衫工厂、美中华制革厂、辅寿制药厂、赣州军用品工厂，联合慰劳驻市负伤官兵。
本月 自抗战爆发至本月，迁湘工厂共计121家，占内迁工厂数26%。

7月

- 16日 全国节约建国储蓄运动委员会湖南分会成立，并举行首次委员会议。
19日 沔江县军事科长李若旭、书记韩士贻，勒索壮丁曹子斟款1,000元，经湖南军管区查明，判处死刑。

月底 省、县“抗敌会”奉上级令，一律撤销。

8月

28日 行政院任命胡恕华为国立湖南大学校长。

本月 徐特立被迫撤离湖南，由衡阳经桂林转赴延安。

9月

18日 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主任王凌波被省政府“礼送”出境。

10月

8日 滨湖各县商会代表聚集常德开会决议，在双十节派人去前线劳军。

10日 省双十节慰劳团分四团前往前线劳军。

△ 宋美龄派代表来长沙，慰问负伤将士，官佐每人发代金10元，士兵每人5元。

△ 湘阴各界派代表向驻县第37军（军长陈沛）献旗。

13日 长沙市各剧团本日开始献机公演。

△ 全国征募会核定，湖南献寒衣数额为20万件。省府规定所有党、政、军、警机关公务人员，均应按月扣捐代金月薪之1%至40%。

本月 国民党顽固派在湘潭杀害中共党员及进步人士郭熙、彭金华等8人。

11月

16日 省政府开始举行县长考试，计录取优等1名，中等9名，共10名。

本月 中共湖南省委机关迁湘乡永丰镇。

△ 中共湘鄂边特委成立。

1941年

1月

- 7日 湖南各界捐资在耒阳兴建的保卫大湖南纪念塔落成。
- 11日 省政府聘程潜、覃振、周震鳞、唐生智、何键、贺耀组为中正大学筹委会名誉委员。
- 本月 “皖南事变”后，薛岳在湖南疯狂反共，大肆清查异党活动，数月内，全省被捕中共党员、进步群众及其家属达3,000多人。

4月

- 9月 《国民日报》沅陵版本日发刊。
- 上旬 日本航空部长铃木洱清，自东京飞汉口，召开陆海军会议，声言扩大对湖南的轰炸。省政府电各县切实疏救。
- 下旬 第九战区增设湘鄂赣边区总指挥部，李默庵任总指挥。

5月

- 3日 长沙市警察局长陈阵宣布：长沙市人口疏散已达一半以上，未疏散前本市人口为224,836人，至本日已减为97,086人。

7月

- 13日 薛岳公布《战时滨湖各县粮食输售办法》，规定自8月1日起滨湖各县粮食概归省粮管局统购统拨。

8月

- 7日 省会警察局再次通令，取缔白色墙壁。

10日 长江航政局长沙办事处成立，刘运中为主任。

9月

- 17日** 第二次长沙会战开始。日本为增加对英、美谈判的资本，打击国民党第九战区主力，驻武汉的第11军纠集5个师团约12万兵力，向湘北进犯。17日强渡新墙河，国民党军主力退往侧翼，19日日军渡过汨罗江；25日推进至捞刀河，27日占领长沙。因后方交通被国民党军切断，日军补给中断，国民党援军陆续到达，至30日，日军退出长沙北撤。国民党军进行追击、侧击，10月8日，日军退回新墙河北岸，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
- 20日** 日军一股进攻湘阴城，驻守城关的第99师297团曹克人营据城固守。迄至10月4日，从长沙北撤的日军大批涌至，曹营奋力抵御，全营壮烈牺牲。

10月

- 16日** 蒋介石召开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总结第二次长沙会战经验教训。会上，第74军第58师师长廖龄奇在会战中私自离队返家，被判处死刑；第10军军长李玉堂因指挥不力，被撤职。会议于21日结束。

11月

- 8日** 薛岳以湘阴县县长谢宝树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协助军队作战得力，予以嘉奖。

12月

- 22日** 长沙战时任务队召开组训会议，宣布对不尽职责或畏缩不前、贻误戎机者，以军法从事。

24日 第三次长沙会战开始。日军为策应攻占香港作战，驻武汉的第11军纠集4个师团约7万兵力，24日强渡新墙河，28日强渡汨罗江，31日到达长沙外围，次年1月1日至3日，日军猛烈围攻长沙，守卫长沙的国民党第10军李玉堂部沉着应战，日军终不得逞，后路被我军切断，补给中断。4日，日军下令撤退，第九战区各部进行追击、侧击、阻击，日军夺路北逃，狼狈不堪。至15日，日军退回新墙河北岸。

1942年

1月

- 8日** 长沙县青山乡第七保农民向忠明（15岁），于日军溃逃时，乘敌不备，先后击毙日军3人，本日又生擒日军1名，解至第73军军部，彭位仁军长发给奖金200元。
- 23日** 纽约华侨募款8万元，慰劳湘北前方将士。
- 25日** 薛岳呈报军事委员会：“第99军傅仲芳部李维扬营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坚守麻石山，与千余日军，苦战十数昼夜，虽剩最后一人，犹坚守山头，请予抚恤，籍彰忠烈。”
- △ 常德各界募款2万元慰劳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将士。
- △ 蒋介石饬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联合办事处，向长沙、湘阴、岳阳各贷款100万元，以资救济。另，行政院拨款100万元救济湘北灾民。
- 26日** 长沙各界举行第三次长沙大捷祝捷大会。

2月

- 1日** 湖南全省素食一天，为第三次长沙会战阵亡将士志哀。

- 5日 长沙各界500余人公宴长沙诸将校，市长王力航致欢迎词。
- 6日 湘阴县县长谢宝树，发动群众帮助军队杀敌，支援军粮，受省政府嘉奖。
- △ 英海军部宣布，将泊驻长沙的鹰、塘鹅、泥马三炮舰赠予中国。
- 10日 长沙市记者公会募款3万元，向前线捐献长沙记者号滑翔机一架。

3月

- 1日 全国慰劳会前线慰劳总团团长居正及第四慰劳团成员一行14人，由衡阳抵长沙，慰劳长沙全体军民，向有功将士分赠荣誉纪念章及慰劳金。
- 7日 宁乡大沩山、回龙山各寺和尚300余人，组成战时任务队，准备在战时担任宣传、慰劳、救护等工作。

4月

- 20日 岳阳县锄奸队员余育才（17岁）等2人智歼日军通讯兵稿本大郎，缴三八式步枪一枝及其他文件。

5月

- 6日 第10军军长方先觉兼任长沙防空司令。
- 月底 自去秋奉令发动一元献机运动至本月底，全省献机捐款已逾700万元，可购机50架，居全国之冠。

6月

- 20日 第九战区举行成立4周年纪念会。
- △ 《抗战》摄影展览在衡阳举行。

8月

1日 衡阳上空连日进行空战，日机被击落17架。

9月

11日 长沙市雨花亭、德雅村两处防空市场竣工。

11月

28日 英国红十字会医疗队医生、护士共20余人来长沙设立医院，为我伤病员及难胞服务。

12月

本月 中共湖南省委领导成员高文华、文士桢接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撤离湖南去延安。中共湖南省委改为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礼。

本年 湖南全省人民举行“献机”运动，共捐款2,000万元，可购机100多架。

1943年

3月

月初 日军分路由荆江各口渡江南犯。

8日 日军顺利渡过长江，进逼华容。

10日 日军梅木部队及235联队占领华容县城。

16日 蒋介石飞常德视察，认为“不可轻视日军此次春季攻势”。

4月

6日 驻华容日军围攻七女峰国民党军据点，守军奋力抗击，

激战三昼夜，毙伤日军200余人，9日夜守军转移阵地。华容全境大多为日军占领。

- 18日 赵子立在长沙“忠爱社”礼堂作《后退作“战史实的检讨》的学术报告。

5月

- 5日 日军向南县、安乡发动攻击。
7日 日军进攻黄狮嘴，日步兵第90大队长舛尾中佐战死。
8日 日军陷南县、安乡。南县县长黄公麟殉职。
△ 国民党炮兵与在洞庭湖的日军舟艇部队发生炮战。
9日 日军在汉寿县作新乡厂窖（今属南县）一连三天大肆奸淫烧杀，屠杀中国军民约3万人。

6月

- 3日 国民党军克复南县。
4日 国民党军克复安乡。
17日 长沙市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成立，梁霖、齐寿昆分任正、副会长。
19日 张德能接替方先觉任长沙警备司令。
23日 桑植百岁老人陈王氏捐赠抗日将士医药费1万元。

8月

- 9日 美国医药援华会主席柯尔波一行由衡阳抵长沙，考察医药卫生情况。

9月

- 本月 截本月衡阳市人口为346,883人，加上流动人口和难民总数超过50万人，工商业户4,856户（不包括流动商贩），

财税收入列国民党统治区第三位，成为仅次于重庆、昆明的第三大城市。

10月

- 1日 川湘、湘鄂公路通车。

11月

- 2日 常德会战开始。日军为牵制盟军反攻缅甸，驻武汉日军第11军调集约10万兵力，分三路会攻常德。11月15日，西路日军攻陷石门、澧县；20日，三路日军进驻常德外围各县；22日，日军攻占汉寿，常德保卫战开始。22日至25日为城郊阻击战。26日至28日为城垣保卫战。29日至12月3日为城内巷战。12月3日，常德沦陷。12月9日，国民党军克复常德，10日，日军开始全线退却；国民党第六、九战区进行追击，12月22日克复南县、安乡、津市、澧县。24日，恢复会战前状态。
- 23日 第15师师长许国璋在常德泥港附近与日军遭遇作战时阵亡。
- 26日 第10军预备第10师师长孙明瑾在常德东南赵家桥率部与日军作战时阵亡。
- 28日 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南下进入华容桃花山，与华容地下党取得联系。12月初成立了东山抗日民主政权（东山联乡办事处）。

12月

- 26日 庆祝常德大捷及保卫大湖南五周年纪念会在长沙举行。

1944年

1月

- 4 5日 全国慰劳湘鄂将士献金已逾2,000万元。
24日 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在杨震东率领下袭击华容墨山铺日军据点，缴获大批物资和弹药。

2月

- 10日 蒋介石在南岳召开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24日结束。
14日 长沙市各界在中山堂公祭去年在常德会战中殉职的第73军暂编第5师师长彭士量烈士。彭烈士遗体于15日运南岳公葬。
29日 盟军空军轰炸岳阳，投弹26吨，敌铁路栈房大部被毁。

3月

- 5日 薛岳在行政院会议上声称：湖南战时对国家贡献居全国之冠。每年除供给军棉7万担、军布300余万匹、军粮1,000万石外，尚须接济邻省更大更多之需求。
19日 李桦《常德会战画展》在广西桂林举行。作品数十件，均为常德会战战场写生。

4月

- 本月 曾参加常德会战的美国第14航空队全体将士向滨湖难民捐款559,200元。

5月

- 25日 日军开始发动湘桂战役。侵华日军总司令畠俊六由南京

到达汉口，设立前进指挥所。日军第一线 5 个师团分三路南下，东路第 3、13 师团由鄂南趋平江、浏阳；中路第 68、116 师团由湘北强渡新墙河，攻长沙、株洲；西路第 40 师团，从华容、石首在海军配合下攻益阳、宁乡。

6 月

- 1 日 东路日军占领平江，14 日占领浏阳。
- 4 日 中路日军占领湘阴，15 日到达长沙外围，6 月 17 日占领湘潭。
- 6 日 西路日军占领沅江，11 日占领益阳，16 日占领宁乡。
- 18 日 守长沙之第 4 军由于兵力配置错误和指挥失误，仅战斗 3 天，长沙沦陷。
- △ 下午，驻株洲、湘潭的日军第 68、116 师团向衡阳突进。
- 23 日 日军第 68、116 师团到达衡阳外围。
- 24 日 衡阳外围发生激战至 26 日。日军占领衡阳机场。
- 27 日 日军对衡阳展开全面围攻。
- 28 日 日军第 68、116 师团发动对衡阳第一次攻击，衡阳守军第 10 军方先觉部奋勇抗击。日军死伤 2,000 余人，攻击于 7 月 2 日宣告失败。日军第 68 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参谋长原田贞三郎大佐，参谋松浦觉少将，在衡阳南郊黄茶岭指挥日军作战时，被我衡阳守军炮火击伤。

7 月

- 4 日 东路日军与国民党军在耒阳，西路日军与国民党军在永丰发生激战。
- 11 日 围攻衡阳的日军在得到兵力、物资补充后，发动对衡阳的第二次攻击。衡阳守军英勇抗击并适当收缩阵地，日

军伤亡2,000余人，至20日攻击失败。

- 30日 日军增调第58、34师团及第3、13师团各一部，配合原围攻衡阳的第68、116师团，发动对衡阳的第三次攻击，衡阳守军仍奋力抗击，战斗至8月8日结束。

8月

- 5日 围攻衡阳的日军第58师团某旅团长志摩原吉少将被我军击毙。
- 6日晚，日军一部突进衡阳小西门，与我军发生巷战。
- 8日 日军代表与第10军军长方先觉谈判，方接受投降要求。衡阳沦陷。
- 25日 第4军军长张德能因保卫长沙不力，在重庆被判处死刑。

9月

- 5日 日军攻陷祁阳。
- 7日 日军攻陷零陵。第79军军长王甲本率军部人员转移，在冷水滩附近与日军遭遇，发生激战，王甲本军长阵亡。
- 11日 日本大本营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飞抵衡阳。
- 29日 湖南省政府迁临武。

10月

- 1日 常宁沦陷。
- △ 日军第6方面军参谋长宫崎周一读《湖南省要览》后认为，“湖南人自尊心强，排外思想旺盛，富于尚武风尚。”
- 2日 邵阳沦陷。
- 3日 日军第6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由汉口飞衡阳，听取日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汇报，并察看日军第68师

团。

中旬 日军在衡阳成立第20军，辖第27、68、64、116师团，司令官坂西一良。

11月

- 9日**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129师359旅约5,000人组成“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司令员王震、政治委员王首道，今日从延安出发，向豫鄂湘粤敌后挺进，建立湘鄂赣和湘粤赣边的五岭抗日根据地。
- 11日** 侵华日军总司令畠俊六为处理冈村宁次与横山勇之间的意见分歧，由汉口飞衡阳转南岳。
- 12日** 畠俊六与冈村宁次在南岳会谈。
- 25日** 冈村宁次离南岳去武汉。

12月

- 4日** 新任日军第6方面军司令官冈部大将和新任日军第11军司令官上月中将，由汉口飞衡阳。当晚冈部离衡阳去南岳。
- 冬季** 中共湖南省工委遵照中央指示，派何大群等回湘南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建立抗日游击队。不久成立了湘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宜章、耒阳、郴县、桂阳、资兴、永兴、安仁等地也相继建立了抗日游击队。

1945年

1月

- 21日** 湖南省政府迁蓝山。

2月

- 12日 日军集中岳阳、监利、石首、华容四县兵力，共2,000余人，大举进攻华容东山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支队长杨震东、副支队长郑怀远等领导抗日军民，在仙鹤寺一带痛击日军。
- 28日 国民党军收复茶陵。
△ 日军从平江撤退。

3月

- 18日 国民党军攻入安仁。
- 23日 八路军南下支队突破日军的重重封锁，进入平江沙铺里。部队入湘后，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26日，南下支队进入平江县城。27日发布《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布告》。
- 28日 平江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方正、姜胜为正副主席。

4月

- 15日 因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王翦波、王陵基部队的夹击，南下支队撤离平江县城，分散在岳阳、临湘、平江、通城和崇阳等地发动群众，建立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和抗日人民武装。17日，成立岳阳县人民政府和岳阳县游击队。
△ 日军为摧毁我芷江空军基地，发动了湘西会战。日军第20军纠集约8万兵力从宁（乡）益（阳）至邵阳、新宁分四路西犯。4月15日至5月6日，为日军进攻阶段。日军从各处向西推进了数十至百余公里。但陷入各个山谷中，后路被切断。5月7日至6月7日，国民党第四方面军在第三方面军、中美空军的密切配合下，展开了强大攻势。日军经过突围，至6月7日，返回原阵地，伤亡

亡达2万余人。

24日 国民党军收复永兴。

5月

- 月初** 中共湘鄂赣边区临时委员会成立，书记王首道。同时，设立湘鄂赣军区和湘鄂赣行政公署，军区司令员王震，行政公署主任聂洪钧。
- 7日** 第3方面军第94军第5师李则芳部攻克武阳，歼敌第58旅团主力。
- 10日** 王震率八路军南下支队主力再次向湘北挺进。23日歼灭盘踞在大云山的国民党地方顽固势力王翦波第7挺进纵队300多人。
- 中旬** 在南下支队帮助下，湘阴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杨宗胜任县长。抗日武装发展到3,000多人。以桃花山为中心，建立了湘东抗日根据地。

6月

- 1日** 伪湖南省政设计委员会成立，黄雁九任主任委员。
- 16日** 国民党军收复益阳。
- 26日** 吴奇伟接任湖南省政府主席。

7月

- 上旬**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南下支队主力向南进军。
- 24日** 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与日伪军激战于华容东山佛导坳，打死打伤敌部队长以下50人。

8月

- 2日** 国民党军收复新宁。

- 月初** 南下支队进抵湘潭盐埠，与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礼等会合。决定将第四大队留湘中，协助地方党开展抗日工作，主力继续南下。
- 15日** 日本裕仁天皇以广播“终战诏书”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 16日** 蒋介石致电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令其派代表于21日飞芷江洽降。
- 19日** 冈村宁次复电蒋介石：一切行动依照尊电办理，定21日派今井武夫副总参谋长率随员飞芷江洽降。
- 20日** 上午，各战区及各方面军长官张发奎、卢汉、王耀武、余汉谋、顾祝同、汤恩伯、孙蔚如等陆续到达芷江。黄昏，何应钦、肖毅肃和行政院顾问团及新闻记者共50多人分乘四架运输机，到达芷江。晚，何应钦召开军事会议，成立了“陆军前方指挥部”，负责全部受降事宜。
- 21日** 芷江洽降开始。21日上午11时，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一行飞抵芷江。下午3时，在芷江空军俱乐部开始“洽降会谈”。出席会议的中方代表，有陆军总参谋长肖毅肃，副总参谋长冷欣、蔡文治；日方代表为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参谋桥岛芳雄、前冈雄等。在三天会谈中，肖毅肃先后提交四项备忘录由今井转交冈村宁次。今井呈上了在华日军分布图。中国战区划为15个受降区。9月在湖南的日军分别于长沙、衡阳、岳阳等地集中，接受投降，受降主官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王耀武。

